

目摇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圆 智效民 · 张伯苓怎样当南开校长
灵 傅国涌 · 竺可桢怎样当浙大校长
猿 刘佳林 · 唤醒上海交大的文科记忆

【知识生活】

- 源 邵摇建 · 有无之间
猿 徐摇方 · 死亡之思
 祝大同
苑 关增健 · 神话中的科学
 ——仿《梦溪笔谈》

【沉摇钟】

- 愿 李新宇 · “最后之觉悟”
 ——《叩问陈独秀》之第二章
员 朱鸿召 · 安吴青训班教育模式解析

员源 唐少杰 ·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观摇察】

员源 徐友渔 · 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员远 邢小群 · “大学人文”是一门公民常识课

员员 周建忠 · 学科内涵与工作分类
——出席“华东地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感言

【新青年】

员远 唐摇馨 · 与母亲谈林昭

员员 萨林娜 · 美丽的心

员源 姚摇摇 · 在矛盾中负重前行

员苑 傅□嘉 · 我应“变”成一个怎样的人

【我的大学】

员圆 武跃速 · “生活在别处”我的员苑苑

员圆 杨支柱 · 怀念陈琼芝老师

【读本新选】

员圆 方悴农 · 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的改造

员苑 郑也夫 · 回归家庭摇学习生活

——员圆年员月苑日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演讲

员圆摇 编后语暨稿约

张伯苓怎样当南开校长

■ 摇智效民

2

大学人文
「源」辑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当初的大学建制,主要有国立(含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所以,张伯苓创办了私立南开大学,实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国内外对此评论甚多。比如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友人为纪念张伯苓 70 寿辰,出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 and 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①司徒雷登毕竟是“中国通”,其评价恰如其分。

“弃武从教”的原因

张伯苓祖籍山东,1897 年清明节生于天津。据说其祖辈曾在大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稍有积蓄后在津开店,因生意兴旺,其祖父和父亲都选择了弃商习儒的科举之路。不幸的是,二人多次应考却屡试不中,张家也因此走向衰败。尽管如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却酷爱音乐,因擅长琵琶,有“琵琶张”之誉。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说“张家的家道,随着张久庵的弹拨声,逐渐破落下来”^②。但胡适不这样看,他颇为同情地说,张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1994-1995 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1995 页。

不得已去教小学生维持生活”^①。张伯苓出生时,家境已穷到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

张伯苓从小性情刚直,聪明过人,但因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校园楼台掩映,花木参差,环境幽雅,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几年,张伯苓无忧无虑,奋发学习。他是高才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他在学堂学到许多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受到严格的注重实用的技术训练。可以说,这几年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按照水师学堂规定,学生修业期满,要上船实习一年。但当张伯苓将要实习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目睹北洋舰队的实力虽比日本海军强,却输得一败涂地的现实。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家等候。战争结束后,他以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通济”轮是战后幸存的一艘练习船,经过甲午海战,船上官兵士气低落,官不管兵、兵不管舰的状况非常严重。一些老兵给他讲黄海大战的情景,再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张伯苓对清朝海军完全失望了。

1895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刘公岛是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在那里,张伯苓亲证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所谓接收,就是从日军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日本国旗,升清朝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国土“三易国帜”,使他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怀疑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也粉碎了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他后来多次对人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②

前几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怀念张伯苓校长》说:“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公馆里教授西学,然后 1898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③吴敬琏是张伯苓晚年的学生,他听到老校长讲这段经历,仍然感到非常震撼,可见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287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287页。

③ 《吴敬琏自选集》, 283-287页,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年。

从“严氏家馆”到南开大学

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后,遇到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吴敬琰所说的严范孙。严范孙名修,曾任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主张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人,其中有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1904年,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张伯苓同时在王氏家馆兼课。1905年,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并购买教学仪器。第二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二人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5年10月,拟议中的“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该学堂第一期招生70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一开始,学堂设在严家偏院,三个大房间当教室,一个小房间当办公室,大厅供集会使用。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一百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因当局要求校名必须表明经济来源,遂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学堂附设高级师范班,陶孟和等成绩优异者为师范班学生,同时在学校代课,实行半教半读。

第二年,学生人数骤增,旧院落不敷使用,当地绅士郑菊如为此捐出城南“南开洼”15亩土地。在张伯苓主持下,该校于1906年迁入新址,并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学生人数也增至150多人。由于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南开中学于1908年开设大专班,到1909年,在校生已增至千人左右。1910年,张伯苓制定创办大学计划。翌年10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起先,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后张伯苓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买地70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12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以后,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年,张伯苓还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13年又增设小学部。到1914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1500人左右。这时的张伯苓,真可以说是现代的孔夫子了。

1914年被打成大“右派”的罗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听说南开中学,是在他刚从乡下来到北京,考入清华中等科的时候。他以为中国最好的学校是清华,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在谈到南开时总是赞不绝口,便产生一个疑问:难道除了清华以外,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赞美的学校吗?他还说,第一次听到“张伯苓”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女教师之口,因此他以为张伯苓是个外国

人,后来才知道是个误会。因此他想:“张伯苓先生这位中国人真特别。北平许多学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①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罗隆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北洋时期,大学欠薪现象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怎么敢办一所私立大学呢?也就是说,他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资料看,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游说的,弄得不好会让人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他曾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筹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筹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②

正是这种“不觉难堪”的信念,才使他四处奔走,筹款兴学,才使不少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赠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名靖)、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当时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其善举有很大号召力。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③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情况。

南开大学亦如此。据该校负责财务的华午晴和注册部主任佢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中介绍:为了筹建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盖了一座楼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这一次李纯虽然没有和张伯苓会面,却托人传话说:关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页27-页28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页28-页29页。

③ 《张伯苓纪念文集》,页107,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页272。

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料张返津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一说暴死),并在遗嘱中说,愿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有人说这笔捐赠为缘万元,实际到位员元。但据华、伉二人说,事后其家属以公债形式交付学校,南开大学“实收入八十七万元”。这些说法也许与当时币值与公债的换算有关,但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军阀的李纯,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就是纪念这位将军的。

员年,南开大学要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员万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苑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员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员万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员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员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于第二年落成。员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愿万元筹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员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猿万箱,价值缘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日本东京出版协会也捐赠两大箱图书。^①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员-员)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缘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②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③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南开大学虽然经费困难,但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来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南开与过去许多私立学校、如今许多公办学校的不同之处。

教师的延聘与培养

除办学经费外,师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办学因素。

为了延聘优秀教师,张伯苓让南开出身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任大学部主任。在凌冰主持下,先后来南开任教的有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

^①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员-员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员。

^②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源-源源页。

^③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页。

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汤用彤(哲学)、萧蓬(经济学)、李继侗(生物学)、张忠绾(政治学)、陈序经(经济学)等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南开大学的实力。

平心而论,在声望、条件和经费等方面,南开不如清华、北大,但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大学还是有吸引力的。何廉说,1949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刚到日本,就收到南开大学的教授聘书,月薪1500元。在此之前,他还收到暨南大学的聘书,月薪1000元。权衡之后,他选择了南开。他觉得,由于京津地区是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因此他还是选择了薪水较低的南开。

说到教育水准,首先要看教师的水平。据说早在南开大学创办时,美国罗氏基金团前来参观,听了邱宗岳先生讲授的化学课后惊叹不已,随即为拟议中的科学馆捐款1000万元。南开的理科因为实力雄厚,也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持。到1955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在150名院士中,出身南开的就有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陈省身、殷宏章、汤用彤、李济、陶孟和、萧公权等怨人。到了台湾后,又增加了蒋廷黻、梅贻琦、钱思亮等人。

对一所大学来说,要想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重金聘请,二是自己培养。南开没有更多的钱聘请著名教授,只能选择第二种途径,这其实是更好的道路。后来担任过中研院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①他还说,上述许多人就是在南开成长起来的。南开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也造就了许多学术大师,这是它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对于南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人际关系,何廉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第一,张伯苓的人格魅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先生高大魁梧,质朴真诚,认真负责,乐观热情。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很少开口。熟悉之后,“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他)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

第二,南开的人际关系令人神往。何廉说:“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何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他认为良好的人际关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67页。

系对他是很好的激励。

第三,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让人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它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因此许多人愿意选择南开。另外,为了弥补工资较低的缺憾,南开的房租很低,再加上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几乎没有,因此何廉认为“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①

正因为如此,南开的教师都以一种全力以赴的献身精神在工作,他们用心专一,从不到别处兼职挣钱,这符合潘光旦所谓应当给教师一点宁静的观点,也是南开大学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有所变化。当时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回来,用以改善教师待遇和教学环境,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华。张伯苓深知南开虽竞争不过清华、北大,但坚信私立大学应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②经过认真研究,张伯苓决定发挥地处天津的优势,成立经济学院,并实行教学、研究并重的管理体制,经过几年努力,“学经济到南开”成为学界共识,南开的声望也大大提高。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关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各种的说法,比如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科学教育等,真是见仁见智。然最能体现其教育思想的,还是他在南开校训中提出的“允公允能”四个字(南开校训为“日新月异允公允能”)。《诗经·鲁颂》中有“允文允武”句,“允公允能”当脱胎于此。据孔颖达解释,“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因此用张伯苓的话来说,“允公允能”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对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以及“允公允能”的深刻含义,在台湾的南开校友雷法章有过精辟而精彩的解释。他说:“‘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地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依法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这就是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页144-145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页145页。

张伯苓提倡“允公允能”的原因。换句话说,贪污腐败的盛行,除了制度不良外,也是教育的失败。张伯苓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①这话对于那些不知有“公”、不外无“能”之辈,应是当头棒喝。

南开的管理非常严格。学校不仅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规定学生不许蓬头垢面,不许体态放荡,不许言语粗野,不许奇装异服,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考试不许作弊。据说校内每幢楼的门厅都有一面大镜子,上面刻着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重正,肩重平,胸重宽,背重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②许多人在回忆张伯苓时都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断,从此再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 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南开的学生会(即学生自治会)非常活跃。学生会不是学校的御用组织,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据 1955 年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的一份材料反映,当时这个组织已趋于成熟,机构也较完备。根据章程规定,该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学生大会,立法机构是系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从系级代表中提名,由全体学生普选产生。这份材料有一段话描写了当时的选举盛况:

在每学期改选的时候,规定几天为提名日;提名截止后,接着便是竞选日了,为期大约四五天。这几天是每个学期最热闹、最紧张,也是最令人兴奋的日子。竞选的方式不胜枚举。整个学校都被笼罩在民主活泼的空气里。无论你走那一条甬道,你都会看见两边墙上贴满了数不清的竞选海报——大至几丈长的画像和标语,小至书签一样的传单,甚至在往来于东院、南院之间的校车上,你也能看见“请选某某同学一票”的红绿标语。在这些竞选广告上面,推荐的同学尽量告诉大家他们所推荐者的能力和才干。而自己出来竞选的同学也都真诚地倾吐出他们的抱负和理想。这样的热烈地进行着。到竞选最后的晚上,有一个竞选演说晚会。在那儿,同学们用演说、歌唱等方式来学习这民主的一课。^③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153 页- 154 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154 页。

③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53 页- 154 页。

这种情境与南开“允公允能”的教育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南开大学的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传统社会培养顺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张伯苓深知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丰富而活跃的校园生活

除学生自治会外,早年的南开大学,各种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和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类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

成立这么多学生社团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曹禺小时候本来想学医学,后来考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中学就受到话剧熏陶,后来还在戏剧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

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1919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的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勿问‘为什么’——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①凌冰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类,就会把科学引上歧途。

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队精神。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伯苓就把话剧当作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一种好形式。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多少年后,人们仍然对它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

^①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源流页。

评价,并说张伯苓“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①。从此以后,每逢校庆南开都要上演话剧。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张伯苓对体育极为重视。他曾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至于学校运动会的总裁判,更是非他莫属。了解这些情况的人都说,张伯苓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与精神感召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开的体育,在抗日战争前是很有名的。从校史资料看,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的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并获得许多锦标。这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关。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②

为了让同学们在运动中获得心灵的愉悦,张伯苓提倡“仁侠”的运动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地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③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此外,南开的“壁报生活”也很活跃。据统计,1935年全校有140多个壁报社团,其中有系办的,也有社团办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这些壁报为大家提供了寻求真理、发表意见的园地,“完全是青年人爱民主、爱真理之表现”^④。

校园被毁 精神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军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月7日,《中央日报》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87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87页。

③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287页。

④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287页。

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①

日军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嫉恨有关。

早在 1935 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36 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教材，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②

1937 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值得一提的是，1938 年第 5 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标语“勿忘国耻”、“收复失地”，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猿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梅津就坐在主席台，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

①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86 页。

②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86 页。

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①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军经常骚扰南开，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显然，日军对南开恨之入骨。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7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②南开校园被毁后，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可见在抗日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多么一致。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③后来，蒋介石所说的“有中国就有南开”曾广为流传。这句话，他好像反复说过。南开校友唐贤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南开校庆，蒋介石都要亲临祝贺。1950年校庆时，他看到蒋介石到重庆南开中学探望张伯苓，临走时，他清楚地听到蒋介石对张伯苓大声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办学五十年，美名传天下

早在1937年张伯苓就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想把南开迁往四川。当时他利用开会之机到重庆考察，决定在沙坪坝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年初，张伯苓赴南京筹款，蒋介石表示支持，并认捐缘万元。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如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都纷纷捐款资助。当年愿月，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正式建成，张伯苓自任校长，并成立南渝中学董事会，张群、吴鼎昌、卢作孚、胡子昂等任董事。

1938年愿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共同负责联大工作。不过，自当年苑月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国民参政会方面。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一个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机构，其成员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张伯苓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源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猿园-猿猿页。

③ 《张伯苓纪念文集》愿页。

④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愿页。

以私人力量办学数十年,能获此殊荣,可谓名至实归。尽管如此,他还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54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人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1956年,源月,缘日是他78岁(虚岁)寿辰,他立下这样的誓言:“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①

这时的张伯苓已是誉满中外的教育家了。1956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来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重庆的南开中学。他回国后撰写《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1956年,1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

同年,源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从感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人们早已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但张伯苓向蒋介石表示,南开大学“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后来他还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人们对张伯苓不愿把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作过种种解释,比如说不愿意受蒋介石控制等,实际上有误读之嫌。一所大学由私立变成国立,不仅经费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张伯苓为什么要坚持改为私立呢?这与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事实上,不用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无视民间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不但不会把事情办好,还会挫伤每一个人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伯苓要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希望大家都对社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没有现代社会理念之辈,是不会理解的。

195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远月,怨日,南开旅美校友会,70余人在纽约集会,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周岁大寿。会上,老舍、曹禺朗诵亦庄亦谐的长诗一首,歌颂了老校长的伟业,表达了大家对他的钦佩——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162-163页。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唠，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是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做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作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诗中还写到日本鬼子对张伯苓恨得要命，他们甚至说：“有这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但在南开校园被毁后，老校长“抹一抹鼻梁”说：“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①

195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某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上述《另一个中国》在美国出版，胡适著文全面介绍了南开的诞生经过。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张伯苓的一段话：“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②

晚景凄凉与遗嘱之争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原稿，原表页。

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原稿。

1945年猿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还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巡视校园以后,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四十九年前,因感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决心从事教育。初与严范孙先生办学,学生不过五人,今日南开学生已不可胜计,中国经此次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他还说,我深信中国前途非常光明,因为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与各国比较虽然各有短长,但我们绝不能丢弃。①

正当张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让他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本来想请胡适担任,但胡适执意不肯。尽管张伯苓再三推辞,却还是拗不过蒋,只好勉强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师嘱咐两点: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请教师,素有和衷共济精神,今后也应该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时代,节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为国立,也要保持这一传统。可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私立”二字。

张伯苓是在1945年远月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先迁广州,再迁重庆,但还是难以立足。这时蒋家父子多次动员张伯苓前往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据说,当时傅作义曾向周恩来反映张伯苓还在重庆,周便托人给张捎来“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②的书信,从而坚定了张伯苓留下来的决心。

1945年缘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③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于怨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的“进步师生”对他并不欢迎。许多人认为他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了。张伯苓似乎不大甘心,他提出想到校园里暂住一段时间,想见见自己的学生,但有关方面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说这些遭遇对于“愈挫愈奋”的张伯苓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对这位古稀老人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年,12月15日是南开源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就作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④。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经过一个凄凉而漫长的冬天,到了1946年圆月15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

①《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猿园页。

②《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圆园页。

③④司徒允:《张伯苓的最后五年》,《逝去的大学》,猿园页,北京,同心出版社,圆园员缘。

殒岁。前几年他立下的“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的誓言,化为泡影。

张伯苓去世后,有几件事非常蹊跷:一是国内媒体反应冷淡,即使是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报道;二是张伯苓逝世后,溯天,追悼会才正式举行;三是张伯苓身后,居然出现大陆版与台湾版两份遗嘱。关于第一件事,媒体之反应功能已经改变,《大公报》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至于周恩来的行踪为什么不见报道,还有待相关档案公开才能了解事情真相。

关于第二件事,显然与前一件事有关。有意思的是追悼会既不在南开大学也不在南开中学,而是在南开女中的礼堂举行。悼词由多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宣读,这也可看出其规格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悼词开头有这样的话:“这个追悼会,适应了许多人感情上的要求;这个追悼会,可以起团结和教育的作用。”^①这些话似乎暗含着许多难言之隐,也表现出在当时语境知识界残存的一点顽强的个性。悼词还列举张伯苓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感悟,并且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已经“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下了,在他的遗嘱里他已向人民政府低下了”。这些话显然是犯忌的,诚如上文所谓没有“向人民低头”云云。

至于第三件事,则需要多说几句。据黄钰生介绍,大陆版的张伯苓遗嘱是由他执笔的。他说,张校长是 1951年 10月 10日中风的,当时已经“口角歪斜,不能说话了,但神智还清楚”,有人提议应该为校长写一个遗嘱,“比较起来,我和张校长最接近,在南开的时间也较久,所以大家推我起草”。他还说:“在伯苓先生逝世前三四天,我拿了遗嘱草稿,读给他听,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很清楚。我一段一段地念,他一段一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全篇之后,他挑大拇指,表示赞赏。”^②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张伯苓的家属和黄钰生之外,没有其他人。

尽管黄钰生在遗嘱中以张伯苓的口吻对新政权予以高度评价,说“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允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但对这份遗嘱,周恩来在审读时还是表示遗憾。

据说台湾版遗嘱的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即张伯苓逝世的前一天。黄钰生把这份遗嘱斥为伪造。他举例说,其中有些骈体排比的句子,比如“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闻跳梁,沐猴宁能成事”,显然“不是张

①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原稿页。

② 《张伯苓纪念论文集》,原稿- 溯页。

伯苓先生的口吻和笔调”。当然,台湾方面也不相信大陆版的遗嘱是张本人的意

愿。有人说,当时张伯苓已经是“身为楚囚,失去个人行动与说话自由”^①了。

除了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外,唯一不用争论的是:张伯苓走了,连同造就他的那个时代。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南开的名字还在,校园还在,但是张伯苓对私立大学的理解以及他创办私立大学的精神,却再也没有出现……

面对拓荒者身后还是一片荒芜的现象,后人也许会问: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作者:山西社科院研究员)

^① 《张伯苓纪念论文集》,源~源页。

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自己爱好的学科。在他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大,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1935年 10月 10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大学无疑地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1936年 10月 10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指出最要紧的是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主张把通才教育加入,即西文 翻译 课程 未得通过”。

他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1937年 10月 10日,战火即将烧到美丽的西子湖畔,浙大一年级在天目山的寺院中开学,竺可桢对新生演讲《大学生之责任》,仍是谆谆告诫他们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1936年,江西新办了一所中正大学,他在日记中批评:“余以为办工、农而无文理,实不大合理。……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也批评浙江新办的英士大学“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何能望其办好。……大学虽分设各学院,而实为一整个之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宜自分畛域”。1936年 10月 10日,他批评中央政治大学“学生风尚不重研究,所竞趋于入仕途,故学术空气不浓厚云”,显然表示藐视。1936年、1937年,他曾先后两次谢绝陈立夫、朱家骅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邀请。尽管校政繁忙,处于动荡的乱世中,竺可桢从没放弃过读书、研究,其日记有时就是密密麻麻的读书札记。从 1936年 10月到 1937年底,他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 100篇,其中有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颇受中外好评。从 1937年到 1938年(包括出国半年多、复员及应付学潮特别紧张之年),他也发表了专业和通俗论文 100篇。但 1936年 10月 10日,当他在返回杭州的车上读到美国的《气象学报》1936年 10月号时,仍禁不住感叹“其中多创作,余均不解所云。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在竺可桢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浙大的学术讨论之风盛行,数学系四年级的“数学研究课”具有独创性,物理系、农化系的读书讨论气氛也很活跃,教授与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让学生大开眼界。即使在纸张紧缺、环境险恶的抗战期间,浙大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也有 10多种,各种学术纪念报

告会不断。遵义时期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竺可桢不仅亲自主持,而且作了重要的学术演讲。

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们不难理解当年的浙大,从理工农科到人文学科,像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谈家桢的遗传学、蔡邦华的昆虫学、卢守耕的稻作学、吴耕民的果树学、夏鼐的考古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何以都具有第一流的学术水准,站在了当时各学科的前沿,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谈家桢回忆:“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当年,英国的李约瑟看到他们在土房子里写出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论文后,大为震动,禁不住感叹地说:“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是“东方之剑桥”。

“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

为了保持学术自由,竺可桢强调“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他认为大学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是造就具备智仁勇的完人,二是奠定学有专长的根基,三是养成自己独立思想的习惯和能力。1945年7月11日,抗战胜利在望,他提出“抗战结束以后,大学即须恢复常态,使它有学术自由的空气”。1945年8月11日,他在重庆和朱家骅、陶孟和等谈到战后高等教育时提出,大学要有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课程必须简化。

同年8月11日,他读到《大公报》社论《教育复员》中“关于大学的精神和风气,主张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所有党派退出学校,学生不准加入任何政党”的观点,表示同意,并把它抄在日记中。但他同时又批评《大公报》的文章“有许多处说来好像隔靴搔痒。有暇当为文论之”。8月14日,他即撰文《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认为“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

正因为他如此看重大学教育的功能,1945年春天,他才会犹豫中接受了这一任命。其中他夫人张侠魂的一席话对他触动很大。他在东南大学时期的学生陈训慈多年后仍清晰地记得师母的话:“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

的人 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的希望。”

从一开始竺可桢就想争得办学的自主权,他提出的三条要求中就包括“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这一条,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在以后的 15 年中大致上也做到了。1934 年 7 月 13 日他在日记中说:“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由于他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怀,在他长校的 15 年中,浙大是超越于党派之外的,倾向国民党的教授张其昀也好,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也好,倾向左翼的教授严仁赓、张君川等也好,都能施展才华,安心教学、研究,并不因为政治态度而有所偏废。浙大“无门户党派之争”让他一直引以自豪,他多次指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对办大学的基本信仰,必须有人人可以圣人之信仰,然后可以办教育”。他认为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学校更不应加入政党纷争,“余来此乃办学校而非办党也”。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深痛恶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这也是他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本来国民党规定只有党员可以担任训导长,但他认为聘训导长的标准应以“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在他心目中,先后做过训导长的费巩、苏步青等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1934 年浙大反孔游行后,他对导生马国钧袒露心迹:“目前,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中,只有我和梅贻琦先生两人,还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深知,政治上许多事极为复杂。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他枝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

国民党强硬势力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并不赞成部分学生热衷左翼政治,认为“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针对各种非议,他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心迹,如 1934 年 9 月 15 日的日记:“知外间批评浙大,谓余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此种一无根据之谈,本不足辩,惟众口铄金,难免人之轻信耳。”1934 年 12 月 10 日,他在与马寅初争论时说:“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余所痛恨,但吾辈存心须公平。”1934 年 12 月 17 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白修德所著《中国之震雷》时说:“对于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闻国内对于此书禁止购买,则大可不必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34 年 12 月 17 日,他在国外半年后回到杭州,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当时正是“五二〇”运动之后,学生自治会所出《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后,他在 12 月 17 日的校务会议上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

动。”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批评学生:“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但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召集会议讨论学潮问题时说:“以今昨两日申、新及杭州《正报》所登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故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与浙江省主席陈仪谈话时,坦承:“校中壁报确为左派学生所操纵,校中自应加以取缔。”当天下午他去看壁报,“在费珣壁报上见到捧张学良、杨虎城之文。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许多新闻译自《字林西报》,但均为对于政府不利之消息,盖得自共产党广播者也”。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浙大音乐教师沈思岩作曲的《贵州谣》、《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记中说:“均嫌政治气味太重。”

不过对青年学生的普遍左倾他有自己的看法,在 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的日记中,他以气象学家赵九章为例说:“九章于二十年前曾在工业专门为学生,后以思想左倾被校中所知,几于开除,乃离校,但目前可称为右倾阶级矣。可知左倾右倾,于年纪大有关系也。”

国民党在五中全会后,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竺可桢对此很反感。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在日记中提及,张其昀和陈训慈带来陈布雷的信,要他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之趋之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又有人要他填国民党入党书,他再次拒绝,“但以做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到 ¹⁹⁵⁵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大学校长。¹⁹⁵⁵年 9 月,他居然不顾压力,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费珣出任浙大训导长,当局曾规定这一职务必须是党员才能担任。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入国民党志愿书,甚至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从未付过党费,也未参加过该党的会议。他在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祸国殃民,认为宋之罪“贪污犹其次,而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罪为尤大也”。¹⁹⁵⁵年 9 月 1 日,他谴责金圆券吃人,“因此遂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他曾在日记中说,如果孔祥熙能明正典刑,“则可大快人心耳”。所以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陈雪屏几次来信要他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他都复信拒绝了。

直到 ¹⁹⁵⁵年离开浙大,他在 ¹⁹⁵⁵年中都坚持超越于党派纷争之外,完全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面目办大学,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

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曾索看过三青团浙大区团部的报告,“其中三次说及学校环境不适于青年团”。这绝非偶然。他认为:“学校之内,毋望有党派之纠葛情事。曾见若干学校,大部时日,浪抛于‘摩擦’之一途,斯诚堪为痛心。以是深冀在教授间无留美、留英之别,在同学间,勿执著同乡观念,更毋有左派右派之分。求学时期,固应以全力从事于学术上之研究也。”^{1955年 苑月 缘日}他进一步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

^{1955年 愿月 愿日},他和浙江省主席陈仪谈及大学思想,认为“办大学的方针以开导为主”。他的选择,当局当然不满,一方面他们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一方面却又将他与许多有骨气、有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同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1953年 源月 缘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同时,左翼学生也不满意他不是一边倒,^{1955年 缘月}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其实,如果不是竺可桢有着自己独立的选择,浙大又何以能成其大,又如何能包容各种不同观点、思想和价值。说简单点,浙大取得的成就,首先就建立在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基础之上。没有竺可桢的人格担当,没有他在夹缝中不偏不倚的追求,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这一切根本就无从谈起。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1955年 远月 愿日},竺可桢与学生谈话:“余认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十二年来之一贯政策。”早在^{1943年 源月 缘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但他深知:“……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生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他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的三要素,其中教授人选是第一位的,是至为关键的。谈家桢^{1956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因为他出身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想进国立大学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胡

刚复推荐, 18岁 的他竟收到了竺可桢寄来的浙大聘书, 聘他为每月薪金 1000 元的生物系正教授。多年后, 已是成就斐然的谈家桢感叹: “竺先生是‘任人唯才’, 是不讲派系的。所以, 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 我还听说, 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 也都由他聘来浙大, 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 并非仅我一人。”与竺可桢共事 15 年的苏步青也说: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 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 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

此前因为抗议郭任远的做法而辞职离校的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都被他一一请回来, 其中束星北因为“个性太强”, 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 许多人对请回他有顾虑, 竺可桢不顾这一切, 照样聘他为物理系副教授, 并很快升为教授。

竺可桢爱才如命, 唯才是举。他初来浙大, 带来了一批原来在东南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学生, 担任教授或要职, 如胡刚复、王琏、梅光迪、张其昀等, 外界有所非议, 但这些人确有真才实学, 为浙大增添了力量, 以后人们逐渐理解了竺可桢的风格, 他是用人不避贤, 也不避亲。

他聘请年迈的国学家马一浮等来讲学, 礼节极其隆重。对聘教师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并非只看重名气。1935 年 4 月 15 日, 浙大哲学系请到了 70 多岁的哲学家熊十力, 他认为熊对国学、哲学虽造诣很深, “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他说: “要发展一个大学, 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 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 21 日, 当他得知熊仍领北大薪水, 又说: “余数言此辈老先生之来, 徒事装饰品, 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 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 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 不能徒慕虚名也。”

浙大学生谢觉民在追忆中说, 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 “他们有品格, 有学问, 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 在教务会议上, 他公开指摘竺师, 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 只会看天, 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 有知人之明, 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 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 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他当训导长, 在他出事后照样全力营救。)像费巩、束星北那样有个性、有棱角、有脾气的教授还有, 但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 有包容的气度, 能容下那些有才、有学、有德的知识分子。1955 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 浙大教授就有 3 人, 仅次于北大、清华。谈家桢一再说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两个人, “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 都是胸襟开阔, 气度宏伟, 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 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在竺可桢 18 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病故,他都关怀备至、悲痛毕露。黄翼去世后,1935 年 10 月 15 日,他认黄之子黄章恺为义子,赠以红玉一块、银笔杆一枝。梅光迪生病后,他不断前往探视,其中多次专门约医生李天助一起去看望。1935 年 10 月 15 日梅死于贵阳,他于 15 日专程赶赴。黄、梅、张等先后病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以至于流泪,每次都说:“浙大失去一个良师,国家失去一个人才。”他总是亲自主持追悼会,尽力照顾家属。1936 年 10 月 15 日张绍忠去世,10 月 15 日他提议在图书馆挂黄、梅、张、朱四人像。1936 年 10 月 15 日是黄翼去世四周年纪念,他约黄翼太太去凤凰山墓前致祭,再到张绍忠坟地上视察。

竺可桢长期以来关心教师,让不少教授永生难忘,苏步青的回忆就是证明。1936 年 10 月 15 日,远在美国的竺可桢写信给苏步青、卢嘉锡等,说:“惟沪杭一带物价日高,而薪俸菲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弟虽远在海外,无日不在怀念之中。虽前月政府曾有调整,但近顷美金波动,影响物价甚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沪杭密迩,而生活程度亦相差不远,但公交人员待遇又相差甚巨。”他表示已写信给朱家骅,请其从速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将杭州待遇改成与京沪一律”,给教职员配发公粮。这封信在 10 月 15 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表时,信前加上了“竺校长关怀员工生活 建议教部配发联总食粮——竺校长致苏教授等书”的标题。10 月 15 日,他为“教职员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时期”而忧虑,一回国即不停地奔走在南京、杭州之间,主要是催要经费。1936 年 10 月 15 日,他在《大学教育与民主》的演讲中说:“所可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到了 1936 年,在风雨飘摇的最后几个月,他更是成了一台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政要之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这是竺可桢来浙大的第十三个年头,他迎来了 70 岁生日,真心爱戴他的浙大师生要为他祝寿,他于 10 月 15 日刊出《启事》:“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历来生活简朴,身无长物,乃至朝不保夕。1936 年,遵义物价飞涨,一日三变,他从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据(已经期满),一共 1000 元,不过能买几担米,“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1936 年 10 月 15 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薪水未发,一月份钱早已用光。允敏说无钱买菜,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适读富兰克林自传,内有致富之道,言极扼要,

因急译出,以饷无钱买米的同人。”¹⁹³⁹年秋,竺可桢夫人陈汲(允敏)离杭去南京,向沈思屿借了路费(人民币 1 万)才得以动身。¹⁹⁴⁰年大学校长最后竟一无积蓄,让人难以置信。¹⁹⁴⁰年,在西迁途中,他的夫人和次子因为痢疾在 1 天内相继病故,他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始终把学校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整天为校务奔忙。

¹⁹⁴⁰年 远月 1 日,他在日记中说:“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允敏并当面告知,谓私人决不要公家之物来用。余意以后凭余开条签名取物。”从这一小事中不难体会到竺可桢身为校长以身作则、决不苟且的品格。

他多次标榜浙大的教授治校精神,认为浙大校风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¹⁹⁴⁰年 怨月 1 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尝中断,¹⁹⁴⁰年 10 月 1 日、¹⁹⁴⁰年 11 月 1 日、¹⁹⁴⁰年 12 月 1 日、¹⁹⁴¹年 1 月 1 日、¹⁹⁴¹年 2 月 1 日、¹⁹⁴¹年 3 月 1 日、¹⁹⁴¹年 4 月 1 日、¹⁹⁴¹年 5 月 1 日、¹⁹⁴¹年 6 月 1 日、¹⁹⁴¹年 7 月 1 日、¹⁹⁴¹年 8 月 1 日、¹⁹⁴¹年 9 月 1 日、¹⁹⁴¹年 10 月 1 日、¹⁹⁴¹年 11 月 1 日、¹⁹⁴¹年 12 月 1 日,竺可桢在日记中都详细记下了选举情况。¹⁹⁴¹年 12 月 1 日,他在日记中感慨:“抗战以前,浙大教授对于校务会议漠不关心,故开会时常不能足法定人数。近来因生计关系,各觉有切肤之痛,故渐渐认为有开会之必要,而同时对于学校,亦认为与己休戚相关。此则不得不认为一种进步也。”

¹⁹⁴¹年 远月 1 日,他从欧美考察归来,在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说,浙大的精神体现在“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向由教授会主持,这是浙大的民主,本人笃信民主精义,所以一切校务,都按校务会议的决定执行。¹⁹⁴¹年,当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与校务会议的决议有冲突时,他在 远月 1 日写给王季梁的信中说:“第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他为学生不理解这一精神而遗憾。他为什么将教授治校放在学生自治之上?这年 10 月 1 日,他对应届新生训话时说得很清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取教授治校。”

特别要提的是他对浙大教师的爱护。¹⁹⁴¹年 10 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玑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并为费玑的性命深为担忧,为此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竭尽所能,其日记有关费玑的记载至少有 20 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

不仅对费玑,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¹⁹⁴¹年 10 月 1 日,浙大外文系讲师冯斐被捕,1 日由竺可桢、梅光迪等三人具保获释。¹⁹⁴¹年 12 月 1 日,束星北来谈数学助理徐某事。“徐昔年曾为共产党员,但曾悔过。增禄且来函说明,保证其不为政党活动。但余知保证并无用处耳。但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

¹⁹⁴¹年 10 月 1 日,“于子三事件”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

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他从李四光那里也听说浙大教授中有共产党活动,但他们都不肯说姓名。他想起三四年来多次接到教育部公文,说张君川教授可疑,曾告诉张,请他为文申白。受他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亦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的问题,从而产生为什么民养活官、官压迫民等现象的学术讨论,也就产生初步的民主思想。浙大对学生运动都予支持,当局无情镇压,都受到竺校长暗中保护。费巩教授遭受迫害后,当局偕一美国人借故审问我们,指责我们不该开设戏剧班、现代文学班,在文庙街遥遥相对宣传异党主义,当时竺校长就在隔壁,非常担心。幸赖他的关怀,现代文学班遭到解散作罢,遭逮捕传讯的学生,由竺校长力保得以释放。……于子三事件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夤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

1935年11月11日,竺可桢在对浙大学子演讲时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希望大学生成为一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他把大学教育首先看作是道德教育,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他要求学生切记,以后遇到作弊机会时能否拒绝,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试金石。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活动,只要在学校他都要亲自主持,并发表简短演讲,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学生刘奎斗回忆:“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方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归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

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告诉学生:“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

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他希望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要不顾利害,只问是非;“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

竺可桢爱生如子,浙大上下无不有口皆碑。抗战期间不少学生患病,他经常去看望病中的学生,有急病需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遵义时期,他曾对当地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爱护学生、竭尽全力保护学生、始终信任每个学生都是善良的,这是竺可桢作为一个校长最伟大的地方。但他并不一味地溺爱学生。西迁途中,从泰和到宜山,由 苑个学生组队从水路押送很多同学的行李,因为传闻敌军来而弃舟先走,导致一船行李全失。陈训慈 员年 苑月 苑日的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几天后的全体会上责备他们,可以说声色俱厉:“这种受公众委托,承担不了责任,而敌未来即弃舟而逃。轻信传来谣言是不智,不负责而损害友物是不仁,临危弃公众之物是不勇。……所以此非小事,是我们迁校之大辱。……教职员未善尽导致之职责,也是浙大之奇耻。今后必须以此事为教训,树立知勇负责之学风。”(竺可桢日记大致相同) 员年 苑月,浙大学生、三青团干事谢力中因为购盐等舞弊,被学生告发,将被开除,到竺可桢那儿哭诉。竺日记两次提及此事,一曰:“余告以自作自受,乃大丈夫应有之态度,不要哭哭啼啼,作小儿女态。即使开除,亦非绝路也。岂有堂堂大学生,而尚不能谋生乎?”二曰:“余勸嗣后作事,务立定脚跟,不稍以私而害公,致遭人攻击,则此次之打击亦为良好之教训也。” 员年 苑月 苑日,因为有学生在壁报上张贴文字骂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双方冲突,他一方面要骂人的学生刘忠潮承认过失道歉,一方面担心其安全,留他和自己的孩子同房居住。

竺可桢的老友、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他并不赞同学生热衷政治活动,却主张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 员年 缘月 缘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五个字。他对 员年 源月到 员年 源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 缘天,其中例假 员天,星期日 远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愿周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然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始终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终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

面对汹涌的学潮,竺可桢在 员年 员月 缘日的日记中说:“余始终认大多数

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56~~1956年源月员日他在浙大周年纪念会上郑重表示：“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56~~1956年愿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表示对浙大罢课学潮之印象极坏，甚至说“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竺可桢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

到~~1956~~1956年圆月，当局多次要他开除左派学生三四十人，以为这样学校就可以安静。但他认为这一办法只能收效于一时，“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校中并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省府所给名单未必可靠，且昔年被捉去之学生如滕维藻、潘家苏、王蕙诸人，迄今均在中央政府做事，亦不见有异。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远月员日，当局又有人主张大批开除学生，他依然坚持“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如欲施行，亦必须另派人前往也”。愿月员日，当局交来一个名单，要逮捕浙大师生~~1956~~1956人，其中有张君川、冯斐、曾明洲等教员源人。竺可桢表示：“学校只知学生在校是否守法或安分守己，更不知其暗中有何活动。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每次当局要求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是“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何以服人”。

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曾对陈布雷说：“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当年求学浙大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吕东明回忆：“他也并不因为学生的政治倾向而在爱护上有所偏颇。他历来主张学生政治信仰自由，在学校里各种思潮、主义都可以研究，但不能从事政党活动。他对违反校纪的学生也不问政治态度，一律按校纪处理。尽管校内外国民党一再责难他包庇纵容左派和共产党，他很不为以为然，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爱护学生的态度。”学生吴耕民也回忆：“每次国民党军警要来捉学生时，竺先生得知后，立刻通知我们叫有关学生暂时避开，作好必要的准备，以免牺牲。”竺可桢提到的滕维藻、潘家苏、王蕙，还有邵全声等，都曾遭国民党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

~~1956~~1956年员月员日，遵义浙大学生发起“倒孔”游行，他虽然不赞成学生上街，但在劝说无效之后，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他不仅亲自步行到步兵学校，要求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而且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头。学生杨竹亭回忆，他当时对学生说：“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我们学校进行培养教育，我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是有责任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出去游行，我带你们去，但是一定要有纪律。”

~~1956~~1956年员月圆日深夜，浙大毕业留校的助教潘家苏和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受到湄潭当局搜查，栽赃陷害，随后被拘押在遵义。事发之初，竺可桢专程赶到湄潭，之后几次亲去探望，派人一日三餐去送饭菜，并四处收集有力证

据,千方百计地营救。即使脚上冻疮破烂,依然忍痛跛脚交涉。最后他终于找到确证,并出面具保使两位被诬陷的学生于源月 圆日获释。“潘家苏是个好学生”,这句话曾让潘和他的家人感念一生。

其时教育部调查浙大“倒孔”运动,要求开除一批学生,贵阳、遵义的特务机构还要捕拿被认为是策动“倒孔”运动的学生陈天保、张由椿等。他们怕布告出来行动发生困难,要求学校的处分布告缓三天,竺可桢答应了,等他们悄悄地安全离校,才布告开除。圆月 圆日,浙大史地系四年级女生、“黑白文艺社”社员王蕙只不过在“倒孔”大会上讲了几句真心话,就被秘密逮捕;第二天,国文系学生、“黑白文艺社”第二任社长何友谅被捕。圆月 圆日,“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社员、电机系学生陈海鸣被传讯(经竺可桢等努力保释,最先获释)。

何友谅与王蕙先是被押往贵阳,再被送往四川重庆青木关附近的五云山集中营,所谓的“战时青年训练团”。竺可桢一直挂念着这两个学生,对他们的处境甚至一点一滴都关怀备至。这一切都记录在日记中,比如 员年 员月 圆日,他为了王蕙、何友谅曾专程去“青年团”见康泽。尤其感人的是,这年 缘月 圆日,他到重庆公出时专门去看望他们,步行七八华里之遥上五云山,可惜何友谅因逃狱被抓回受到严密监督,不能见客,只见到王蕙,所以他“颇失望”。归途他坐车到青木关,在车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物加手铐者来”,不禁“为之泪下”。王蕙曾为年过半百的校长顶着烈日,爬山来看望她而无比感动。很多年后,当她读到校长当年的这段日记时更是感慨:“他不说自己在烈日与敌机威胁下为两个学生受惊受累,却记下他为青年学生受难而同情落泪。如此校长,岂不胜过父母!”她说:“我们都是普通的学生,但竺校长却费尽心机,多方营救。”王蕙最终由竺可桢保释,何友谅却惨遭杀害。竺可桢对此心痛不已,一直引以为憾。

几乎每一次浙大学生被捕,竺可桢都竭尽全力援救,绝不袖手。员年 苑月 圆日,当他得知浙大女生卞坤以“共党嫌疑”常被国民党遵义县党部审问,他即表示:“嗣后如有传问,可以不往。”员年 源月 员日,当他得知参加青年军的浙大学生王香耕、易钟熙、李家镐、程士伟、徐铭等被 圆师军法处拘捕,当天就去找康泽,康的意见是写信给青年远征军训练总监罗卓英。他却于源月 圆日,亲自赶到綦江,向 圆师师长罗泽闾询问学生被拘的情形,要为他们担保恢复自由。

员年 因为费巩“失踪”案含冤入狱的浙大毕业生邵全声在《虎口脱险记》中回忆“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逃生出来”的那段经历,不禁泪眼模糊,特别是当他看到竺可桢日记,得知校长在日本投降的大喜日子中还惦记着他,感动之情难以言表。(员年 愿月 圆日竺可桢日记说,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狂欢”,“又知邵全声迄未释放”)竺可桢自始就相信邵全声是清白的,认为费巩是否已被害虽不能断言,“殆非邵之所为,则可断言”。他一再声明,但重庆卫戍司令王瓚绪“均不得复”,虽然深知“营救亦非易事耳”,竺可桢却从未放弃营救。邵全声说自己在浙大读书时和校长很少个人往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并且当他在重庆被捕囚禁

时,已离开浙大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三年多,并非浙大在校学生。他永远忘不了在押期间竺可桢几次亲来探视:“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直到获释后回到浙江临海家中,他才知竺可桢每次营救之后都把经过情形扼要写信给他父亲,前后有十来封之多,信虽简短,但其中营救之艰难、曲折尽见,可见其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对学生完全出于至诚。《竺可桢全集》保存了多封写给邵父西镐的信。

1957年 10月 14日,竺可桢得知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就马上开始活动,到处给有关当局打电话,又是民政厅、又是警察局、又是省党部,又是保安司令家,又是省政府秘书长。他要求保安司令转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应送法院,如无,则由余保释云云”。当天他赶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处,再三交涉,坚决要求保释,未果。14日,他要求见被捕学生,当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郑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续办理”。15日晚上 10点半,他还打电话要求保安司令部将学生移交法院。16日上午,他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责怪他们“爽约”,没有及时送学生到法院,他主持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营救,并劝说学生不要罢课。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于子三在狱中被害,他与医生李天助、学生代表二人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于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只在另一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 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时”几个字。由于连日奔波,日夜操劳,还要处理日常校务,吃睡都不正常,体力不支,加上心情难受,他竟当场昏晕了过去。17日 10月 17日,他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总之,学校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仗义执言,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震惊全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认为“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更难得的是,他曾在这关键时刻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

11月 14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判处浙大学生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人有期徒刑 3年,竺可桢嫌判决过重,认为是法院屈从党政压力,“此案政治性重于法律性也”,亲自到南京向有关方面诉说不公,并以法律途径向高等法院上诉。期间他不断地与律师约商,尽心尽力,尽管一切努力都石沉大海。

每次被捕学生家长去狱中探视,他也都尽力帮助、写信介绍。1958年 10月、11月,浙大学生吴大信、李雅卿先后被捕,他虽无力挽回他们被判刑的结局,但为保释他们、为争取尽可能公正的法律审判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他始终站在爱护学生的立场,当年 10月 14日,教育部转来的情报指控说:“自 10月 14日由此间会同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校长之态度即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在列举了六项事实后指出:“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总上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

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竺可桢在日记中抄录了这份情报,认为所有指控都是子虚乌有,“余素来主张政党不要入学校也”。

苏步青回忆:“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修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50年圆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竺校长说:‘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昀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释出来。”对此,竺可桢日记都留下了或详或略的记载。

“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

除了坚持教授治校,竺可桢也主张学生自治。1950年 5月 圆日,他对学生说:“全体同学本着服务的自治的精神,爱护自治会。须知自治会是全体同学的事,并非几个代表、几个干事的。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他曾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说中对学生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学生自治正是对学生各种品质特别是牺牲为公的服从精神的自我训练。

但他对学生自治会的做法也不是一味认同、纵容。1950年 5月 缘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自治会要以全体浙大学生名义发表呼吁停战宣言,他认为用“全体”名称不妥,这样做必须通过代表大会。1950年 5月 圆日,于子三被害几天后,浙大学生在群情激荡中举行自治会代表选举,结果当选代表当然是以左派学生为主,他在日记中说:“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代表 怨人已选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然而,当年 5月 圆日,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浙大解散学生自治会时,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对浙大“民主墙”——学生自治会办的生活壁报(后改名费巩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认为学生以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是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遵义时期,他曾亲自书写“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壁报上,允许学生用真实姓名或笔名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50年考入浙大的林昭回忆,学生在壁报上时常发牢骚,甚至冷嘲热讽近乎谩骂,“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造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

从1957年11月1日起,不断有人向他反映学生在壁报上匿名攻击政府、个人,校方受到很大压力。11月1日他对学生说:“民主国家固有言论的自由,但言论应负责任,不可出以谩骂,更不应冒用他人的名义。今后《生活壁报》必须用真姓名(如用笔名亦需以真姓名通知编者)。”11月1日,教育部密函指控浙大的《自由堡垒》、《今天》、《虹》、《生活》、《石榴花》等壁报“内容均极反动”。竺可桢只是重申壁报发表文章要用真姓名,他在11月1日说:“但无论如何,壁报上写真姓名是言论负责,此乃无可否认,绝不能让步者也。”11月1日,他对学生说:“以目前校中以言论自由而造成之危机,因外间均责难浙大包容反动分子,甚至有捕人之可能。特务所注目者为郑文炎、刘茂森等。余不愿见有捕人之举,因此更不能不用审查制度,庶几言论自由校中可以酌定尺度,同时亦可以向外负责。”他对自治会代表说:“目前学校因言论自由溢出范围已到危险时,故校中不能不将审查之权收回。”11月1日他与壁报审查委员会“议决凡壁报文字具真姓名而有登记者经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即可招贴”。其实这种精神与胡适一贯倡导的“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的言论”是相一致的。

即便到了1958年,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要求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强行加以干预。

当学生自治与教授治校的精神发生冲突时,竺可桢主张以校务会议为依归。1958年11月1日,他对学生说:“目前之困难乃在有二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故学生壁报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修改。至于每个学生在校之自由,学校必须予以保护,如读书自由不能由自治会组织纠察以剥夺之;身体自由不能由同学随意听信谣言、任意搜查。”

他曾对学生自治会代表说:“自治会尽向余致敬、献旗,而从不听余之劝告,其矛盾极为显著。余素来以君子待人,故凡事均主张从宽办理,但如内部秩序不能维持,则外力自必侵入,我即不能为同人、同学作任何之保障。故校务会议之决议案必须执行,不得抗衡;自治会章则但保障骂人,迭次发生纠葛,故必须加以更正。”

我们可以看到,在竺可桢主持浙大的1957年中,浙大学生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学生自治,它和教授治校一起构成老浙大的重要传统之一。

另外,我们不能不提及,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知道他们的校长竺可桢一丝不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哪怕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司也绝不通融。1957年11月1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女儿沈致平考浙大中文系时,“国文100分,但数学只80分,平均86.7”,浙江参议会议长张毅夫之子张国维,“考文学院一年级,国文

名的《上校长书》,但他“告以目前精力日衰而事务繁杂,已非余力所能任。且余如辞去,必须有接替之人,不致挂冠不顾而去”。猿月 圆日,廿九级毕业生 源人签名挽留,他再度表态“决不随便撒手而去”。直至 员源年 源月 圆日离开浙大之际,他关心的仍是学生的安全,他在留给严仁赓、苏步青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最终于狂风骤雨中仓促出走,是因为当局保证“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之释然”。他到上海后,浙大师生多次来函、电,促他回校。员源年 远月 圆日,他致信王国松、蔡邦华等表示:“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更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力强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

竺可桢的 员源年浙大校长生涯在连天炮火和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结束,他在动荡乱世中创造的奇迹,他对大学理想的坚持,无疑都融入了可供后人借鉴、反思的现代中国大学传统。从根本上说,他所实践的大学传统,即是哈佛传统。员源年 怨月 员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中引述康诺德校长的话说:“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他概括指出:“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灾)拉丁字 灾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他将“求是”确立为浙大校训不仅有求真知而且有求真理并不惜牺牲的意思在内,这与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分不开的。他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改换,追求真理的目标,也就是科学的精神则永远不变。在他看来,科学家应取的态度首先就是“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以其生命最大限度地践履了这些理想。

至 员源年,竺可桢仍强调作为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绝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毫无疑问,他把大学也放置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他所坚持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因此有了牢固的根基,有了不竭的源泉,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他这个“书傻子”大学校长也因此而成就了伟大。

(作者:自由撰稿人,现居杭州)

唤醒上海交大的文科记忆

■ 摇刘佳林

如果说空间安置具有文化意味,那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办公地点的位置就不能看作是纯粹偶然之举。在这以工科著称的学府,人文学院被设在徐汇校区工程馆三楼。我相信,第一次走进这学院的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1994年12月底,我来到这新单位时,就近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以后每次参加全院教师大会,常常走过机器人研究所,看到各种新奇陌生的实验室名字,我总不免怀疑自己是否跑错了地方:一个搞外国文学的人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久,校史办组织一班教师撰写交大文化名人小史,我有机会熟悉这个百年学府的过去。当看到撰写提纲所开列的一长串从交大出去的文化名人时,我实在大吃一惊,原来许多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名家竟然出身交大,比如翻译荷马史诗、《飘》、《红字》等经典的傅东华,著名的英国文学学者范存忠,国内较早介绍并研究裁缝艾略特的叶公超,更不用说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了。原来,这个学府、这个藏身顶楼及走廊深处的人文学院还有一段别样的历史记忆。原来,我与他们有缘。

可是,在今天偌大的校园,有多少人知道并了解上述历史名人呢?有多少人敢相信他们的交大身份呢?又有多少人愿意承认,交大还曾有过异样的辉煌呢?对于这些息影于记忆的褶皱深处的文化人来说,今天的交大人需要经过刻意回忆和仔细求证,才能确认他们与我们的血缘,这个学校对文科的记忆委实太淡漠了。

如此说来,人文学院被挤到工程馆三楼的一个角落,也就在情理之中。

追溯交通大学的历史,人们总是从盛宣怀说起。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首席实业家自 1870 年入李鸿章的幕府开始就涉足洋务运动,在兴办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铁路、银行、纺织的过程中,他常有乏才之叹。1895 年,盛宣怀怀着“兴学强国”的伟志,奏请清政府批准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其《条陈自强大计折》说:“育才之要,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又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8 年的《请设学堂片》在比较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选拔人才去西土就学之后说:“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由此可见,交通大学创始人的初衷是希望他所创办的学校能够培育出超乎小道末技,有厚实的根本、开阔的眼界和大气的胸怀,可以创新致远的卓越人才。他说:“造就人才,大处着笔,方能开风气之先,挽中国积弱之政。”

1898 年,清政府批准设立“南洋公学”,盛宣怀任公学督办。他四处网罗人才,聘请何嗣焜任总理(校长),美国传教士、南京汇文书院前院长福开森任监院和西文总教习,前梅溪书院负责人张焕伦为总教习(中文教务长)。盛宣怀还亲自谋划学校结构、办学模式等,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通识教育成为学校的基本理念,此理念在学校贯彻甚久。

南洋公学第一任校长何嗣焜始终把“中学”放在首位,特别强调学习中国的经史之学,认为这是贯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基础。1898 年,何嗣焜参观天津中西学堂,发现该校学生汉语水平太差,不熟悉中国文学,学生如果一味学习现代科学和外国语,结果只会变成中国文化的装饰品。因此,他建议盛宣怀南洋公学“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使学生“接着就能够用规范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样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何嗣焜还开办了师范院、外院、译书院、东文学堂等。

公学的第二任校长是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他奉盛宣怀之命于 1904 年亲自草拟《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主持开办南洋公学特班的筹建与招生。因为当时上院(大学)缓办,而人才“相需方殷,缓不济急”,特班就成为“储国家梁栋之才”的一种形式。盛宣怀对特班的期许很高,他要求学生“器识以正谊明道为宗,志趣以遗大投艰为事,经济以匡时济物为怀,文章以切理饬心为贵”,“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即希望学生能够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如此办学理想恐怕是当今交大人所不敢奢望的。

从 1917 年改办工科到 1925 年,学校一直由唐文治校长主事,他对国文的重视,成为这时期交大的办学特色。专科从一年级到毕业都设国文课,课余还有许多与国文相关的活动。除此之外,1918 年在设置铁路和电机科的同时,学校还增设国文科,地位与工科专业并列。国文科不招专业学生,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国文教学。有论者指出,国文科“可说是开创我国高等工科学校中设立中文系的先例”。自 1918 年到 1925 年,唐文治在星期日亲自主讲的国文课和一年一度的国文大会(作文比赛)从未间断。唐文治在主事后期,双目已近失明,仍坚持上课,背诵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发音铿锵洪亮。那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专业意识都不像现在这样强烈,文理分科也不像现在这样水火不容。尽管当时也有人打着强调“西学”的旗号反对唐文治的做法,但唐校长始终坚信,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用一个“旧”字就可彻底否定。出于对祖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化在科技社会铸造中国科学家心魂之不可替代性的认识,这位国学功底深厚又不乏现代意识和眼光的大师,始终坚守着交大的国文讲坛。

1925 年交通大学组成以后,学校领导层不断变动,叶恭绰“尽力致用”的办学思想逐渐落实。在特殊的社会境况下,强调实业救国、学以致用思想可以理解,但如果始终把大学的根本理念固执于“致用”,那就未免近视了。事实上,对国文的轻视很快就露出弊端。1925 年 5 月,凌鸿勋校长发现本校毕业生“文字浅浮”,而“国文应用甚宏,关系重大”,毕业生将来“若乃言之不文,至为憾事”,“欲免每况愈下,必极为继长增高之谋”。于是重新提倡国文,并举行国文竞赛。1925 年蔡元培任校长后,他一如既往地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提出三科(理科、工科、管理科)并重的方针,并建立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五个系。1925 年秋,国文扩充为中国文学系。到 1927 年,这个系一直存在着,并承担为理、工、管理各学院讲授中国文学与公程式课程的教务。

二

除了制度安排,当年交大校园的人文景象是如何郁郁其盛,笔者可借助若干零星回忆去想像一个大概。

据校史记载,1927 年到 1928 年间,师范院的学生每逢入学、散学及吉月、朔望都要祭祀孔圣,行三跪九叩礼,并唱院歌《警醒歌》。学生沈庆鸿回忆说:“每朔望,总理何公梅生(何嗣焜)暨张师(指总教习张焕伦)率师范同学全体,均穿礼服(大帽、大袖对襟天青马褂、长袍、尖头靴),至圣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赞礼员黄圃生提出此歌章目,师范生乃应声唱歌词。奏乐者以箫管和之。当时一种庄严景象,今尚留印于余之脑中。”在 20 世纪初,维新之潮日高,西学之渐日深,此类祭孔仪式未免不合时宜,但换个角度看,这类校园活动不妨可理解为是承续儒学传统、

立足中华本位的一种文化姿态,其使命感、庄严感远远超过后人从仪式所窥见的复古之意。《警醒歌》最后一段云:“警警警 水东流 日西辘 朱颜弹指成霜鬓 策弩马追八骏 九达之衢苦不迅 矧乃绳藤凿迂径 玩物愒时 买椟珠谁问 醒醒醒。”这种时不我待、扬鞭奋蹄的铿锵警句,实在是对当时的先知先觉者的历史心境的痛切写照,这就是:他们在听到西方人昂首阔步出征世界的阵阵足音后,已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老迈的中华帝国已无可规避地被纳入世界史、现代化的版图,不进则退,若继续玩物昏睡,终将遭奴役以至于淘汰。

从学校的课程安排及教学活动看,新质的人文观念也逐渐得到体现。在蔡元培任班主任的特班,教学上实行新式教育法。特班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数学,间以体操。据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蔡元培)指导读书之法,手写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之书目,以及阅读次序。门类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论理、伦理等,每一学生自认一门或二门,依书目阅读,每日令写札记,手自批改。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手自批改。每夜招二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自述对时事感想。正课之外,劝学生习日文,自行教授,并指导学生练习由日译汉。此外,鼓励学生练习演说及国语,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其教导重心在于灌输爱国思想。”可见,特班学生在所研习的科目选择上是很自由广泛的,学习者的自主意识得到尊重,而教育的指归则是爱国。学生主要靠自己阅读,辅以教师讲解辅导。蔡元培要求每人每天须写一篇阅读札记,交他批阅,隔一二日退回一次。每月命题作文,亦由他亲自批改。下面是特班学生李叔同当年的一篇作文,题曰“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文曰: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昔日南洋公学学生有着怎样的政治见识与胸怀。

肃穆庄严的祭孔仪式、激越铿锵的励志院歌、新式自由的教学活动、学生习作表现出来的剖析强权的新思维,这一切都构成了历史上的交大人文风景中的华彩乐章。而文化怪杰辜鸿铭博士的出现,则另成一道生动的奇观。

1895年前后,辜鸿铭在南洋公学任教务长,兼任中院的西洋史课务,傅东华刚好是他的学生。显然这位老师给学生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四十年后的1935年,傅东华对当时课堂上的辜鸿铭仍记忆犹新:“他每天头戴珊瑚红顶瓜皮帽,脚蹬缎绑粉底快马靴,穿一件团花杏黄袍,束一条天青丝绦带,后面垂着两流苏,前面挂着个腰圆绣花眼镜袋,上罩一件枣红团花大袖的马褂(这是他典型的服装),背

后拖一条光油油又肥又长的黄发辫(辜先生须发都像西洋人一般金黄,这是我们始终猜不出的一个谜),黄髭须边浮着一个猫儿脸的微笑,胳膊窝下夹着一本《迈尔通史》,微微弯着腰背,摇摇摆摆踏进课堂来,便往讲台椅上一虎坐下。”这恐怕是我们能拥有的关于民国前交大文科教师形象的唯一一幅工笔细描的肖像。下面是更为动态的描写。

辜鸿铭“却不就讲书,先把右手的两个指头装作个空圆筒模样,凑上了眼睛,又把左手也装成空圆筒,接上右手的圆筒,像摄影机的镜头一般向四周照了一下,向我们道:‘记得吗?’我们齐声回道:‘记得。’他这才又把左手的圆筒凑上眼睛,右手的圆筒接上左手,同样向四周照了一回,又问道:‘懂得吗?’我们又都回道:‘懂得。’他于是微笑点头,表示满意”。

不知情的人如在教室外看到这场景,一定以为辜鸿铭是在和学生游戏,实际上这近乎滑稽的表演却传达着他独特的思想和良苦的用心。辜先生的手势模拟一架望远镜,换手便是把望远镜掉个头。他告诉傅东华们,读西洋史应以我为主,我们是中国人,外国人则是夷狄,如果中国人不以自己为本位,难免要化为夷狄。也就是说,这位一直被指斥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怪杰却在教育学生要建立文化上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年轻的学子来说,这样的思想未免高深,于是他苦心孤诣,创造了望远镜这样的比喻。他第一节课这样做,以后每次都要演习,不断提醒。这种不断重复的动作不但在傅东华的心灵上刻下了烙印,也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从事翻译,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设桥梁,而最终目的则是服务于中国的文化建设。

望远镜的游戏结束后,傅东华便按辜鸿铭的指示“~~裁~~~~吐~~~~嗽~~~~弄~~~~燥~~~~燥~~”打开教材。但辜先生并不照本宣科,他把书啪地一合,就海阔天空神吹起来。傅东华就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跟着老师的思路遨游上下数千年,十万八千里。几个月下来,辜鸿铭问他们讲到哪儿了,傅东华和同学们齐声答道:“~~弄~~~~弄~~~~燥~~~~燥~~”考试了,学生们都很担心,辜先生则轻松一句话完事:“你们自己去预备罢。~~云~~~~呢~~~~呢~~~~呢~~~~呢~~”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辜鸿铭仍然演习望远镜,但这次不是“用夏变夷”,而是“尊王攘夷”了。进步的学生愤怒了,他们包围教务处,驱逐辜鸿铭。辜鸿铭气得面孔发青,黄髭须直抖,满口喷着白沫。直到唐文治校长派的救兵来到,辜鸿铭才被救出重围,最后离开了南洋公学。

从辜鸿铭自由散漫却别具一格的教学风格可以想见,其时学校的人文环境相当宽松。南洋公学给了辜鸿铭一个空间,给了他尽情表演怪异个性的讲坛,这在今天近乎不可思议。由此也可发现,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委实在近现代中国的大学被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

正是由于对人文教育的重视与倡导,许多杰出的文化人才得以在这块土壤上成长,他们在校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始终抹不去交大校友的身份,从而为交

大校史增添了诱人的光彩。特班后来虽然很快解散,但该班许多同学最终都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人物,比如以弘一大师闻名于世的李叔同,做过北大校长的胡仁源,民国闻人邵力子、黄炎培以及文学家谢无量等都是特班的学生。即使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人文传统的保持也非但未削弱学校的工科教育,反而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更为那些有文学才干的人在一个工文并重的环境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比如经过交大的人文熏陶,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声名卓著的巨子名单上,便有新闻工作者邹韬奋、英语教育家许国璋、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范存忠、历史学家戴逸以及诗人屠岸等。

三

1949 年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上海交大也陷于迁徙颠沛之境。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嗣后的迁校西安以及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各自独立,更是明确了交大的工科地位。从此,文科的脉息便在上海交大越来越弱了。

但曾发生的一切总会或显或隐地活在交大人的记忆中。1954 年,时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的邓旭初在考察发达国家的高校后,重新提出理工科大学办文科的话题。交大历史上就有学习麻省理工学院的传统,邓旭初在考察时发现,虽然麻省理工最初以工科著称,但到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强调理工并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进一步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因此现在的麻省理工实际上已经是一所理工结合、理、工、文三科并举的综合性大学了。如果说像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注重文科在完善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素养方面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当代交大人提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就不能弃文科于不顾。当时范绪箕校长也赞同理、工、文结合的办学思路。于是,1955 年 1 月上海交大成立了文艺办公室,邓旭初亲自任主任,下设美术、音乐、汉语、人才学源个教研室。1955 年 2 月,文学艺术系正式建立。1956 年 1 月,文学艺术系和 1955 年成立的社会科学及工程系合并,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谋求发展基础文科的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学科、文理交叉学科也相继分化,成立了各自的学院。

但在一个多年偏重工科的大学,文科尤其是基础文科的发展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人们常常问如下问题:文科尤其是基础文科的存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是必要的吗?后起的文科建设如何才能跟老牌的综合性大学相抗衡?为什么不能走文理交叉渗透、迅速形成特色的路子?……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这样的提问,只是担心,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恐怕潜藏着形形色色的功利性考虑或算计,而文科建设恰恰是最经不起数目字化考量的,不管是从明确的

时间表,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从一个大学的排序,还是从其可转化的市场价值。可是,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人们的思维很难抹去算计的痕迹。

众所周知,在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诞生地德国,“为谋生而学习”是可耻的。爱因斯坦也对实用主义的学习观予以坚决的批判:“这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我想得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会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的。”他说:“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①

杜维明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中华民族的再生,当然会是经济现象、军事现象、政治现象,但它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假如它的文化信息不能充分展示,只是扭曲地落实了别人文化的一鳞半爪,我们所经受的几百年的屈辱就太不值得了!真正的亡国,是亡你的文化、亡你的心。”^②如果中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一流的文科,如果我们认为文化传承只是少数综合性大学的一种职业性使命,那么我们的许多大学最终都将沦为标准的职业训练场,大学的区别也就只是生产高级职业人与低级职业人的区别罢了。

所幸的是,在经过多年争论后,上海交大终于在 2004 年底召开了全校第一次文科教师大会。2005 年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分解重组,并更名为人文学院,在闵行校区也有了自己的办公楼——人文楼。虽在人文学科教育方面,交大人还有诸多疑虑,在具体的举措方面也颇犹豫,但毕竟是在路上了。

主要参考书目:

- 《交通大学校史》(1911—199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傅东华:《山胡桃集》,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① 引自李工真《德意志大学与德意志现代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32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② 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19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有摇无摇之摇间

■ 摇邵摇建

原“流言”

“流言”一词,最早因于周公乎?

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不说王莽,周公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这样身份的人,在那样的时代遭遇流言,也只有恐惧。后来,周公写了一首题为“猫头鹰”的诗给成王,剖明心迹,这就是《诗经·豳风》中的《鸛鸣》。这首寓言诗“为鸟言以自比”,一开头就指控“恶鸟”猫头鹰,然后诉说自己的艰辛。诗的最后,这只小鸟作了这样的自我描述:“予羽谯谯,辮尾翛翛,辮室翘翘,辮雨所飘摇,辮唯音晓晓。”金启华翻译:“我的羽毛稀而少,辮的尾巴枯焦焦,辮的窝儿晃摇摇,辮还打来风又飘,辮吓得我呀喳喳叫。”“晓”,毛注“惧”也。

流言是指流播开去的谣言或谎言,它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三人成虎,曾母投杼。常常风不知从何而起,青萍之末转眼就变成了满城风雨。虽是口耳之间,但风雨飘摇,人人自危。周公的恐惧,并非来自多么强大的力量,仅仅是兄弟间的一句话:“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周书·金縢》)这个孺子就是年幼即位的周成王,“公”指周公旦。哥哥武王去世,侄儿成王还小,于是周公摄政。但他的另一位哥哥管叔和弟弟蔡叔、霍叔等便在国中散布谣言,说周公摄政是想篡权。在权力至上的王权社会,这句话便足以要周公的命。所以流言虽出口舌之软,却锋于刃剑。多少政治家、政客、文人、志士、名流乃至普通人倒在流言下,而历朝历代的流言家们又无不深谙这杀人无血、索命不偿的“流言政治学”。

流言记忆

自周公而后,近三千年岁月过去,“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但太平之下,流言如故,流言世家不乏。这次,一个小小的流言便降临在一个不是生在周朝却姓周的少年身上,使他初窥人世叵测。

鲁迅的《朝花夕拾》至少有两篇涉及其少年和青年时的流言遭遇,一篇《琐记》,一篇《藤野先生》。这两个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鲁迅有关“流言记忆”的书写。其中《琐记》记录了他年少在家乡绍兴时的生活碎片。文章写得从容舒展,尤其开头的衍太太这一人物,着墨不多,但给人印象深刻。鲁迅父亲故去之后,鲁迅常到衍太太家去,和她以及她的男人谈闲天。在少年鲁迅眼中,衍太太虽有些毛病,但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其时,鲁迅遇到了苦恼,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却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时,衍太太便接茬:“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还不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没有钱。衍太太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鲁迅说首饰也没有。衍太太说那是你没留心,又说,“到大橱的抽屉里去看看,角角落落地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之类的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真想去打开大橱,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得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

那就是衍太太,是她先唆使鲁迅,然后又把他出卖。多年之后的鲁迅念及此,记忆仍是那样的深刻:

但那时太年轻,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①

这是鲁迅生平第一次遇上流言,他显然还缺乏应对能力,怕得很。怕遇见人们的眼睛,因为那些眼睛充满了怀疑;怕受到母亲的爱抚,因为无以面对母亲的宽容。鲁迅为什么怕?他不是并没有做什么吗?流言的要害,往往在于有无之间,让你难于辩解也无从辩解,如果硬要辩解,则往往越描越黑。鲁迅的确没有变卖家中的首饰,但他确也有“去打开大橱”的念头。流言在这有无之间乘隙而出,来回游移,若有若无,把捉不定。果如你要辩解,首先便找不到对象,向那些

^① 《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 1 卷 10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眼睛”们去说吗？怕那些“眼睛”越发怀疑，向自己的母亲去说吗？怕母亲也越发宽容，而这两者都是鲁迅无法忍受的。所以面对流言，因了自己曾有过的念头，少不更事的鲁迅只落单了一个“怕”。此正如周公三千多年前的恐惧，你说是摄政，他说是篡权，摄政是“有”，篡权是“无”，有无之间的事，嘴皮上又如何能厘得清。

流言纷纷，周公只好走为上策，暂时避地于楚。年少的鲁迅和周公一样，也只有“好。那么，走罢”^①。这一走，就走出了绍兴，来到了南京，然后又走出了南京，来到了东京，“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又来到了仙台。一路行踪，俨然为流言所逐。可是，仙台也并非桃源，流言还是像苍蝇一样缠住了鲁迅。

据紧接着《琐记》而来的《藤野先生》记载：有一天，一个学生会的干事来到鲁迅的住处，要借他的讲义看，看了一下，并没有带走。然而，走了后，鲁迅却收到一封匿名信，第一句便是“你改悔吧”。改悔什么呢？原来上一年度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考试，鲁迅考得还可以，一百余人没有落第，他仅在中间。日本学生便犯了疑，信中说考试题目，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又预先知道，所以才有这成绩。照理，这已经不完全是流言，匿名固然保留了它的特点，但哪有流言是直冲本人而去的呢？中国是弱国，就像中国学生能及格就值得怀疑，流言也不须在他人中绕来绕去，直奔主题就可以了。

敏感的鲁迅，“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同学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②。此“漏”非彼“漏”，这段文字漏泄出来的信息是，流言不但使鲁迅惧怕，也使他草木皆兵。一个“漏”字，何以画圈？效如“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别人眼里一个为强调而加圈的“漏”字，鲁迅看来是讥刺自己，这有点像阿·匝讳“光”一样，鲁迅忌的是“漏”。一个细节，可见流言已经多么严重地伤害了鲁迅的神经。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鲁迅这次没有走，而是报告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鲁迅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问那个学生干事，并要求公布检查的结果。事情平息后，鲁迅最终还是离开了仙台，不是因为流言，而是觉得医学救国无望。离开仙台后的鲁迅，已经在流言中长大，从此走上了“以笔为旗”、拯救国民灵魂的道路。《藤野先生》结尾，鲁迅望着藤野先生黑瘦的照片，“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

① 《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 1 卷 100 页。

②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 1 卷 104 页。

“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

缘- 缘年上半年间,鲁迅把自己的精力主要就放在与“正人君子”的笔战上,笔战的重点之一就是流言。

此时的鲁迅早已“此一时彼一时”,在流言面前已然没有年少时的“怕”,而是经验老到,游刃有余。不但“‘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华盖集·我的“籍”与“系”》),而且“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朝花夕拾·琐记》)。说这话时的鲁迅,他所骂的流言家就是他一生最痛恨的“正人君子”陈西滢。

陈鲁交恶,事缘 缘年发生的“女师大学潮”。女师大原来的校长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他被迫辞职后,继任者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的杨荫榆。许去杨就,学生中“驱许拥杨”的一拨和看不惯这班“杨党”的另一拨,就成为日后风潮的隐患,并果然在风潮中两军对垒。缘年下半年,猿个学生暑假后因为江浙军阀之战,直到 缘月才返校。学校照章作退学处理。学生为之求情,但杨荫榆执意不允。风潮由此发生。学生对杨长校后的诸多清规戒律和校长作派不满,加上这一件事,因此,缘年 缘月,校学生自治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杨氏其人继续长校。但在 源月,新任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杨,声称要“整顿学风”。到了 缘月,矛盾就像开了锅。缘月 苑日,一次校性集会,获得章支持的杨荫榆登台主持会议,反杨的学生用嘘声把她撵下台。怨日,杨为此召开校务会议,议决开除包括许广平在内的 远名学生。 缘日,学生方召开紧急会议,宣告杨已被否认本校校长,并派人把守校门,不许其入校。几个月来的冲突终于在短短几天白热化,它同时在陈西滢和鲁迅之间开辟了这场冲突的另一战线。

在这一风潮中,陈西滢和鲁迅分别站在对立的两边,鲁迅是倒杨一派的赞成者,陈西滢在舆论上支持杨荫榆。在这之前,陈、鲁各自都有与风潮相关的文字,但互不相干。两人之交火,是陈西滢发在《现代评论》上的一则《闲话》(后来结集时题为《粉刷厕所》)。《闲话》后半部分主要针对鲁迅等 苑位教授为声援学生在《京报》上发布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陈在文中说: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接着,为了证明其偏袒,陈文征引了一大段《宣言》中的句子,然后结尾: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

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①

鲁迅的“宣言”是缘月 圆日发布的,陈在 猿日的杂志上就作出了上述反应,连写带发,前后不出 猿天,所以鲁迅讽刺说“这回的反响快透了”。其实反响更快的还是鲁迅,反驳陈西滢《闲话》的《并非闲话》就写于缘月 猿日,立即就发在远月 员日的《晨报·副刊》。远月 圆日,鲁迅意犹未尽,又写了《我的“籍”与“系”》,发于远月 缘日的《莽原》周刊。前后不到一星期,陈、鲁之争就完成了第一个回合的“短平快”。

就本文而言,我关注的并非学潮本身,而是学潮中的“流言”,以上叙述文字只是讨论流言的必要的事件背景。就事件本身而言,我首先反对杨氏的“寡头专制”,同样也惋惜于那些倒杨派的“群众专制”。一边是“暴君”,另一边是“暴民”。杨氏确有“家长”作风,但学生——据我所读资料——也可称得上是“小将”了。暴君与暴民,或小将与家长,地位虽不平等,但角色可以互换,且彼此举事作派及其思维方式和心态也差不多。有权者滥用权力,无权者的权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无法不首先痛责杨荫榆,她毕竟处在风潮的主导方面,因而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无法不料想,无权者一旦获得权力,恐怕也只是“轮流”而已,她们未获权力时的作为不都看到了吗?更何况,该事件之后,还有复杂的派系因素存在。尤其陈的文章首挑“流言”一词,鲁迅抓住它大做文章,以致后来的争战,你“流言”来我“流言”去,意气相对,离事愈远,反使流言本身成了读者的聚焦(它事实上也是鲁迅这时期杂文中的高频词)。所以,我也就索性不谈事件谈流言了。

也是在缘月 猿日,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西滢文托之‘流言’”。这是鲁迅对陈的《闲话》的基本看法,因此,他的《并非闲话》主要是揭穿流言。鲁迅认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相信它”。至于陈文,鲁迅认定“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②。

可是,“畜类”也好,“狗屁”也罢,鲁迅骂得尽管凌厉,但陈西滢并没有散布流言。流言往往来自“听说”,也借自“听说”,但“听说”既可捕风捉影,亦能有案可稽。现在,看陈西滢是不是散布流言,就要考一考他的“听说”。如果陈文只有这一句“以前我们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然后再根据这“听说”下结论,那就真有轻信、播布之嫌,但他下面就征引了一大段由鲁迅执笔的七教授“明白质直”的支持学生的文字,那么,上面的“听说”至少在这里落实了。“听说”中不曾指明的“某籍某系”,也由鲁迅自己道明“国文系浙籍教员”。事实也正是这样,鲁迅缘月 员日给许广平的信上说:

① 引自《鲁迅论争集》(上),员页~员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员页

②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猿卷 猿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员页

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家属之类的举动,我以为这些手段太毒辣了。教员之类该有一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是可以的。①

鲁迅说做就做,这个“该有”的宣言很快就有了,它由鲁迅起草。草毕后不是需要几个人吗?就由另一教授马裕藻转请其他几位签名,结果一共是苑位。这苑位大都是国文系,除了一个外,又都是浙江人。因此,“某籍某系”可以坐实。至于那句话中更刺目的“暗中鼓励”,我们还是看鲁迅缘月 愿日给许广平的信:“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在紧接着的回信中,许广平对鲁迅表白:

读吾师“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的几句,使血性易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上加起煤炭,红红地在燃烧,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②

鲁迅的回信很直接:

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③

先不说此时许、鲁之间情感急剧升温的恋人关系,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又值风潮紧张之际,上述那些话是不是“鼓励”?又鉴于这是两人的私人通信,直到 1924 年才公开出版,放在当时也算是“暗中”了。当然,此“暗”不是煽阴风、点鬼火,而是光明正大。由此可见,鲁迅责西滢《闲话》“托之‘流言’”,是没有道理的。陈的文章,从行文大体到关键句乃至关键词,样样都有事实的依据。

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并非闲话》)

这才是典型的鲁迅风格,也是鲁迅对陈西滢有针对性的反击。问题是,陈文是用七教授自己的文字说话,鲁迅反过来责陈并非不可以,只是证据呢?不难发

① 《鲁迅景宋通信集》 257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鲁迅景宋通信集》 257 页。

③ 《鲁迅景宋通信集》 257 页。

现,当陈西滢说七教授偏袒时,鲁迅便引陈文,说这也是偏袒,证据便是你自己的文字。可是,在“暗中播弄鼓动”问题上,似乎只能说鲁迅没有提出证据,也提不出证据,因而是自说自话了。如果据实分析,事情发展到缘月时,并没有资料显示陈西滢是如何“播弄鼓动”的,事实上他也无此必要,甚至无此可能。比之鲁迅,他既不在这个学校上课,又没有自己的学生,尤其是有与许广平这样关系的学生,陈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他可以在舆论上公开支持杨荫榆,他也确实是这样,但找不到他“拨弄鼓动”的对象,更无论形迹。因此,当鲁迅说陈西滢是“反噬”时,其实是自己的反噬没有反到点子上。

也许是陈文中的“某籍某系”刺痛了鲁迅,《并非闲话》后,鲁迅又立即写出了《我的“籍”与“系”》,一是自辩,一是表明自己对流言的态度。前者,“某籍某系”四个字在陈文中只一提而已,鲁迅却专门作文,还以此命题,不知鲁迅对这四个字为什么敏感如此又反感如此。对于后者,鲁迅说“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实,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按照鲁迅的逻辑往下顺,岂不正是?你说我鼓励学潮,我就袖手旁观了?多有意思。可见陈文的“听说”是事实,并非散布流言。说它是流言,也只是表示委婉。更有意思的是省略号之前,鲁迅说陈西滢的“挑剔风潮”连字面都不通,这恐怕只能是鲁迅自己有问题。“剔”本身就含“挑”、“拨”之意,唐人张祜《赠内人》“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这“剔开”难道不就是“拨开”。因此,陈西滢的“挑剔风潮”就是“挑拨风潮”,不但不存在字面不通的问题,而且修辞巧妙,词中有味。我个人以为,“挑拨”一词纯属贬义,而“挑剔”则显得缓冲得多,这正是陈西滢的方式,就像鲁迅张口“暗中播弄鼓动”而陈却说“暗中鼓励”一样。陈的《闲话》前半部说的是学生,语气并不客气,甚至还有鲁迅提起的“臭毛厕”(这个比喻也不是骂哪个人,而是指女师大风潮所造成的状况),后半部由于所指的是北京七教授,因此,措词克制,点到为止。如果比对一下陈、鲁两个文本,文章气度包括人的气度,真耐人寻味。

风潮中的插曲

关于流言,在“女师大风潮”中,在陈、鲁论战往还和“流言”的互掷中,还有一个与风潮无关也与鲁迅无关的插曲,饶有意味。

1925年1月10日,陈西滢给风潮中反杨的另一重要人物、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信,称谓:

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

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请先生清清楚楚地回答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①

所谓“叫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台”。第二天，周作人回信：

（一）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二）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间见证的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俟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②

这第一点的回答明白极了，如果自己没说还问什么。但次日，周作人再次回答，说“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③。

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承认这话是“听人家传说”，据传说而作文，很容易变成散布流言，尤其传说属于捕风捉影的话。但这次情形有点复杂，因为这话是经过陈西滢的嘴。陈西滢收到信，就给北大日语系教授张凤举写信，因为他说这话时有张在场。张和周氏兄弟很熟，周氏兄弟失和冲突时，作人之妻羽田信子打电话求援，到场的两人中就有张凤举。张同时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也有交往，是个两边都活络的人物。一次在西山卧佛寺，陈西滢、丁西林、张凤举以及一位陈西滢不愿透露其姓名而称之为“月君”的四人聊天，这位月君说了所谓“叫局”的话（这也是陈不愿透露他的姓名的原因），陈西滢附和道：“我也听粤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当月君说，这是他朋友亲自看见时，陈还坚持：“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了一会儿，陈西滢最后说“我总不能信”。^④现在，陈在信中要张回答当时情形是不是这样，因为以张和周的关系，这话很可能是张“转述”过去的。陈的估计没错，传话的正是张凤举，他回信了，向陈道歉，说“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

传话的固然是张凤举，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误传”。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张的确是误传，周则据此作文，因而是“误传的误传”；二是张并未误传，周却择其所需做文章，而张为了息事宁人，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张到底如何向周述说，现在谁也搞不清了。历史的真相往往很难明白，此即一例。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陈西滢说了“叫局”的话，却是在非肯定的意义上。如果张如实转述，周的文章就是别有用心。如果张是误传，周则因“误传的误传”而难免是散布流言了。这里，

①②引自《鲁迅论争集》（上）^{凤凰}页。

③④引自《鲁迅论争集》（上）^{凤凰}页。

可以再一次看到流言的特征,即“似有还无”。陈西滢确有此话,是为有;但陈有此话却无此意,是为无。因此,这件事于周作人相当不利,不仅不能根据“听说”做文章,更不能在听说的基础上还声称对方“扬言于众”。陈、张等源位明明是朋友聊天,把别人私下的话搬上报纸,让其进入公共领域,这才是真正的“扬言于众”。当陈西滢据此反驳周作人时,周却说“虽然照字义说来他对了三个朋友说,那也就可以说‘众’”。^①这是狡辩,看来,周作人并不明白“私人场合”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所在。

以“听说”为文,害莫大焉。陈西滢以“听说”为文,惹得鲁迅那样反感;周作人以“听说”为文,让陈西滢抓个正着。可见这种“耳食之言”,不足为凭也好,足以为凭也罢,都能搅出是非。但文人却偏偏舍不得这“听说”,尤其当它有利于自己时。就是鲁迅也不例外。“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②甲乙都以听说来攻击对方,故文坛难以安宁。我们今天看到的二三十年代的文人论争,多少是由“听说”发端,或有稽,或无由,然后彼此吵个不歇,也辩个不清。其实这里面有多少价值呢?我总怀疑我们今天高捧为“文化论战”的那些篇什。

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陈西滢抓住周作人不放时,他自己也因一个致命的错误给鲁迅抓住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同样来自“听说”。此时,已是“女师大风潮”的后期,陈、鲁论争由风潮而起,也早已转向其他。在陈西滢看来,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放几枝冷箭”,不但“散布流言”,有时还“捏造事实”。当然,他这话既是说鲁迅,也是说周作人。他几乎是向这失和的兄弟同时开火。上面和周作人你来我往才两三天,这厢又开始转向鲁迅。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③

这实际上是在指控鲁迅“抄袭”。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文人来说,还有什么罪过大于这一项,又有什么侮辱大于这一桩呢?鲁迅的愤怒不难想见。

鲁迅的著述是否抄袭学界已有公论,我没有作过专门比较,就不发言。鲁迅

^① 引自《鲁迅论争集》(上) 194页。

^② 《华盖集·不是信》,《鲁迅全集》第 猿卷 194页。

^③ 引自《鲁迅论争集》(上) 194页。

自己当时作了相当有力的反驳 ,其中这样的句子深得我心 :

两书异点如何……在这之前 ,我以为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底细 ,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①

我欣赏的是“不知道对不对”。在我读鲁的过程中 ,感到鲁迅是敢于“以为”也敢于判断的 ,并因此带来了不少失误。比如这里“我以为”的内容就没有经过查证 ,如果仅凭“以为”判断 ,则显得武断 ,甚至贻人口柄。后缀这一句 ,是一种态度上的保留 ,并非可有可无。确定的内容以不确定的方式表述 ,是使自己不陷于被动。这样的表述处理 ,鲁迅文中并不多见。

就像陈西滢估计是张凤举传话给周作人没错一样 ,鲁迅这次的“我以为”也没有估计错。陈西滢的确不是根据自己的考证而指责 ,他是根据听说来的“耳食之言”。他这次所犯的错误和他刚刚指责过的周作人一模一样 ,周是听张凤举所言 ,他也是听张凤举所言。揭秘的不是别人 ,是和陈西滢同属“现代评论派”的胡适。猿年 ,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说及这个问题 :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 ,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 ,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 ,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 !……说鲁迅抄盐谷温 ,真是万分的冤枉。^②

如按胡适所说 ,陈西滢的错误是严重的 ,更糟糕的是他复制了自己批评过的错误。其缘由大概是这半年来被鲁迅盯得太紧 ,几乎每一篇闲话 ,都要挨骂。淤积日久 ,发泄于一朝 ,但顾出气 ,罔究其他。结果被气昏了头的陈西滢刚指责鲁迅“散布流言” ,就立即自我掌嘴了。

但胡适这里的话也并非没有问题。“说鲁迅抄盐谷温 ,真是万分的冤枉” ,就怕胡适自己也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便发言了。尤其说张凤举是“小人” ,就更不敢使人轻信 ,因为这也仅仅是胡适个人的看法。如果张凤举也是在一次聊天时对陈西滢说听说鲁迅的书有抄袭盐谷温的地方 ,那么 ,他在这个事件中就不用负什么道德责任 ,谈资而已。负责任的只能是把谈资写进文章而“扬言于众”的人。陈西滢不是什么“误信” ,而是为我所用他人的话。胡适是在为陈开脱 ,把责任推到张的身上。由于我们看不到张自己如何说 ,就不能简单相信说话的这一方。历史上很多事就是无从索解而永远存疑的 ,比如 ,你能从证据上说清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吗 ? 长期以来我们归咎于那个日本女人 (当然这是国人的好传统) ,这恰恰

① 《华盖集·不是信》,《鲁迅全集》第猿卷,猿页。

② 《胡适致苏雪林》,《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猿页,北京,中华书局,猿。

是我们只听了说话一方的声音,未说话一方的声音却听不见。而未说话者(比如那个信子)未必就不是鲁迅所说的“赴诉无门”。

“必求其人以实之”

“现代社的同人,算我最没有涵养。他们遇见无论什么诽谤,都付之一笑。固然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发表的言论,都足够做他们人格的保证,用不着自己再加剖白:可是他们的修养有素,于此可见。我就常常忍不住要说几句话了。可是也只显得我的无聊罢了。”^①这是陈西滢在陈、鲁论战后所发出的慨叹。他说的那些“现代社的同人”我读得不多,稍微多一点的是胡适,能感觉胡适大致就是那种“无论什么诽谤都付之一笑”的人,不加追究,也不作辩解,更不在公共领域借此声张。当然,这话不能绝对,1925年不意而来的一次政治流言并没有让他潇洒地付之一笑,但他有自己的方式。

因1925年的“人权运动”,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相当紧张,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即将离沪赴北大任教时,他在《民国日报》上读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在立法院的一次讲演,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内云: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②

就这一段文字而言,即使胡适有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话,亦属言论自由,而一个执政党的政要凭借体制力量说出这种带政治胁迫的话,虽然好似伸张民族大义,但分明是在压制言论自由。何况,胡适是否有此文还是一个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这么熟悉的行文方式,怎么这么一样的口吻!气不打一处来时,却发现自己急了,当事人却不急。胡适写信给胡汉民:

我知道先生自己不会看《泰晤士报》,必定有人对先生这样说。我盼望先生请这个人指出我在那一天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何种长长的文章或短短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的话。倘蒙这个人把原来的报纸剪下寄给我看看,我格外感谢。^③

^①引自《鲁迅论争集》(上) 152页。

^{②③}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 120页。

胡适除了示要证据,既不从辩,亦不事驳,心气平和,波澜不惊。真是地地道道的“胡适方式”。

和陈西滢一样,胡适直接质诸当事人。和陈不同的是,陈、鲁(包括周)那种文人纷争,都要用发表文章来逼迫对方并洗刷自己,胡适则只要你拿不出证据,也就与他无关了,他并不要对方难堪,更无意搅动公共领域。半个月后,对方没有回音,胡适又写了一封信过去,还是请对方“剪寄原报”。十天后因偶然读到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记(二)》一文,其中有胡汉民的话:“近有人对取消不平等条约,在外报上表示怀疑,此直越乎言论自由之范围,殊为不当。本人近有一文,论《所谓言论自由》,即为此而发。”^①于是又写信给胡政之,询问胡汉民说这话时,是否提到自己(胡汉民的讲演影射胡适,但没有提其名)。胡政之的回答很明确:“展堂确对弟提及大名……只知彼《所谓言论自由》一文,系对大作而发耳。”另外还告知胡适:“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②并把那只带有检查图记的信封随函寄给胡适,请注意。此时的胡适因反“党治”而得罪国民党不久,“党治”口号又正是胡汉民提出,以与蒋介石政争。因此,胡的讲演冲着胡适而去也就不足为奇。胡适自沪赴平,可谓一路凶险,但胡适日记却不着丝痕。此刻胡汉民一边张扬不与胡适“共中国”,另一边,北平公安局却暗暗地对他进行书信检查。此一细节,可见国民党对胡适的态度和胡适当时的处境。

这期间,胡汉民的秘书处回了一信给胡适,称“胡先生谙熟英文之友人曾言,我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之照会到达英国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即发布社说,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备言中国司法与政治种种不善……以反证中国政府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无当云”^③。又是“听说”!比照上面,胡汉民明明是说某博士的“一篇长长的论文”,这里却又变成了《泰晤士报》自己的“社说”,只不过“称述”了中国某博士之言,前后颠倒如此,又如此不负责任。况且,为文根据并非亲见,只是他人“曾言”。凭一个莫须有的“听说”就大肆攻击,挑拨公愤,并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对当事人进行缺席审判,如此谙熟的“流言政治学”,又是一种什么“居心”和“行为”?

胡汉民秘书处的回信就匿名问题作了说明:

胡先生以某哲学博士所言竟为帝国主义者维护其在华特权之借口,此与国家民族之利益冲突实甚,或挽近极端言言论自由者之过,故于谈所谓言论自由之一稿中纵论及之,而始终不欲举著论者之姓名,殆亦朱子“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啻矣”之意欤?^④

^①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獯页。

^②《胡政之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獯-獯页。

^{③④}《胡汉民随从秘书处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獯页。

好一个诡辩！本来，这个讲演是专对胡适的，现在好像是泛论某种现象了，故“纵论及之”。嘴巴是圆的，舌头是软的，用鲁迅引《鬼谷子》的话，真是“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至于所引朱子，虽不清楚原来的上下文，胡汉民的引用是在“穿凿”的意义上，但为什么不是“确凿”呢？根据讲演的语境，由于你是公开指控，就得“确凿”不可，不仅“必求其人以实之”，还得“必求其事以实之”。人、事俱实，方能说话。否则，不是捏造事端，就是散布流言。

与体制不睦而导致的政治流言，也就在“三胡”的几通信函中结束了。应该说，国民党没有进一步打压胡适。但胡政之对朋友的关心负责和胡汉民居高临下的政治威吓倒是各人一面，而胡适的临风从容、不惧不怒则更风标独具。

都是“月亮”惹的祸

鲁迅和陈西滢的流言之争落幕后，鲁迅自己说“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军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①。这是鲁迅自述离京赴厦的原因。在另外一个场合，鲁迅又说：“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②鲁迅此言不确，非但不确，且是“深文”。把段祺瑞和陈西滢放在一个语境中，又就其一事而论之，不动声色就给人一个主子一个帮闲的感觉，而且自己离京出逃，也就是这两人上下其手。然而，陈西滢人非其然，鲁迅离京，亦事非其然。陈西滢从来就不是什么帮闲，更谈不上段祺瑞的帮闲，他在《现代评论》上批评北洋军阀和段祺瑞的文字已能说明这一点。而鲁迅出京，既无涉段祺瑞，更不关陈西滢。撤除鲁迅科长职务的是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时间是1925年11月，段祺瑞只是按批复程序“照准”而已，按常规也没有国府总理直接撤科长的事（如此写法，是鲁迅另有肺腑）。而且在“段祺瑞将军将我撤职”和“还要逮捕我”之间，鲁迅刻意省略了许多。章士钊撤职鲁迅，鲁迅不服，便与他打官司，结果台下的科长赢了台上的总长。也是在段祺瑞任上，鲁迅官复原职，时为1924年11月。这一节，不知为什么鲁迅省下了。此时鲁迅既未因“迫压”离京，也未因胜利离京。事过不久，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之后，段执政府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缘人。但不到一个月，段祺瑞大势已去，仓皇下台，那个通缉令也不了了之。待到鲁迅离京，已是风平浪静的11月份了，同行者为许广平。如果硬要说“迫压”，那也是“爱情”。鲁迅略过这些，把自己离京与段说成因果，尽管只是短短两句，但用心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自传》，《鲁迅全集》第11卷，340页。

②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3卷，257页。

之精、文笔之练,让人生叹。

可是,鲁迅来到厦门不久,流言也就追了过来。前一次流言是围绕学运,这次却变成了爱情。上一次流言,在鲁迅看来,是他所讨厌的“正人君子”,这次呢,鲁迅为流言所困,却是一拨绕着他转并以他为中心的人。

1927年11月,先同鲁迅一道办《莽原》后又和鲁迅分裂的高长虹在《狂飏》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是总题为“给——”这一组诗中的一首: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剩着今日的形骸 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这首诗在上海发表不久,就生出一种奇怪的流言,而且马上从北京传给了人在厦门的鲁迅。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飏》上的一首诗,太阳是 self,我是夜,月是她”^①。这当然也算一种解读,不仅诗中的三个抒情形象被分别坐实为高长虹、鲁迅、许广平,而且诗的意思被说成是高长虹把许广平让给了鲁迅,所谓“月儿我交给他了,交给夜去消受”。

本来,诗就是诗,不必搞什么对号入座,上面朱子的话用在这里才算合适:“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穿凿)矣。”现在既然有这种无聊的索隐派,非把诗中的三个隐喻坐实不可,并企图确定为“三角恋”,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其解说也未尝不可。问题是,这三人之间尽管相互认识,但压根就没有构成过所谓的“三角”。高长虹是攻击鲁迅,但并非鲁迅夺了他的所爱。许广平是认识高长虹,但她(他)们却没有过感情上的往来。高长虹是从鲁迅那里知道许广平的,因了她给《莽原》的稿子。后来他(她)们通了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但没见过面的高已能觉得鲁迅与她关系很好。他(她)们的唯一一次见面,是在鲁迅住处,但彼此并没有说话,而且以后连通信也断了。这就是高与许之间的全接触,用多年以后高长虹的话说,许广平“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幅长大的身材”。

鲁迅从韦素园那里接获信息,即将它视为“流言”。流言可以任它流,关键在于当事人对它的态度,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还是相反。面对这一意外的“桃色传闻”,鲁迅的态度是什么呢?

^① 《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5卷,圆珠页。

在回复韦素园的信中,鲁迅作了如下三种分析: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有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即许广平,作者注)在京时,确实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不少稿子。^①

到此为止,鲁迅的态度是冷静的、客观的,三种分析也不无道理。可是往下,鲁迅开始走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种:

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②

关于如何阅读文学作品,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的批评:“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满是利害的打算。”可是,在高诗面前,鲁迅似乎犯了他自己指出过的毛病,不但把流言当真,而且立即进入状态:“如果真属于这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悉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完了,还咬紧一句:“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③

给韦素园写信后,鲁迅就向身边的章川岛打听“太阳”、“月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传闻“早已有之”。尽管查不出流言所自,却知道了是谁在传播,原来大半是鲁迅身边的人,比如孙伏园、李小峰、章衣萍、王品青等。鲁迅这才知道,“我竟从不疑及玄侑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④。如果流言来自陈西滢们,鲁迅心里或许还好过些,但播布它的偏偏是自己的亲兵。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为提携青年能尽力就尽力,付出了那么多……“然而”——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作了如上怨诉之后,笔锋一转——“男的呢……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

①②《鲁迅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5卷,缘起页。

③《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5卷,猿起页。

④⑤《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5卷,猿起页。

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⑤。如果事出于无,即鲁迅和许广平终于没有任何关系,“月亮”之说就是流言了;如果事出于有,比如鲁迅和许广平确实互生情感,并因此离京为新生活作准备,那么,“月亮”之说,虽然也是“流”,一直流,但并非是流言。在事实既成之后,鲁迅仍指“女生在座”而传出的话为流言,看来鲁迅对流言不是看它言否确实,而是看它流传与否,这恐怕说不过去。问题更在于,如果说鲁、许之恋不是流言,而高、鲁、许的三角关系为无稽之谈,那么,鲁迅斥前者为流言,而对真正是流言的后者又如此深信,并煽动自己的愤激,就难免令人扼腕了。他对许广平说:“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这是鲁迅单边认为),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事实正相反,那时的高长虹每周去一次鲁迅家给鲁迅送稿,不是为月亮而是为莽原)……‘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顺便再一次表示自己需要许广平),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鲁迅是师,高长虹是徒,在师傅面前,徒弟自然低能)。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一个足见其低能的玩笑)。”^①

高长虹以诗抒情,鲁迅以小说开玩笑,说是开玩笑,其实是报复。用中间一个插入的段落,意在暴露高的低能。这是《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小说共三章,中间一章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羿”,作为射日者,该形象乃鲁迅自指(记得鲁迅那句话: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另一形象则是隐喻高长虹的“逢蒙”。“逢蒙”本是“羿”的弟子,就像高长虹当时追随鲁迅。可是,这个“逢蒙”不但忘恩负义,艺成叛师,而且妄加谋害。“只见对面远处有人影子一闪,接着就有一枝箭忽地向他飞来”,“逢蒙”对恩师出手了。然而,“羿”连马都不停就回了一箭,两枝箭射在一起,向上挤成了个“人”字才落到地上。双方过招九个回合,“羿”的箭先用完了,“逢蒙”却还有一枝,正对着“羿”的咽喉。说时迟,那时快,这一箭射中了“羿”的嘴,他翻身落马,倒在地上。“逢蒙”以为对方已死,挂着微笑走了过来,不料刚刚近前,“羿”却张开眼,翻身坐了起来,吐出箭,对“逢蒙”道:“你真是白来一百多回(高长虹自称到鲁迅住处有一百多回)……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意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说罢一阵哈哈大笑。整个一“老江湖”,惭得“逢蒙”无以抬头。这“啮镞法”不就是反咬一口么?连这都料不到,只会写诗,高诗人确实低能得可以。

不仅小说,而且杂文,比如《新时代的放债法》,鲁迅亦有很精彩的攻高段落。总之,鲁迅因流言而导致“心造的仇恨”(鲁迅语),把无辜的高长虹当作了真正的情敌。究其原因,这个事件“都是月亮惹的祸”。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在有因无据这样一个“有无之间”,鲁迅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结果为流言所中,使高,也

^① 《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 5 卷 105 页。

1937年,河北危急,国民政府派黄郛和日本进行保全华北的谈判。出于对国力的估计,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强调以妥协方式而停战的重要与必要。这篇文章惹火了他的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傅特地写了封类似决裂的信给胡适,声称要脱离《独立评论》,尽管还缓冲了一句,说主张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胡、傅相交甚深,傅尚且“大生气”,何况别人。但胡适接了信,并不作任何辩白。待他自北平到南京,见到了傅斯年,方知傅之所见,不是《独立评论》,而是日本新联社发的“摘要”。日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摘要锦上添花,加了“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这原文所没有的一段,而这一段胡适认为“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这是日本人制造的流言,就像当年鲁迅所碰到的一样。这流言至少对傅斯年们起到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怪的是胡适视而不见,并不公开澄清。到了南京,也只是和傅孟真一人私下交流。结果呢?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孟真说,他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①傅孟真一个人的气好平,毕竟傅是了解胡的,别人呢?胡适在1937年代抗战前夕负责的“低调”言论,不知给自己带来了多少麻烦。别的不说,也是1937年胡适在报章上的一次谈话,带出了鲁迅的(其实是瞿秋白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文章说胡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他的谈话是为日本人“上条陈”,因此,也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胡适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军师,他的言论是不是为日本人上条陈,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出卖灵魂的人,在今天这早已不是问题。然而,推诸当时,读了鲁迅的文章,又兼鲁迅文笔的感召,又会有多少人不像鲁迅那样认为呢?事实也正如此。可在胡适这一边,我们看到的依旧是无言以辩。“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语)胡适既没有在沉默中爆发,也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在沉默中让时间见证了自己。也是在那次谈话中,胡适对傅斯年说:“(员)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圆)凡立一说……我们只应对症下药……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自己的人说真话;岂可因为怕外国人听见就不敢说真话?”^②胡适的话,不妨别解,凡出于公心的主张和负责的言论,既不怕外国人拿去如何如何,也不怕自己人蜚短流长。也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自己有东西,就别怕人家拿流言之类的“没有东西”的东西来打。“流言止于智者”,解释正所谓不必。

1937年初,胡适的朋友杨杏佛在一次讲演中批评“走江湖的博士”江亢虎,紧接着又批评了还是在中国公学时当过自己老师的胡适。可是记者在《民国日报》发稿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江湖’乃暗指两姓,故混为一谈”。于是,江亢虎和胡适之都成了所谓的“走江湖的博士”。这是一种侮辱,而且是公开的。

① 《胡适日记》(六) 19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胡适日记》(六) 1937页。

蔡元培先生见到报纸,与杨说及此事,杨遂感不安。于是专门写信给胡适,埋怨记者“颠倒错误”,该记的不记,没有的又无中生有。本来报纸就是流言地,记者为了出效果,苍黄反复,刻意而为,此种可能也未必就不存在。这时的杨杏佛只好一边开脱自己,一边小心赔不是,请胡适“幸勿介意,得暇当面罄”^①。第二天,胡适给杨杏佛回信,信末,胡适这样说:“报纸记载讲演,非有训练,每多谬误,我也常是此中的一个牺牲者,故绝不会因此介意于你。”^②“我也常是此中的一个牺牲者”,说明胡适对流言的杀伤力洞若观火,此刻他推己及人,既显示了对流言的“智”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宽容。

胡适最后一次遭遇“流言”(这不妨是流言的一个特例),应当是他 70 岁的事了。1951 年,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因为组织反对党被蒋介石逮捕下狱。如果蒋介石还能容忍雷震办一个争取言论自由的杂志的话,那么在国民党外组织一个反对党就远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雷震组党很重谋略,他一直想借助胡适的声望,拉他做精神领袖,既能撑住这个党,也能缓解一些来自国民党的政治压力。胡适事实上也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尽管身不介入,且对其策略亦有所不满,比如认为不要叫“反对党”,可以叫“在野党”,以减少对国民党的刺激。雷震被捕前已经准备召开反对党的成立大会,特意写信给时在美国开会的胡适,询问其归期,说这个成立大会一定得等先生回来才举行。可是不待胡适回归,雷震却下狱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太平洋两岸,国内外记者纷纷采访胡适,问其对事件的态度。胡适态度是明朗的,他不是抗议国民党,而是为雷震申辩,并愿意出庭为其作人格担保。怨月 15 日,胡适在纽约寓所接待了从台湾来的记者李曼诺,其间谈及“雷案”中组织反对党的事,胡适表态说:“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将事。尤其是许多人赞成我来组织这个党。我是没有这份兴趣的。我要弄政治,还要等到七十岁才来尝试吗?目前我的精力还希望把自己的《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白话文学史》好好完成就够了。”^③然而 10 月份,记者在台湾报纸上撰文时却说:“胡先生虽已七十岁了,但却要搞政治试试看。”^④言下之意,胡适还就是要搞反对党。这正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一件事,且又当雷震因反对党而被捕的最敏感时刻。这样的文字不管记者有意无意,或是出于什么考虑,哪怕是善意的和积极的(我甚至以为记者是想借舆情对胡“逼宫”,否则胡无以谢天下。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都已具流言品质,它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于胡适显然不利。“雷案”发生后,胡的言动使胡、蒋关系已形微妙。蒋约见胡而胡忍不住谈及“雷案”时,“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回来,我对他谈起;胡

① 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150页。

② 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150页。

③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九),153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

④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九),153页。

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傲寰,不相信我们政府’”。末了,还反问胡适:“□□对你说过没有?”^①看似漫不经心,但却语含威慑,这是蒋介石的方式。因此,回过头来看,记者的那篇文章给胡适在上下两方面都很被动。胡适的态度依然很宽容。也是在一次访问中,他说:“我觉得新闻界的朋友对我都很好。他们有时候把我的话多记一句,或少记一句,或记错一点,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也无从更正起。”然后就举了刚才那个例,说:“这话恰是一百八十度的相反了。这位小朋友七八年前在国内采访时,我就认识她,她这种错误是无心的。”^②无心耶?有心耶?谁也不知道。只是胡适的话倒符合他生平一以贯之的原则:“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和光同尘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③鲁迅深受流言荼毒,但流言像云像雾又像风,鲁迅恨之入骨又抓不住,只好感叹说: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为畜生”^④。

对流言者如此,那么对自己呢?鲁迅这样表白:“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⑤鲁迅把自己和流言拉得远远的,这里先不“观其行”,只是“听其言”,这话本身就耐人琢磨。谁说流言只是流窜于“宴会”、“往来”、“社团”中,流言其实更容易在“弄弄笔墨”时播布。上述关于胡适的流言不正是在公开发布的笔墨中流出来的吗?如果鲁迅承认自己也偶有些“耳食之言”(其实鲁迅惯以“听说”作文),那么就要当心了;否则,一不留神,就会使自己成为自己憎恶的那种人。

“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⑥这说的是什么事呢?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者解释,1934年前后梁实秋在担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的《文艺政策》在内。显然,全集的注释者是根据鲁迅的说法来注释的,但鲁迅的

①《胡适日记》(八),苑园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九),猿猿页。

③④《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猿猿卷,猿猿页。

⑤《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猿猿卷,猿猿页。

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原九)》,《鲁迅全集》第远卷,猿猿页。

说法有个要命的“听说”。关于“听说”，鲁迅前面自己就讲得很清楚：“我的文字中……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鲁迅一边声称自己“不肯以流言为根据”，一边又放手“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而且还“扬言于众”，“故意给它传布开来”，甚至不惜一而再。半年后，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旧话重提：“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①这次，干脆连“听说”都省了。莫非流言不比谎言，重复两遍就成了真理？

鲁迅去世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实秋写过一篇《鲁迅与我》，其中谈到了这件自己被鲁迅点名的事（梁只看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我离开上海到青岛……但是鲁迅先生并未忘怀我。他在给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做的序文里又提到我，说我把他的著作从青岛大学的图书馆里驱逐出去了，其实没有这样一回事。这样的事只有在独裁的国家……才能发生。我信仰服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是我拼命拥护你说那话的自由！’我对鲁迅先生也抱同样的见解。”^②

原来，“其实没有这样一回事”，只是鲁迅“听说”了，就“弄弄笔墨”而已。

鲁迅曾经说过：“‘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遗憾的是，鲁迅为什么会陷入话语自指的尴尬？

解铃系铃，“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③。

一封公开信与“流言政治学”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河南人，生于1914年，1936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据他的朋友回忆，读书时陈就喜欢听鲁迅的课，看鲁迅的书，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1936年末，1937年初，陈根据自己的信念成为“托派”人士，和鲁迅一样居住在上海，但和鲁迅没有往来。1937年初，上海左翼文坛内乱，爆发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口水战：“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看起来是两个口号之争，实际上争的不是口号，而是话语权。陈其昌看了鲁迅的文章，以为鲁迅的主张和自己（即“托派”）的政治意见比较接近。于是署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不仅陈述了自己对当下政治形势的看法，而且给鲁迅寄了几本自编的刊物《斗争》与《火花》。当他把信写好后给自己的“托派”盟友看时，一位朋友提醒他别把鲁迅想得太简单了，并建议他不要寄，以防鲁迅把信公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 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鲁迅全集》第 3 卷 536 页。

② 《鲁迅回忆录（中）·鲁迅与我》，苑园-苑园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③ 《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 3 卷 536 页。

公开发表出去。

果如朋友所料,这封私人来信,鲁迅不仅公开发表(未征得发信人同意),也公开回复,并且把回信同时发在两个杂志上。这就是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曾经被收入中学课本。这封信末尾注明是鲁迅口授,韵藻对笔写。韵藻是冯雪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收到信时正在病中,冯去看他,他拿出这封信,“愤恨地说:‘你看!可恶不可恶!’”。冯看了后建议“他们自己碰上来,你迎头给他们一棍罢”。鲁迅表示答应,又沉着脸说了句“可恶不可恶”。但因为生病,不能动笔,因此,两天后冯又上鲁迅处建议:“请他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写几句公开信作答。”鲁迅同意了。回信发表后,冯还提供了一个细节,鲁迅翻看杂志时是很高兴的,几天后还笑着说:“我们还是便宜了托派!他们的来信没有比我的回信低两格排,这样,我们就把来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①

以上是冯雪峰的说法,但不能偏信,这里至少还可以参照胡风的说法。收到陈信后,“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在胡风看来,由于“国防文学”放风,说“民族革命大众文学”是“托派”口号,冯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辟谣。冯写好信后,“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等鲁迅病好后,胡风去探望他,谈到冯雪峰的代笔,说“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都不像’”^②。

这是两个互有出入的版本,之所以并置如此,是因为我想弄清,这个带有“流言政治学”的文本,到底姓“鲁”还是姓“冯”。按冯的说法是姓“鲁”,自己只是执笔,按胡的说法则姓“冯”,尽管经过了鲁迅的同意。本来,文章只是个人的事,也不劳后人去烦神。自己口授,别人执笔,甚至别人捉刀,自己签名的文章,往往是代表组织的。这次,其实不止这一次,鲁迅享受的就是这种规格,结果把文章搞得“亦冯亦鲁”。后人还在这冯、鲁之间打起了无谓的官司。

不管这篇文章姓什么,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左翼话语传统、什么是左棍、什么是简单化、什么是不讲证据就扣帽子、什么是无情打击,它都齐了。可惜,这些精彩之处实在顾不上,此刻,我只关注它的“流言政治学”。

因为你们的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洗刷得很清楚么?这绝不是因为此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

① 《鲁迅回忆录(中)·党给鲁迅以力量》,苑琛-苑琛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② 《鲁迅回忆录(下)·鲁迅先生》,吴棣园-吴棣园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①

流言政治学的特点就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用流言施以攻击,从而在政治上置对方于死地。它不仅可以直接传播流言,更可以直接制造流言。它可以从政治入手,也可以从道德包抄。其内容可以捕风捉影,还可以无中生有。而方式可以明白如话,亦可以含糊其词。说它是“学”,其实是术。所谓不学无术,学则有术。果如学在流言,其术亦即鲁迅所谓的“捣鬼有术”。捣鬼有术,也有效,特别是外患危急,人心怨沸之际,哪怕是一个并不高明的流言,只要乘势而起,你挡都挡不住。前例就是明末干城之将袁崇焕,骁勇如他,却非死于战场,而是喋血于由“流言政治学”所挑起的釜沸般的民愤。

由冯雪峰执笔的这个文本,可谓得其心传。

什么叫“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话不知从何而起,却横空而现。在前文胡适被胡汉民所控的事件上已经说过,公共领域说话,尤其是指控性的,必得一个“实”字。非得“必求其人以实之”,更得“必求其事以实之”。现在,这件事实际上有没有倒不重要。有意思的是说话本身,居然是假设性的,而其缘由,却是因为杂志印得好。以假设而指控,地地道道的“莫须有”。该言论的妙处在于,如果实有其事,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无有其事,我不是假设吗?运用之妙,在于进退有据。从“听说”到“倘若”,从播布流言到制造流言,这“倘若”不过是流言制造的一个吞吞吐吐的幌子。它一旦流传开去,口耳之间,三人成虎,有谁还细审那个虚而又虚的“倘若”。“九·一八”以来,中日交恶甚深,抗日民情日上。战争逼到了家门口,却有人用日本人的钱办报,而其主张又为侵略者所欢迎,这次第,不就是在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倘若”犹如一支以虚带实的暗箭,其奥妙在于“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②。这“深远”的结果,作者当然很清楚:“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

所以,当我读到“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倘若”,而是有人在造谣,就在(说话)现场。至于下面弯来弯去,还要辩白“这绝不是因为此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听起来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拿人钱”的情结对鲁迅而言其来有自,当年和梁实秋论战时,有此一节,再早,与陈西滢论战时,亦有此一节。一节一节,耿耿于怀,这次就转到陈其昌身上。只是,这样说便也罢了,下面却来了个莫名其妙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 5 卷 538 页。

②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第 3 卷 252 页。

的转圜：“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前后其手，先覆后复，出尔反尔，有似德里达式的后现代，书写于前，又自我颠覆于后。然而，德里达是笔墨游戏，这里却是拿人家的政治生命当游戏。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但有“奇文”，却没有“疑义”。因为陈其昌他们根本就没有用过日本人的一文钱。鲁迅说“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可是这刊物印得很整齐，“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上挥汗劳动的产品”，而且“正因为财力不济，《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这是陈其昌看到杂志上鲁迅的公开信后，给鲁迅回信中的陈述。鲁迅的信对陈其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长期的景仰毁于一旦，尤其拿日本人的钱办报一说，更是使陷入政治困境和经济困境中的他们痛心无比。他在信中对鲁迅说：“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复信的全篇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的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因此，就拿钱一事，陈其昌并不客气，“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①

信末，陈其昌希望自己这封信能够在发鲁迅公开信的杂志上发表，因为有些事必得公开澄清，如果读者只见一面之言而导致偏信，对另一面来说，肯定是不公正的。陈其昌还希望和鲁迅真正地讨论甚至“论战”一些政治问题。然而，他的“诚恳的请求”如同石沉大海，鲁迅不是没有收到他的信，因为鲁迅日记中已经记上了一笔，但他显然没有理会陈其昌，而是以沉默了此公案。

了犹未了……

几个月后，鲁迅便去世了，寿终正寝。

几年以后，陈其昌也死了，死不见尸。

陈其昌因何而死？又死于谁手？这位当年被视为高超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的陈其昌，因抗日而死，死于日本人之手。

1956年底，陈其昌的儿子陈道同先生著文《陈其昌之死》，读来令人唏嘘。1957年，陈其昌在上海因抗日情报工作被抓，敌特抄家时，在床下发现了正是那些据说是印得很整齐的《斗争》与《火花》，身份彻底暴露，敌特如获至宝，押着他扬长而去。几十年后，陈道同先生对自己父亲的被捕这样说道：

1957年发生的案中案悲剧，正是由于这些‘违禁’出版物的被发现才暴露出来

^① 《陈仲山致鲁迅》，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苑园页、苑园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苑园

的。我曾想,假如当年不把这些非常刺眼的油印小册子放在家中就好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就不会暴露,就有了与敌伪周旋及营救的余地,悲剧也就不会发生。把这么多的,表示自己信仰、思想、修养和身份的油印品放在人口众多的斗室之中,这显然不符合地下工作者最起码的安全要求。父亲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从 1936 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时算起,他从事地下工作已 12 年了。是大意麻痹吗?他在他的同志中是素以小心谨慎出名的。他不得不与家人同居,这正是他暴露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实情:他和他的同志们当时都处于经济窘迫之中,他们无力营造一个安全的存储仓室。这种情况与某些责难之词相去十万八千里。①

关于陈其昌之死,陈文略有叙述。当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一个出狱的牢友曾到过他家,告知他的父亲在 12 月的一天被叫出去后就没有回来了。当时他还没往深处想,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那再也没有回来的日子就是自己父亲的遇难日。至于陈其昌到底是怎么死的,作为儿子的陈道同并不知道。这里,我姑且征引两年前《羊城晚报》上的一篇介绍陈其昌的文章作个交代:

抗战爆发之后,陈其昌因替重庆搜集情报被日宪兵逮捕,搜查中发现有托派刊物而被定为‘共产党大案’。陈其昌被关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最终被日本宪兵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②

还能说什么呢?人总是要死的。
所幸,这个陈其昌没有死于流言。

(作者: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① 陈道同文见《陈其昌》,《鲁迅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陆人:《鲁迅批评过的陈其昌》,原载《羊城晚报》1945年12月12日。

死摇亡摇之摇思

■摇徐摇方摇摇祝大同

死亡是一种生物学现象,简单地说,就是生物失去生命。死亡是一切生物的必然归宿,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已有明确的阐释。

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摒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①

除创伤或意外所致的迅速死亡,死亡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细胞和组织到器官和重要生理系统,再到整个机体的衰竭的过程。由于心脏是核心器官,所以心脏功能的停止往往被认为是死亡的开始。临床死亡的传统定义就是心跳和呼吸停止,表现为脉搏消失、四肢及口唇青紫。但心跳及呼吸停止并不自动意味着临床死亡的开始,使用呼吸器、心脏起搏器及其他抢救装置,可以在脑功能完全丧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心肺功能,生命似乎仍在继续。然而很难说一个意识丧失仅有植物性功能的人是否还算活着。死亡的新定义认为,可以把脑死亡或者不可逆性昏迷与死亡同等看待。如果昏迷患者处于持久的脑无功能状态,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外界刺激无反应、无自主呼吸、无肌肉运动或脑反射，就可以认为已经死亡。

人类个体的生命非常短暂，平平安安，人生不过百年，更何况还有疾病、天灾、人祸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死亡其实就潜伏在生命之中。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其自传《说吧，记忆》中写道：“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的一道短暂的明亮的缝隙。”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也有相似的描述，庄子《知北游》中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意思是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一匹白马在一道狭窄的缝隙前一闪而过，不过短暂的一瞬而已。忽然，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忽然，又自然而然地消失。忽而变化为生，忽而变化为死，生物感到哀痛，人类感到悲伤。

佛教经典《大般若涅槃经》将生、死列入人生八苦：“八相名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人面对死亡，心理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面对死亡主观上力求否定的阶段；了解死亡终将无法避免，而对一切事物怨愤的阶段；渴望尽力延长生命的期望阶段；预感生命将要结束的抑郁阶段；最终接受死亡的阶段。有权威著作称以上的五个阶段为人的濒死时期的五个连续阶段。以我们有限的经验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完成这五个连续的心理阶段，大多数人会在某个阶段停滞下来，让死亡成为生命终极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可能最终在心理上真正平静地接受死亡。

虽然许多人似乎在主观上已经接受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果，但在潜意识中的基本判断是：虽然生命必然结束，但明天生命仍将延续，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于是便不免想像，生命仿佛永远存在，死亡则遥不可及。相当多的人沉湎于这样一个生命的幻象，当死神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本能地选择拖延和逃避，尽力延长生命，然后陷入死亡的恐惧之中。纳博科夫说，人们在观察生命前后两端黑暗的深渊时，出生之前的那个让他更镇静些。而生命结束后的黑暗，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能够彻底从容地接受死亡的人终究是少数，那是一些有大智慧、大悲悯的至人。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人类还生活在普遍相信生命结束之后，肉身的死亡并不能代表灵魂的毁灭，人的灵魂另有自己的归宿，灵魂不死。人类尚不愿接受人死如灯灭这样残酷而简单的事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用丰富的想像虚拟了一个灵魂的居所，一个生命的轮回。

死亡早在原始宗教时期就成为要素之一。在壮族的丧葬仪式中，人死后停于正厅，用柚叶、桃叶或姜煎水为死者沐浴，然后换装，将死者生前喜爱的器物置于死者一旁，用铜钱遮眼、塞口，或填以糯米饭、茶叶，意谓让死者在往阴间的路上有赶路饭和买路钱。

佛教教义宣称，相对于众生所居的世俗世界（也就是佛教所称的“秽土”），还有一

个没有苦难的理想世界(也就是所谓“净土”)。根据佛教经典思想建立的净土宗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念佛、修观的方法,就能在末期生命终止时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经》说,在极乐世界中,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庄严,微妙严净,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严,但受诸乐,无有痛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中世纪诗人但丁《神曲》描绘了基督教神学中“地狱”、“净界”、“天堂”三境。在《神曲》的译者序《但丁及其神曲》中,译者王维克根据但丁的描述甚至绘制出了天堂图,列出了天堂表。例如水晶天是天使的居所,而恒星天则居住着圣灵。

在当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可以接触到关于“转世”的鲜活事例:藏传佛教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元代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圆寂,为将本教派维持下来,临终前噶玛拔希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要求弟子找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儿童继承其位——其地位的象征为一顶金边黑帽,后世也称为黑帽系活佛转世制度,这是最早的活佛转世制度。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执导的影片《小活佛》中,插进了诺布喇嘛讲述的一段故事:“从前,在天竺国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只小山羊和一个祭师,祭师要把山羊奉献给诸神,但当他正要切断山羊咽喉的时候,山羊却突然大笑起来,祭师愕然,停手问山羊:你笑什么,你不知道我就要切断你的喉咙吗?山羊回答:我知道,经过这第 1000 次轮回,我来世就可以再生为人了。然后小山羊又哭了起来,祭师说:你又哭什么呢?山羊回答:可怜的祭师,我是为你哭泣,五百世前,我也是个大祭师,我也奉献过山羊给诸神。”这是关于灵魂转世的文学描述。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在当代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极大尊重,转世灵童受到至高礼遇。

正是这种生命无限轮回的信念,曾给予人类精神极大的安慰,也给无数在世俗生活中痛苦挣扎的人们找到可以忍受煎熬的精神出口。

当科学终于揭示了生命与死亡的真实的时候,人类终于明白,既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地狱,也没有净界,没有天堂。生命如白驹过隙,只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的一道亮光。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地球被人们发现了,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人们终于有理由为了自己这唯一一次的短暂的生命做点儿什么,争取点儿什么,坚持点儿什么。珍视生命,充分享有现世的生命过程成为生命的真正意义。这是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生命的狂欢。

有人将人之死分为消极与积极两种:“消极死亡只是完成了生命的纯粹生物学运动。及时行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如此生活诚然单调乏味,像泡沫一样忽生忽灭。积极的死亡,是在完成死亡的物质运动的同时,完成精神的创造。这将

中。

当代医学伦理学家弗雷切尔的《选择性死亡》写道：“在所有对选择性死亡的谈论中，即宁要经过抉择的或道德的死亡而不愿宿命的或非道德的死亡……”^①他讨论了医学意义上的安乐死，安乐死的道德困境在于死亡过程中他人的参与。然而所谓选择性死亡不只有安乐死，还有自杀，也就是选择了生命通达死亡的捷径，如茨威格所说：“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个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②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夏绿蒂在巴西的彼德罗保利斯相拥服毒自杀。他在遗嘱中述说了自杀的理由：“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多么令人哀伤。

1951年 8月 1日凌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夫妻两人双双自缢，他们在遗书中写道：“尽管所谓的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③1951年，傅雷夫妇的生命私有、财产私有、生命的尊严受到了全面的暴力侵犯，他们选择了“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自杀不止出现在险恶的政治与物质困境，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奖四年后选择自杀。1962年 8月 1日下午，他和家人说了声“我去散步”，便离开镰仓的家独自到小平的工作室，被助手发现时，川端躺在被子里，口含煤气管，枕边有打开的威士忌和酒杯。窗外是美丽的富士山和江之岛，人早已死了，没有留下遗书，是无言的死亡。其实川端康成在 1958年 8月 1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致答辞时曾批评过自杀行为。他说：“1962年，芥川以 37岁的英年自杀。我在《临终的眼》中写道：‘不管多厌离现世，自杀均非悟觉的形象，无论德行多高，自杀者都距离大圣之境甚远。’”

川端康成说出了东方生命哲学中极其有趣的一个特征。当人处逆境，或厌离现世，自杀都不是德行高远之士的选择，自杀恰恰表现了人格的脆弱。东方哲

① 弗雷切尔：《选择性死亡》，《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1页。

② 傅雷：《我要死得清白》，《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1页。

学认为大圣之境应是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中国传统经典《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彰父母，孝之终也。”所以司马迁《报任安书》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即使因厌世而选择了远离庙堂隐匿方式，也极难得到坊间的褒奖，因为逃避也不是贤者的修为，“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才是东方生命哲学生存方式的大圣之境。评价这种大圣之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上这些贤者的隐忍，中国文化才有了《周易》，有了《春秋》，有了《史记》。但也正因为这些贤者的隐忍，行为上认同了暴政，接受了暴政，在暴政的高压下低下了高贵的头，弯曲了人格尊严的脊柱，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悲怆。傅雷遗书中那些对荒唐暴政的违心之辞，让读者倍感苦涩酸楚。

史铁生在他的散文《我与地坛》中写道：“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①在这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到来之前，不放任，不逐流，认真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充分享受占有自己的生命过程，虽然不一定有精神的创造，但也会使生活变得严谨。因为生就意味着死，不但是人的个体，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地球与太阳系，甚至宇宙，死亡的种子早已存在其中，这就使得人类的生命染上了一抹感伤的色彩。

1997年末，叶嘉莹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复述顾随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以为这说出了生死真谛。

（作者：山西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

^① 史铁生：《我与地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神话中的科学

——仿《梦溪笔谈》

■ 摇关增健

《梦溪笔谈》是宋代学者沈括留给后人的一部笔记类著作。沈括晚年在梦溪园居住时，回顾自己一生经历及与友人交往诸事，有感而著此书。他在《梦溪笔谈》的“自序”中说：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生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梦溪笔谈》有一显著特点：沈括对其所记事项，凡能以科学原理解释清楚的，无不一一为之辨析，释疑解惑。沈括的这种做法，使《梦溪笔谈》在科学史上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中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将该书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作为一名科学史工作者，笔者对《梦溪笔谈》甚感仰慕，故步前贤足迹，对阅读古籍中所见试作辨析。画虎不成，唯祈识者赐教。

中国古代有许多神话，神话属于文学作品，而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所以神话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产生时代人们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包括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我们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即是如此。“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在三国时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中有具体记载：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

五 盛于七 处于九 故天去地九万里。①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起源演化问题的传统认识。中国古代对宇宙的生成存在两种相反的认识。

一种认为宇宙是亘古长存的,不存在是否曾经生成的问题。《庄子·知北游》记述了孔子师徒的一段对话,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犹今也。……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孔子是用万物衍生的链条作为自己推论的依据的:任何一个物体的产生,都有它自己的母体,母体又有自己的母体,如此推演下去,永无止境,所以,宇宙必然是“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的。

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孔子的观点并不具有代表性。与之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宇宙是生成的,自古至今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占据主导地位。老子《道德经》明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诗人屈原作《天问》脍炙人口,其开篇伊始就提出与天地起源有关的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阴阳家邹衍被时人号为“谈天衍”,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勾画了邹衍的学术特点:“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由司马迁的记述可知,邹衍是主张宇宙创生说的。他的理论在当时诸侯国中深受欢迎,司马迁绘声绘色描述了邹衍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檄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迨至汉代,主张宇宙有创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综合这些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古代,认为宇宙有创生的观点是主流认识。由此,“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反映的确实是古代中国在宇宙起源问题上的普遍认识。

中国的宇宙生成学说在汉代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就是用阴阳二气性质上的差异来解释天地的生成。《淮南子·天文训》是古代宇宙生成观念形成系统学说的标志性著作,该书在记述天地生成原因时,认为“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① 《艺文类聚》卷一。

《淮南子》赋予阴阳二气不同的性质，阳气轻、清，阴气重、浊，它们因其性质不同而分别形成天地。《淮南子》的说法在古代宇宙生成学说中具有代表性，它显然也影响到了“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所谓“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

古人在讨论宇宙演化问题时，对其演化速率是有考虑的。张衡《灵宪》把宇宙从创生以来的演化过程分成溟涬、庞鸿、太元等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如是者永久焉”，持续了很长时间。张衡的抽象的“如是者永久焉”，在“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被具体化了，变成了定量的“一万八千岁”。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毫无疑问是其作者按照当时流行的宇宙演化学说创作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与基督教文化宣扬的上帝造宇宙的说法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的说法中，宇宙完全是神凭空创造出来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了基督教宣扬的神创造宇宙的过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在这里，神俯视万物，驾驭一切，宇宙万物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在“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宇宙的产生主要是大自然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神性的盘古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因素不占主导地位，透过“盘古开天地”这一神话传说，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在颇能引导人们走向宗教之途的宇宙起源演化问题上，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系统而又颇具理性的宇宙生成演化理论。这一理论的高度发达，使得后起的神创论难以让神在此问题上发挥多大作用，从而大大降低了人们由此途径走向神学的可能性。

在古代社会，神话传说最容易与天文学发生联系，“盘古开天地”是这种联系的一个例子，“女娲补天”是这种联系的另一个例子。女娲的传说由来已久，其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功绩是抟土造人，而《淮南子·览冥训》则记载了女娲的另一功绩——炼石补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摇摇女娲炼石补天这则神话,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固体天壳观念。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中,宣夜说主张“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瞽精绝,故苍苍然也”^①的观点,认为天没有质地,纯粹是气组成的。但在天文学家那里,这样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被认可过。这一历史现象,中外皆然。其原因在于,当人们仰视天象时,会看到恒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围绕大地旋转,彼此之间的距离永远保持不变,古人无地球自转之说,除了认为天是固体的、恒星镶嵌在其上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解释这种现象。此即《淮南子》所说的“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②。所以,固体天壳观念,是古代天文学家所共有的。女娲补天,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倘非如此,何必要“炼五色石”去补天之裂?如果天是气组成的,它就不会破裂,也就无须女娲劳神去修补了,女娲承担的工作已经够繁重的了。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古人在构思神话时,是如何受到他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的影响的。

“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说法则与古代另一宇宙结构学说盖天说不无关系。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主要有三家,分别是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像一个盖子一样,在上,地与天同形,在下,天地分离。浑天说则认为天像一个圆球,在外,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古人在构思神话时,更多的是借重于盖天说,因为盖天说的天上地下模式为人神分离提供了理想的依据。若采用浑天说,则很难想像神如何能够居住于人之脚下。但盖天说也有问题,其理论缺陷在于:固体的天硕大厚重,如何能够在地的上方悬空而不坠落?这就导致了杞人忧天典故的产生。“杞人”思想问题的解决,依赖的是宣夜说的宇宙模型,而宣夜说并不被天文学家所认可。所以,盖天说不得不面对天体厚重在上却何以不坠落这一问题。盖天学派对自己的宇宙结构模型所面临的窘境,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把它留给了后人,神话的作者构思神话时,充分利用了盖天说的这一缺陷,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于是就有了“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传说,有了“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解决方案。

“断鳌足以立四极”是要为苍天竖立支柱,其实,苍天本来是有支柱的,那就是不周山。但不周山被一位巨人撞坏了,这位巨人是共工。《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共工撞不周山的传说云: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关于不周山的具体方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具体描述:“西北海之外,大

① 《隋书·天文志》。

② 《淮南子·俶真训》。

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故不周山在西北,是承天之柱。共工把它撞断了一截,厚重的天失去了支撑,就向西北倾斜,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导致了日月星辰向西滑移;共工向西北撞山,必然脚踏东南,这就造成了东南大地的塌陷,所以江河之水自然要滚滚东流。共工撞不周山这段话之前是《天文训》那段著名的宇宙起源演化学说,而其紧接着的下文则是“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讲的是天体何以运行、日月何以发光,上讲起源,下讲日月,中间则靠神话讲宇宙现状之形成原因。以神话来弥补宇宙理论之不足,这充分表现了传统宇宙理论所面对的窘境。正是由于传统宇宙理论无法靠理性的思维解答天何以不沉陷这样的问题,《淮南子》的作者才不得不在一段完全是讲述宇宙理论的文字中插入这样一个神话传说,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形式上的完整。

有了宇宙起源演化,有了宇宙结构现状,自然还需要对日月星辰之大小形体有所猜测。神话传说中也不乏这样的内容。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雷曹》记载了商人乐云鹤的一段奇遇,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在这段故事中,乐云鹤是位慷慨好施之士,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招待了正在落魄中的上天主管行雷施雨的雷曹,使面有饥色的雷曹得以饱餐一顿,后雷曹感其一饭之德,不但在乐云鹤渡江遇到风浪时救了他的性命,使其避免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还带乐到天穹巡游了一番,使乐近距离审视了天上的星辰。蒲松龄绘声绘色描述了乐云鹤的这段奇遇:

少时乐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觉身摇摇然不似榻上,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软无地。仰视星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莲实之在蓬也,大者如瓮,次如甌,小如盂。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星摇动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拨云下视,则银河苍茫,见城郭如豆。……归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则光明焕发,映照四壁。益宝之,什袭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饮。

这段话涉及天文甚多,有固体天壳概念,有星辰形体大小描写,有星辰发光解释等。就星辰形体大小而言,《雷曹》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观念。中国古代对星的大小的认识与西方截然不同。在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地球在宇宙中其大小微不足道,大名鼎鼎的托勒密就认为“与恒星的大小和距离相比,地球本身可以看成是一个点”^①。太阳也比地球大得多,其直径大约是

^① 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第 员卷,宣焕灿选编《天文学名著选译》,第 24 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年。

地球直径的几十倍。而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日月是天上最大的天体,其直径大约一千里左右。这跟大地的尺度是无法相比的。星星比起日月当然就更小了,古人认为亮星的直径大约百里左右。对此,王充有明确的说明,他说:“数等星之质百里,体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见之,若凤卵之状,远失其实也。”^①王充是以视物近大远小立论的,尽管他所说的星的尺度,与西方的说法仍然无法相比,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被后人所接受,晋朝的鲁胜曾专门就此写过文章。据《晋书》记载:

鲁胜,字叔时,代郡人也。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论》云:“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若臣言合理,当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纪。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彰虚妄之罪。”^②

鲁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上,竭力证明前人对日月星尺度的估计太大了。他的请求虽然被不了了之,但后世也未见有人对其说法进行批驳。正因为中国人传统上认为星星的直径不大,这才有了蒲松龄的“大者如瓮,次如瓿,小如盎,孟”的描写。如果中国人普遍认为天上的恒星比地球大得多,蒲松龄的《雷曹》篇恐怕就难以诞生了。

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创造者所处的时代,也离不开创造者所拥有的知识背景。我们审视神话传说中的科学知识,不是为了借此了解当时的科学,而是要透过解读这些传说中所蕴含的科学知识,说明在古代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神话传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神话传说。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① 王充:《论衡·说日篇》。

^② 《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鲁胜传》。

“最后之觉悟”

——《叩问陈独秀》之第二章

■ 摇李新宇

86

大学人文「
第一辑」

1915年 9月 15日 ,你在《新青年》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是一篇纲领性文章 ,显示着你当时的问题意识 ,也显示着你的基本思路。

文章是从人生目的谈起的 ,“发论之先 ,申立言之旨” ,说的却是中国的文化状况。

吾华国于亚洲之东 ,为世界古国之一 ,开化日久 ,环吾境者皆小蛮夷 ,闭户自大之局成 ,而一切学术政教 ,悉自为风气 ,不知其他。魏晋以还 ,象教流入 ,朝野士夫 ,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己不振 ,且其说为出世之宗 ,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 ,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 ,而日趋觉悟之途者 ,其欧化之输入乎 ?

欧洲输入之文化 ,与吾华固有之文化 ,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 ,吾国扰攘不安之象 ,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 ,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 ,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情性过强 ,旋觉旋迷 ,甚至愈觉愈迷 ,昏聩糊涂 ,至于今日。^①

这是历史的回顾 ,也是现状的揭示。特定的历史环境养成特定的民族性格。四周国家皆弱小 ,无先进可资学习 ,所以必然自成风气 ,成“闭户自大之局”。魏晋之后 ,印度佛教文化进入 ,却因其自身的种种原因而没有给中国带来进步。

能够改变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在哪里 ? 你已认定 :只有“欧化之输入”。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152页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年。

之所以如此,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异质的。只有不同的东西,输入才有意义。

欧洲文化的进入引发了持续的冲突,这是必然的。在你看来,每一次冲突都带来一次国民的觉悟,只是国人惰性太强,彻底的觉悟一直未能完成。

回顾两种文化交流已经走过的历程,你把它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信之者惟徐光启一人而已。

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

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

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沈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

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

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

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①

这是一部接受与抵抗的历史。不断抵抗,却又不断接受;不断接受,却又不断抵抗。这是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从器械、技术到政治制度,都一步一步地接受下来。如果回头看,全部的抵抗都不过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页缘-页四页。

是延缓,并不能阻止最后的接受,但即使抵抗者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用以抵抗的武器都已西化,也仍然有人要继续抵抗。“拿来新的,保护旧的”,一直是不愿放弃的梦想。所谓新旧之争、中西之争,过程不过如此。到了你所说的“今兹之役”,关键已是在现代政治制度之下是否可以兼容传统伦理。

对你来说,此役的关键是保卫共和、追求民国宪法之实行,也就是让共和落到实处。

所以,你关心的仍然是政治。期待国人最后之觉悟,着眼点仍是民主共和。新文化运动与政治的联系就在这里。

二

你把“政治的觉悟”分为三步：

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度态,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①

国民“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对政治“若观对岸之火”,让人痛心,让人“怒其不争”。然而,一切现状都有其历史成因。

如果国家从来不是民众的国家,天下从来不是民众的天下,事关政治,轮不到百姓过问,那么,当一切都无须过问的时候,当一切过问都没任何意义的时候,谁还过问呢?

政治是什么?考诸古老的传统,它就是治国安邦的道与术。说到底,就是治人的道与术。治人的方式及其依据的理念,从来无须与被治者讨论,更无须征得被治者同意。被治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等着被治。如果遇到暴君,就随时等着引颈受戮,屠刀之下并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遇到好皇帝,他们自然“为民做主”,同样用不着商量。至于做主者是否公正,所依之法是否合法,从来容不得争议。

至于遇到好皇帝或坏皇帝,就看那个时代民众的造化了。遇到不好的,他一高兴就杀戮,一不高兴也杀戮,只要他有足够的武器和力气,被杀戮者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居住在人家的土地上,吃着人家的粮食,甚至是喝着人家的水,呼吸着人家的空气,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页四四。

不服能行吗？当一切都被征服者占有的时候，只要无海外仙山可逃，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天赋人权”，这让人羡慕的西方理念的确与中国传统不符。鲁迅说，中国人惯于做“看客”。仔细想，看客们不仅面对别人是看客，就是面对自己被绑上刑场砍脑袋，也还是看客。这里的问题是：除了看，他还能做什么？看着自己的乡亲被屠戮，他只能看；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屠戮，他只能看；看着自己被绑上刑场，他还是只能看！如此命运，一个人如果醒着，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所以，一般的中国人情愿昏睡。有名言曰：“但愿长醉不愿醒。”

说到底，中国的百姓都是俘虏。强人建国之际，就是百姓被俘之时。然后，俘虏变成奴隶。经过一场新的战乱，他们又成了另一家的俘虏，然后再做另一家的奴隶。漫漫几千年，国人一直摆脱不了俘虏与奴隶的命运。古人创造了一个联合词组——“子女玉帛”，真好，无论被用在何处，都显示着历史的真相。中国的男男女女总是与玉帛一起被抢来夺去，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希望或许有过，但很快就会熄灭，最后归于无望。

无望使人麻木。

携带着几千年积累的如此经验，对于政治，如何不隔岸观火？

然而，在你所处的时代，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魔鬼手里漏光”，墓场上站起了觉醒者。经过觉醒者的努力，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在这片土地上展示了一份共和草图，把新的原则写进了宪法，使一切对子女玉帛的占有不再天经地义。

感谢那些创造了现代国家理念的人，他们是全人类的解放者。至少在理论上，中华民国已经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对于国家大事，人民有权参与。正因为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你和你的朋友们才能够梦想以自己的努力唤起国民，一起来改善国家政治。

考虑你的努力，不能不首先想到这一前提。否则，你为别人的国家操哪门子心！

三

百姓也要关心政治。那么，首先需要关心什么？你的第二步进入方向问题：

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

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①

进入“世界系之轨道”,“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这是你的选择。

积中国现代化之全部经验与教训,国人应该深信这一点:方向是重要的。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确是世界大势。这个大势曾经给人类带来希望,带来乐观和自信,也带来了一些国家的繁荣、富足和个人权利状况的改善。

可惜,一些人后来动摇了,包括你本人。因为种种挫折,因为对已有的结果不甚满意,人们纷纷去寻求新的替代方案。一些人以为找到了,欢呼着奔向“通往奴役之路”。我知道,你并不那样乐观,但我总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怀疑过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看你后来的足迹,显然被一些东西吸引了,看你最后的精神归宿,又好像对这一大势的坚信并未消失。那么,你真的以为完成这一世界性的大转变可以有不同的途径?

如今,为替代方案而欢呼的人群早已散去,引导人们去实施那些替代方案的人们也纷纷从峡谷返回,因为他们发现前面已是悬崖。人们有理由沮丧,因为枉费的不止是一代人的生命。人们有理由反思,因为历史性的大悲剧发生了,思想上的肇事者也应该忏悔。但一些人仍然不愿承认这世界大势,甚至在死谷里流连忘返。

在你活着的时候,人们谈论的是欧化、西化、世界化,现在,人们把它称作全球化。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有人欢欣鼓舞,因为看到了希望;有人竭力抵抗,因为仍不甘心。为了抵抗全球化,为了防止世界走向同一个方向,一些人到处寻找资源。旧的资源不好用了,希特勒的语录,斯大林的教导,波尔布特的经验,色彩过于鲜明,自然要适当改变。这让一些人很为难,但仍然要寻找。

他们同样把目光投向西方。

他们找到了各种理论资源:后殖民理论、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文化相对论、特殊国情论……其关键之处仍然是不愿顺应世界大势而自新。

为此,他们还要反对线性历史观。因为历史一旦不是线性发展的,也就谈不上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距。一旦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不再属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可以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被解释为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发展模式。再进一步,就可以把野蛮说成文明,把落后说成先进,把反现代性说成现代性。于是,历史也就不存在停滞,更不存在倒退,方向和路线也就不再有错和对,中国的一切也就不须改变!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页四四。

这正是当下一些理论能够得以流行的根底。

西方,作为现代文明发祥地的西方,也是各种病菌和蛆虫得以生长繁殖之地。因为自由,一切都可以生长。于是,反常的、病态的、阴暗的、恐怖的甚至邪恶的学说,大行其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破坏人类文明的武器应有尽有。

这一切,当然取决于西方的自信。他们以为那些学院里的杯水风波无力掀翻社会的大船,以为纸上的切齿之声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他们以微笑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是思想学说。因为它自信任何异端邪说都不可能战胜人类文明的大趋势。

然而,一个后果不容忽视:一些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的东西也在西方得到庇护,并且得以继续滋长。换句话说,西方以自由庇护了自由之敌。这些自由之敌在西方无力战胜已经成为主流的现代价值,但对正在艰难争取现代化的后发达国家地区,却会成为抵抗现代化的强大援军。这后果首先是由非西方的后发达国家承受。但是,我常常在想,西方人也不应过于自信,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也许还会像当年面对希特勒一样,突然面对可怕的威胁。

堕落的、因无所事事而步入歧途的西方思想界,难道不该为此而警醒吗?

四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①

政治觉悟第三步的要旨是自觉与自动。所谓自觉,就是国民必须清楚地意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页四一-四二页。

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谓自动,就是自己要承担起国家主人的责任,而不要仰仗政府官员。进一步说,自觉与自动就是要自己去争取和维护已经在法理上属于自己的那些权利。

这一步很难,因为人们的生活姿态和思想观念都要受既有经验的制约。中国的百姓从来没有做过国家的主人,从来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习惯于等待恩赐,等待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等待着真真假假的大救星。

你知道这一步很难,但公民的权利不是可以不求而自至的。现代国家当然应该保护公民的一切权利,但如果公民不知道维护那些权利,当那些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浑然不知,那些权利又如何能够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当历史刚刚迈向现代的时刻,在政治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公民把个人权利的保障完全寄托于政府,更是靠不住的。因为那些政府官员昨天还是皇上的臣子,今天就成了共和国的公务员,习惯的仍然是专制制度之下的那一套。如果没有监督的力量,他们很容易按照旧例行事。如果老百姓仍然把他们当成“父母官”,他们就很容易习惯性地“为民做主”。

我不愿过多地指责当时的政府。在我接触的教科书中,它一般被称作“北洋军阀政府”,它的统治是非常糟糕的。后来读过一些原始资料才慢慢知道,其实,从辛亥革命到五四,甚至直到国民革命将其推翻,它的问题都不难理解。包括袁世凯在内,他们并非执意要破坏共和,更非蓄谋剥夺公民的权利。对他们来说,问题主要在于不适应。新的制度建立了,但历史并没有为新制度准备合格的人才。新的国家出现了,历史却没有为新国家准备合格的管理者。袁世凯最终证明自己不合格,但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努力,也有失公道。他曾经努力适应新制度,试图做一个合法而守法的总统。即使背后搞点小动作,表面上也还是要适应新制度的要求,甚至收买议员,也还表现出对议会制度的尊重。如果他完全不尊重新制度,事情本来很简单,把反对者押到菜市口就是了。他没有这么做,表现的正是新的一面。但他毕竟刚刚摘掉大清的顶戴,作为旧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僚,他对新体制很难一下子适应。与君主专制相比,民主共和的特点就是政府首脑不能像专制君主那样为所欲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可以随心所欲,民主制度下的总统却受到种种制约。所以,习惯于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都不喜欢民主,总要变着法儿保留一点专制。相比之下,开始时的袁世凯不是明目张胆的。对他来说,这已很不容易。他缺少帮助,缺少支持,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古德诺、杨度等人,着实害了他。

说起当年的共和,人们常说那不过是一块“招牌”。你也这样说过。其实,新事物出现之初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实变名未变;一是名变实未变。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革命带来的成果往往是“有名而无实”,在变革的动力被强行压抑的时候,一些东西往往“有实而无名”。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确实是名至而实未

至。但只要有了那样一个框架,对“实”的追求就比较容易。

遥想当年,如果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多一点,如果以主人自居的人多一点,如果知道维护个人权利的人多一点,如果知道政府管理人员需要监督和扶持的人多一点,社会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让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你努力的初衷。

如果有更多的人响应你的呼唤,如果你自己更善于坚守,民主共和也许不会夭折。

五

你提出“伦理的觉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三纲”: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①

伦理与政治,其实无法分开。政治需要伦理的支持,而伦理也常常需要政治的保障。两者都服务于“治”,可谓殊途同归。

如果对伦理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国家伦理本身就是政治秩序赖以确立的原则,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支撑。家庭伦理看上去离政治甚远,其实也是治理一个家庭的准绳,可谓家庭政治。尤其是在中国,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伦理与政治界限不清。

在历史上,家庭对其成员的处置有很大的主权,国家往往不干涉家庭的内政。家族的祠堂相当于官府的公堂,可以在那里行使生杀大权。道德规范应该是自愿遵守的软性约束,但在中国却常常相当于法律。

正因为这样,影响政治的那些伦理原则必然是你考察的对象。

你强调指出:儒家“三纲”为中国伦理政治之大原,它的本义就是阶级制度,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页107。

与自由、平等的现代制度是矛盾的。如果在政治上采用共和,而在伦理上却保守“三纲”,这个社会就会自相冲撞。所以,在共和政治与传统伦理之间,“存其一必废其一”。

在你那里,答案非常明确:保卫共和国体,打破传统伦理。

对此“铲伦常”之举,当时的人们群起而反对,今天的人们也纷纷批判或者“反思”。

可是,他们没有想一想你的问题:如果真心拥护共和,能让传统伦常大行其道吗?所谓“三纲”,也就是君主专制社会形成的三个原则,它所维护的秩序是以尊卑贵贱为特征的,是以等级压迫为保证的。它讲君为臣纲,不讲君臣平等;它讲父为子纲,不讲父子平等;它讲夫为妻纲,不讲夫妻平等。毫无疑问,这三个原则维护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的特权,而剥夺了为臣者、为子者、为妻者应有的权利。只要有“三纲”存在,社会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共和国要保障个人的权利,要建立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秩序,就不能允许这样的不平等原则继续存在。如果允许这样的不平等原则继续存在,就是公然不要自由和平等,共和国就是假的。

在现代的民主共和制度之下,传统“三纲”没有留存之地。再说,民国已经成立,君为臣纲,君在哪里?臣又在哪里?如何贯彻这一原则?

如果一定要贯彻,势必把总统看成君主,并以对君主的态度对待他。于是,总统就不再是总统,而是成为百姓之“纲”;公民也不再是公民,而是君主治下的臣民。事实上,现代政治原则在中国着陆之所以艰难,政治文明建设之所以道路漫长,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进一步审视“三纲”,还会发现它存在的问题。“三纲”之首是君为臣纲。这是国家伦理,用以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确立上尊下卑的政治秩序。其他“二纲”所指涉的是家庭秩序,让儿子服从老子,让妻子服从丈夫;所要解决的是父子秩序和夫妻秩序,都属家庭事务。

看来,中国的圣人关心的只是家事和国事,而且家事多于国事。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少了对社会的关注。

不是我们的圣人疏忽,如果事关重要,他们会关心的。这里透露的问题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除了家庭问题,就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并不重要。

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序列里,也是从家庭直达国家与天下,中间没有其他群体。

由此看来,你们的判断是对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

甚至无须用社会之名,可以换个说法:传统中国是由宗法家庭构成的国家。

可惜的是,那个被忽略的社会如果存在呢?或者说,它本来不存在,但如果后来出现了呢?显然,它不是家庭可以容纳的,也不是家庭中的处事规则可以应对的。当那些只习惯家庭生活的人们面对他人、面对社会时,无论是对待老子的

方式还是对待儿子的方式,无论是对待兄弟的方式还是对待朋友的方式,都不能很好地处理与陌生人之间既相互冲突又需要协作的社会关系。

一个在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很霸道,也可能会撒娇,却很难与人平等相处。

在“三纲”基础上建立的伦理,难以形成平等的观念。没有平等的观念,就没有现代伦理,现代国家也终难建成。

六

事实上,伦理的觉悟并非从你开始。在你之前,先驱们已走过一段长长的路。

中国的传统伦理与政治一样,都以压制为基本特点,它维护的是下对上、卑对尊的绝对服从。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只要睁开眼就能看到它。然而,睁开眼并不容易。

有一个词叫“盲目”,所指并不是眼睛出了问题,而是睁着眼睛却看不到什么。置身于某种传统中,一切都司空见惯,不合理的会成为合理的,不正常的也会成为正常的。人是直立行走的,但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长在父兄都被迫跪着的环境中,就会习惯这种姿态,而且以跪着为正常,以直立为反常。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的发生需要外来的参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来文化的进入获得了意义:它是可怕的,也是可贵的,是洪水猛兽,也是天使和福音。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跪着的人也许会永远跪着。如果接触了不同的文化,比如看到直立行走,开始也许会诧异,但无需多少时间,就知道那是一种更好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来文化一般人不会抵抗。当然,必然有人试图让人们永远保持原来的姿态,因而反复教导他们如何弘扬传统,如何反抗文化殖民,如何抵抗他者化,但效果是不会太大的,因为两种姿态的不同感受会使人们更乐于弃旧迎新。

在某种情况下,封闭是维护落后、野蛮和非人道状态的有效方式。但封闭一旦打开,要想回到原状却绝非易事。

正因为这样,当大清帝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现代文明的涌入已成为必然。虽然阻力重重,但觉悟已经开始。

就伦理的觉悟而言,郭嵩焘的日记早就作出了中西道德的比较,并且得出了西方道德优于中国道德的结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认为,中国不如西方,不仅是军事、经济和技术,而且同时体现在风俗礼仪、伦理道德等方面。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尊重人格独立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虚饰,而中国人讲人身依附、等级服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很多虚伪的表现。“卑幼之于长上,属僚之于

上官,小民之于官长,僮仆之于主人,皆动辄跪拜,罕复答礼。夫不论其中藏诚敬之实意,而徒费其外貌卑抑之虚文,是相率而以伪接也。故上以求此,即下以此应,或面呈巧令,转背即肆讪谤,或外作足恭腹诽,甚于轻侮,则亦何益之有哉?”^①郑观应看到,中国的一些制度残酷之极,是全世界所没有的。比如缠足,“人生不幸而作女子身,更不幸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加膺大戮,如负重疾……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②

维新派的思想中,不仅出现了~~对~~对政治制度的反省,而且出现了~~对~~对价值系统与国民性格的反省。在反省中,不能不~~涉及~~涉及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问题。面对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严复清楚地看到了自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③也就是说,西方的进步和优势,都是个人自由带来的,它的根本是个人自由。在严复看来:“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④

进入~~西~~世纪,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以个人权利为根本诉求的思潮。他们由改造国家走向了破坏旧伦理,主张进行道德革命,以期建立平等、自由、博爱的现代道德。面对中国传统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问题,他们特别强调国民的权利,竭力抨击奴隶人格和奴隶道德。为了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他们开始努力培养国民意识。要培养国民意识,首先就要克服奴隶性,树立个人权利意识。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奴隶与国民的区别:“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⑤

戊戌年猿月,《直说》发表一篇题为“权利篇”的文章,开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从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作者认为,要打破礼法之教,救出国民资格,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强调权利思想,“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

① 《郑观应集》上册,猿猿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员圆园。

② 《郑观应集》上册,圆圆页。

③ 严复:《原强》,原载《直报》,员圆缘年猿月源-怨日。

④ 严复:《论世变之亟》,原载《直报》,员圆缘年圆月源-缘日。

⑤ 佚名:《说国民》,原载《国民报》第圆期,员圆员年远月员园日出版。

利思想之大旨也”。他因此而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他还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于世界,所以有了家庭、社会、国家。个人对于国家,有应尽的义务,但它是有条件的,“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爱重权利即爱重义务之本,不爱重权利决无爱重义务之理。”^①

这些思想,与你的思想非常相似。

在鼓吹革命的潮流中,有人主张男女平等,有人主张家庭革命,已经广泛触及伦理问题。丁初我 在其《女子家庭革命说》^②中指出,中国之所以需要家庭革命,是因为女子所受压制实为难忍。在谈到夫妻关系时,文章写道:“入其室而和气迎人,登其堂而交际有节,规其道路而同车携手乐意融融,欧美自由之空气,直弥漫于夫妇生涯,而胡以视吾中国,颜拘挛而足趑趄也。吾中国民权不复久矣,而独至闺房之内,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呜呼!男子何修?女子何罪?吾叹中国夫妇之道苦,直起因于结婚之问题,而结果于相从地下。此身一误,蹂躏终生,悲哉!悲哉!”

1906年,有人发表题为“三纲革命”的文章,对旧伦理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文章认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作者把传统伦理看作“宗教迷信”,而把现代伦理看作“科学真理”,发出了如此质问:“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因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故然,此乃强权,有背科学。”^③一篇题为“论道德”的文章写道:“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也是;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④

他们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所谓新道德,就是现代公民道德。蔡元培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⑤

七

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在这一系列关系中,重要的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现代公民需要明确个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也需要明确这些关

① 佚名:《权利篇》,原载《直说》第 1 期,1906 年 7 月出版。

②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原载《女子世界》第 1 期,1906 年 1 月出版。

③ 真:《三纲革命》,原载《新世纪》第 1 期,1906 年 1 月。

④ 愤民:《论道德》,原载《克复学报》第 1 期,1906 年 1 月。

⑤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 1 卷,1957 年,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不相信一切都无法改变。何况正是你们的努力,迎来了年轻的共和国,尽管她是一个早产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无论如何,只要有一块“共和”的招牌在,把人民当作被征服和奴役的对象就不是合法的。所以,你们要让共和国实实在在落实在中国的土地上。

早在创办《青年杂志》前夕,你就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你也能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因为你已确立现代国家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没有几个人比你更深入,也没有几个人的表达比你更清楚。

八

你思考国家问题,常常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个人主义者。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个人主义都伴随着争议,但它日益被接受。人类文明走出中世纪而进入现代,有一系列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个人地位的提升。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成为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的根本标志。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法律还是伦理规范,都必须以此作为基点。

1919年之后的几年,你的文章反复呼唤个人主义。

谈到个人,首先是人格的独立和自主。你所做的,首先就是呼唤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敬告青年》中,你所讲的首先是人格的独立: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①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你高度赞扬了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伦理原则,而对中国的家族本位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

你如此论述西洋民族的个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苑源页。

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①

你如此论述东洋民族的家族本位：

东洋社会，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②

你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

对于青年人格的培养，你主张“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③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选择。任何运动都有一些浅薄的盲目追随者，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不了解，因而所表现的，常常只是解放的欲求。但对《新青年》集团来说，却大都清楚，个人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必须与责任并行。

胡适极力张扬个人主义，他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它自由发展”，但他同时认为“要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是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④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集团认识基本一致，新伦理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基点。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87页。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87页。

④胡适：《易卜生主义》，原载《新青年》第 9 卷第 2 号。

安吴青训班教育模式解析

■ 朱鸿召

抗日战争爆发后,自 1937 年 5 月至 193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泾阳县境内,连续举办了 3 期“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通称“安吴青训班”,先后组编 16 个连队,共培训 1000 多名学员,分别派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群众团体或沦陷区。其平等化生活、军事化组织、集体化学习,以及社会科学理论教育、隐秘的党组织关系对人才的甄别考察,是延安时期用教育塑造革命战士的开始,也是此后影响几代人成长发展的教育模式范本。

抢夺人才与考验人才

“安吴青训班”的创办,源自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对复杂形势下人才的甄别和吸纳。

“西安事变”前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西安学生运动和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出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承诺,释放了大批“政治犯”;一方面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权统治的考虑,由陕西省党部于 1937 年 5 月下令取缔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限制并迫害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领导者。共产党一方面转移在大城市已经暴露身份的革命干部,一方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 年 5 月,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的冯文彬,受命率领一个班的战士,从延安南下,经过 3 天行军,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的泾阳县云阳镇。据冯文彬同志晚年回忆,“这次来云阳镇是张闻天同志派我来参加接收安置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因此项工作已接近尾声了,陕西省委的贾拓夫、欧阳钦等负责同志向我提出,陕西有一批积极分子,多是‘西安事变’前后西安青年运动骨干,以

民先队员(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主,能否帮助训练一下,使之在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抗战军事、政治知识方面得到提高”^①。于是,便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借用于右任的斗口农场,创办第一期“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成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把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作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②。1937年10月,“西青救”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把它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

首期“青训班”于1937年10月15日开学,训练时间半个月,学员1500余人,主要是陕西西安、三原、渭南等地的民先队干部和队员,特别是中等学校的民先队骨干,由省委负责输送。“青训班”活动经费及学工人员伙食费,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解决。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由学员自己解决。“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是借用了于右任先生的农场中有许多果树与花草环绕着的一幢西式的房子,阶前一片空地,承担了青训班的教室、礼堂、饭厅、游戏场等许多项重大的任务。”^③

战争环境,战时培训,因时因地制宜,“青训班”办学条件始终是简陋而艰苦的。借用于右任的斗口农场,引起了一些社会议论。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林伯渠,及时把这些情况告知冯文彬。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冯文彬与贾拓夫研究决定,将“青训班”由斗口农场迁到了泾阳县云阳镇东街的城隍庙。第二、三期“青训班”就设于此,学习期限分别为三个星期和一个月,学员人数分别达到1500人和1500多人。这里条件更差,住宿、办公的地方尤为困难。时值寒冬,天气很冷,且多风雪,露天教室难以应付,草扎纸糊的墙壁、门窗也都摇摇欲坠。艰苦的生活条件是对革命者的挑战和考验。

国民党政府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继上海、太原等中心城市失陷后,首都南京也丢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于日寇手中。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大批流亡学生,涌向武汉、西安,寻求抗战救国的出路。中共中央意识到,抗战需要千百万知识

^① 《冯文彬同志谈安吴青训班》(1958年10月),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151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②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1937年10月1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0册,1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

^③ 荆生:《草创时期——在三原斗口村》(1958年10月),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151页。

分子,将来建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抢夺”知识分子就是“抢夺”天下。^①为此,冯文彬受命专程回延安汇报“青训班”的情况,毛泽东约见之,指示“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问到有什么困难,冯提出需要讲授抗日游击战的教员。不久,中央从抗大、中央党校等抽调一批干部充足青训班教学力量。^②通过报刊和八路军各地办事处,“安吴青训班”公开招募青年学生。“西青救”还派出组织部长黄华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专事负责“青训班”招生和学员分配工作。从第二期开始,学员已超出陕西省的范围,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流亡学生。到第三期开学时,外地学员越来越多,并且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开学时猛增余人,一个月结业时变成缘多人。以后,每期学员人数越来越多,学习期限也越来越长。云阳镇城隍庙实在容纳不了,从缘年缘月第四期开始,“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更名为“战时青年训练班”,搬迁到蒋路乡安吴堡吴氏庄园,直至缘年缘月全部撤离。

缘年缘月,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机关从延安迁至安吴堡,以“青训班”为基地,推动抗日青年运动的发展。缘年缘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意见,“青训班”拟改称“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实际上没有正式更换名称,但曾以“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名义进行过一些对外活动。当时上下内外对其通称“安吴青训班”。

短期训练课程很简单,主要是政治基础知识和一些军事基本知识和动作。训练班的实质,是对人才进行甄别和考验。前几期学员以陕西省委选送为主,毕业后“愿缘以上到陕北公学和抗大去继续学习,只有少数人到军队或民众团体里去工作”。第四期以后,以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学生为主,人员来历相对复杂。“不过,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连总占缘以上的大多数。在学生中间程度也非常不齐,有的是乡间小学刚毕业的小孩子,有的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博士,而大多数是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经过训练期间的暗中考验,主要依据其政治可信度、社会关系背景和工作能力,安排不同的去向。“约略统计起来,到敌占区、敌人后方和军队里去的猿,参加了后方农村工作、机关、学校工作的猿;其余到别的学校或留在本校继续学习的约占猿。”^③这其中,输送到延安其他学校继续学习或留校工作的,属于政治考验合格者。被派回到后方农村、机关、学校工作的,是政

^① 时任中央组织部的陈云认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拥有天下。”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缘。

^② 《冯文彬同志谈安吴青训班》(缘年缘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缘页。

^③ 《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节选),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缘~缘页。

治考验不合格或存有严重疑点者。到敌占区、敌人后方和军队工作的,是政治考验有疑问,社会关系复杂者。派这些政治上有疑点的学员们到敌我共存的统一战线地区去工作,是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进行考验。

“训练班实际上是从白区到红区的中途‘过滤站’,受训的学员时间不一,有人第二天就直奔延安,有人三五天不等,有人则受到较长时间的审查,也有不受欢迎的,就在云阳‘送客’了。”^①曾在云阳镇参加过“青训班”训练,毕业后到延安,后又离开革命队伍的司马璐,晚年对此回忆基本属实。

1947年11月,云南宣威浦氏三姐妹中的姐姐浦代英已在延安抗大学习,两个妹妹浦石英、浦琼英自己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学习,因拿不出证明或介绍信而被谢绝。她们给姐姐写信,希望能邮寄一份证明或介绍信。姐姐收到信立即去中组部。“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说,你写信告诉她们到三原去找冯文彬,他在那里办训练班,我们写个信给他打个招呼,这几个人到三原可以不经训练,直接来延安。”^②由于当时邮路缓慢,两个妹妹没等到姐姐的回信就直奔三原了,并按常规在“青训班”参加考试,填写自传,等待陕北公学的录取。正在这时,冯文彬收到中组部来函,她们就没有参加“青训班”的训练,直接到延安。到延安后,浦石英改名为雷迅,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安吴青训班”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总共吸纳了1000余名革命青年和流亡青年。经过训练和考验,有将近1000的学员,大约1000名青年知识分子被输送到延安。这是一个高效率、精明能干的革命人才训练、甄别、考验机构。

平等比自由更感染人

“安吴青训班”最感动人的,是平等。在这个革命熔炉里,大家生活平等,劳动平等,人格平等。

安吴堡村的吴氏庄园,是由园主吴周氏寡妇捐献充公的。由于家族衰落,当时庄园已现破败。庄园有三进院落,正房15间,建筑面积1500余平方米,另有挑角楼、望月楼两座。经过清理,前厅院落为“青训班”领导机关及各班部兼男生住处,大厅为会议室和晚会场所,后院为班部兼女生住处,最后一进退厅为吴周氏住处。挑角楼为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办公兼住处和教务处,望月楼为青训班副主任乔木办公兼住处和秘书处。庄园坐北朝南,大门口的开畅之地作为“青训班”大操场。其西北角有一棵数百年大榆树,上悬铜钟,声音洪亮悠远,“青训班”作息以撞击此钟为号。

^①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287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89年。

^② 浦代英:《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15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

“青训班”还征用村中的迎祥宫。该宫据传是清光绪年间,慈禧避八国联军之难进驻西安,安吴富商吴氏捐银十万,在元代建筑基础上修复扩建,以迎接圣驾的。^①

没有现成的办学条件,把一个颓废落后的村庄改造成一个战时革命训练学校,首先需要克服生活上的苦难,通过平等劳动创造学习生活的环境。据当时“青训班”总务处长葛瑞莫介绍:“当我们从云阳搬进安吴的时候,安吴不过是一座空城,什么也没有。我们住的房子、床铺以及办公用的桌椅等物都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自从到这里每天都在这些困难中挣扎,我们首先就进行向当地的老百姓交涉借用房子、床铺、桌椅,他们在起初的时候不了解我们,有房子有东西都不肯借。后来经过多次的宣传和说服,才把他们多余的房子及东西借给我们。可是,借的房子不是到处便溺就是颓塌不堪。我们曾把许多的厕所变成我们的宿舍和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在破瓦颓垣的腐(废)墟上开辟了露天教室和平坦的大操场。”^②村子里的道路不平坦,一千多学员被发动起来,两三天的时间就给修平并铺上砖头。整阴沟,修厕所,种植花木,修筑连接安吴堡与云阳镇的公路,都是不分上下长幼和男女,齐心协力,人人动手,在艰苦而欢乐的劳动中享受着改变生活环境的乐趣和平等公正的新气氛。

生活上最大的不方便是用水。“安吴和安吴附近就没有一点流水……要洗澡的只好结队到五里十里外的小河里去。”^③寒冷的冬季,来自北方的学员似乎还可以忍受,炎热的夏季,来自南方的学员就会感觉极大的不方便。尤其是那个时代能够上学读书的女学员,原先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小姐,从江南来到关中,有时她们宁愿不喝水也要擦洗干净才安心。

冬季的西北昼短夜长,为节省起见,青训班“从开始到第六期都是吃两餐,后来因为白昼长了增加一餐稀饭。吃的大米、小米、面粉、禾豆都有,菜除了毕业会餐外都是素的,而且种类和分量都很少,有时同学们为了要募捐援助前方将士,还常常议决把某一餐的菜取消了”。伙食科在烧菜的时候,主张“不要把它煮的通烂(当然是要煮熟),这样菜量上就不至于比没有煮熟的时候减去多少,而且又节省了柴炭”。^④

面向社会招募学员后,“青训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员每人每月上缴的伙食费,远元,以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按时供应,加上师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偶尔接受一些社会捐赠。从目前所能见到的两份不同时期的招生简章可知,1938年10月第五期招生时,政治要求相对宽松,经济要求却很明确。

① 参见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泾阳县志》,2006页、200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葛瑞莫:《青训班的总务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202-203页。

③ 葛瑞莫:《青训班的总务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203页。

④ 葛瑞莫:《青训班的总务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203页。

宗旨——本班宗旨在于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之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自动开展抗敌救亡工作。

资格——年龄从十四岁至二十八岁,教育程度至少在小学以上,体格确实健全,无任何不良嗜好,能吃苦耐劳,守集体学习纪律者为合格。

手续——凡愿受训者须于开课前五天内亲到报名处(渭南各地及各省到西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办事处,渭河以北各地在云阳镇)登记,并缴每月膳费六元及相片两张,中途不得退学,退学者不发还膳费余款。^①

同时,要求“受训学员之来回路费被服碗筷纸笔一律自备,讲义则由本训练班供给”。

1938年源月的招生启事中,学习资格要求为:

(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者;(二)做过相当救国工作者;(三)初中及初中以上程度者(青年工人农民除外);(四)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六岁者;(五)身体健康,没有嗜好者;(六)毕业后愿受本班分配工作者。^②

没有特别提出要缴纳膳食费,却标明“家境贫穷而坚决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由各青年救国团体介绍与保证者,当予免费,但个人日常用具一律自备”。1938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活动后,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政府滞发八路军军饷,“安吴青训班”教职员工的膳食费统一降为每月源元。

学习期间,学员和教员一样,可以领到每月员元的津贴。干部和学员同吃一锅饭,同受统一纪律的约束,在清晨列队出操的队伍中,在开荒种地的劳动中,在帮助当地群众抢收粮食中……大家为着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打成一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待遇,给曾经到访的李公朴深刻的印象:“在青训班里只有工作职务的不同,没有生活的不同,上至主任、处长,他们在私生活上都不用勤务,虽说也有几个勤务员,但他们是用来传达命令、找人和送公事的,绝对不是为他们个人倒茶取烟折被……在生活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没有丝毫的不同。他们上下都没有薪俸,只有一块钱的津贴,由主任到勤务员都是一样的。唯一优待的,只有炊事员,因为他们的工作苦,所以每月有两块钱的津贴。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叫‘同志’,就是主任与勤务员,学生与主任,也

^①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招收第五期学生》,原载《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圆月圆日。

^② 《陕西安吴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招收新生启事》,原载《中国青年》(延安)创刊号,1938年源月。

是一样。”^①

在自由、民主、公正、平等这些现代社会理念中,实现平等的成本和代价是最低的,也是最富有中国历史传统资源的。尤其是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凭借意志和理想而实现的生活平等,具有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感染力和号召力。沿着这个路径,可以顺利通达军事化组织和集体化学习的境地。

军事化组织凝聚人

将漂浮散漫、性格不同的个体生命集合起来,凝聚成钢铁的矩阵,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军事化组织。“安吴青训班”沿袭红军传统,用军事化组织实施“最低限度之战时军事政治教育”。

“青训班”初办时,在教职员中,冯文彬任班主任,乐少华任连队长兼军事教员。冯曾在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长征后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乐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红五军、红七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负伤,被秘密转回老家养伤,1935年奉调延安。革命教育背景和红军工作经验,使他们很自然地按红军大学(抗战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传统,对学员进行军事化训练和统一战线教育。

“安吴青训班”的教学单位为连队,同时又是军事化日常生活单位。连下边再分成排和班。连部由连长、指导员组成,后来增加秘密负责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党支书的协理员。连长的任务是直接在教务处领导下指导、组织、督促、检查全连学员的学习,执行教学计划;指导员和协理员负责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从第十四期开始,为加强连队的集中领导,采取队主任制,每个连队设队主任、队长、副队长和指导员各一人,由队主任直接对训练班班务委员会负责。如果说连队编制是军事化纵向组织,那么学生会和隐蔽的党组织就是横向组织。学生总会及各连队分会,以学员群众组织的形式,团结并领导着全体学员,拥护与执行学校的一切决定,动员与带领学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收集反映学员的意见建议,活跃培训班学员生活气氛。根据前八期学员成分统计,“我们同学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一字不识的文盲,还有留学生,有产业工人,有贫农,有店东,有小贩,有军官士兵,有党部委员,有工程师,有国术家,有和尚居士,有蒙古人,有回人,有苗人,有暹罗、安南、缅甸、马来、南洋群岛和菲律宾的华侨”^②。纵

^① 李公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怎样办战时青年训练班》,方仲伯编《李公朴文集》,感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冯文彬、乔木:《我们怎样创办战时青年训练班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感页。

横交织的组织体系,从身份上对学员进行认证;严格的组织纪律,从言行上对学员进行规范,从而达到最有效的军事化管理。

训练班有一套完整的《班规则》,其“一般规则”^①第一条,开宗明义:“本班同学间一切问题的决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同时规定“各连学生均须服从班部与连部工作上的指导,并服从与执行学生会及全体同学之决议”;“除本班所规定之外的学生中一切集会及组织,必须经同学总会之许可和批准,不得扰乱整个组织系统”;“同学作息时间之分配,必须按本班一定的规定”;“无论上课、出操、点名、集会,都必须站队听从指挥员的指挥”;“集合时迅速肃静,不得迟缓、谈话、吵闹”;“同学要经常互相检讨日常生活,每星期至少举行生活检讨会一次,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课堂与会场规则”^②第一条,其中规定“同学须提前十分钟整队集合进入课堂,并由各值星排长向值星连长报告人数”;“各连同学须按照值星排长之分派□□开课,并在上下课时由值星排长喊口号”;“会毕,学生应按秩序退出,不准乱拥乱挤”。“寝室规则”^③第一条,其中规定“闻起床号音立即起来”;“起床后立即整理被褥,注意整齐划一”;“寝室内不得漱口洗脸”;“闻熄灯号音立即熄灯,如有别事故,须经过队长许可”;“午睡时,不能随便出城洗澡,或做旁的事情”。“饭厅规则”^④第一条,其中规定“全组组员必须在一席吃饭”;“同学因私事外出概不留饭”;“领饭领菜都由值日负责”;“吃饭时间暂时规定十五分钟”。“会客规则”^⑤第一条,规定“会客时间每日十二点至一点,三点半至五点半”;“来宾须到传达室签名,来宾寄宿亦在传达室”;“来宾参观拍照须经过秘书处许可”;“会客须在学生会客室,不得任意带往寝室、俱乐部”;“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会客,必须在课外活动时间,禁止在会议和休息时去找同学”。该规则还有“猿条”^⑥“附注”,规定了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如有违反上列规则者,得由连部及同学随时劝解并提出批评纠正之,若数次不改或所犯纪律特别严重时,可由学生会召集全连大会开展思想斗争而教育之,直到开除其学籍为止”。^①

军事化组织,铁的纪律,配合着游击战争常识课程教学,以及野营拉练、站岗放哨等实际操练,学员们受到的磨炼是深刻的。

风陵渡失陷后,为了保卫陕西,迎接战争,增加学员实战经验,“青训班”于^⑦1937年猿月底,源月初举行为期一周的野营演习。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组成青年自卫团,下设两个营,途经三原、淳化、耀县,进行各项军事演习项目。然后改编为^⑧10个支团,制定《下乡工作大纲》、《下乡访问工作要领》和《地方调查大纲》,进入农村,做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调查研究。^⑨1937年员月,“青训班”以“西青救”的名义,组织远个战地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实习。年底,“青训班”建立军事教导队,有枪百十条,培训军事干部并担任警卫工作。“这时,除了

^① 《战时青年训练班规则概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猿猿-猿源页。

完成正常的教学活动外,青训班加强了对学员的军事训练,在城墙上修筑自卫工事,还挑选了有军事知识的陕西籍学员组成四五个小组,每组二三人,分赴渭北十余里搞调查”^①,为迎接战争作准备。

军事课程包括操场动作、射击兵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内容。据当年的学员回忆,“讲游击战术是结合军事演习、站岗放哨进行的。开始不知道军事演习,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还以为敌人真打过黄河这边来了。指导员有时宣布国民党军队从那个方向来袭击我们了,离我们只有几里地了,于是我们马上紧急集合。大队多在夜间行军,很困难,由于摔跤,我的膝盖常磕出血,但仍坚持走。有一次夜行军中,有个同学不小心摔进沟里把腰跌坏了,躺了很久也没治好”。最兴奋的是演习中的实弹射击,最刺激的是站岗放哨。“有一次演习我们住在一个庙里,班长派我一个人到前面树林里去放哨。我穿了一件厚厚的黑布棉大衣,背了一支步枪在那里站岗。夜是那么的静,天黑的(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竖起耳朵听周围有什么动静,有时从树上落一片树叶在头上也警惕起来,精神十分紧张,自己也觉得好笑。好容易从天黑站到半夜有同学来换班了,这时感到自己是一位战士了,心里很自豪……”^②

国难当头,“青训班”学员为自己经得起磨炼,并能成为一名战士而骄傲。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生活会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安吴青训班”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为此,“青训班”积极倡导民主实践,以学生团体民主自治来激励学员,以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来实行领导,以民主生活会的舆论力量来改造人。

“青训班”负责学员管理工作的是“生活指导处”。据曾任生活指导处处长的张琴秋介绍,为了区别一般旧式学校对学生生活采取管束或教训的态度,“青训班”特设生活指导处,“从日常生活上来帮助青年的发展,以达到保证完成教学计划的目的”,管理方法上最大的特点,“不是要去限制青年的发展,而是要去帮助它”^③,即学生团体自我管理,教员与学员打成一片。

青训班同学总会是规模最大的学生团体,内部“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大会,闭幕期间由执行委员会代行全体大会权力。执委会设正副主席,任期一个月,过期改选。其工作纲要载明,完成学习计划,培养独立

① 张午:《青训班的后期情况》,《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47。

② 张德碧:《我的回忆》,页17-18,北京,中组部办公厅文印中心印刷,1984年,苑月。

③ 张琴秋:《生活指导处是怎样工作着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76。

工作能力，“健全民主的集体生活”；“领导课外活动，发挥各人特长，养成活泼、严肃、团结、紧张之作风”。^①学生会负责人通过无记名普选产生，“事先，班部关于学生会的改选作了普遍的宣传，墙报上发表了关于学生会改选的文章，各连队举行了学生会工作的讨论，然后由各连里推出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又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发表了各自的候选演说（这在中国的选举运动上是很少见的事），然后才举行投票。”^②

学生会组织各项活动，活跃生活。其中球类、游戏、歌咏比赛，几乎每周都有。“游艺晚会是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场面，唱歌、演剧（剧本大多数是自己创作的）、舞蹈，使大家兴奋得忘掉了工作的疲劳和所有一切个人的烦恼，使大家觉得，民族是在苦难中，但是青年的团结能克服一切困难，创造一个光辉的明天。”^③更能振奋人心的是各种政治类集会，以及与外界联欢，诸如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欢迎宁波流动剧团、欢迎各界知名人士到访、接待世界学联代表团等。群众性集会活动所带来的群情激奋、相互感召，以及对附近老百姓的吸引力，深深地激发着训练班的学员们。

在这些组织选举和集体活动中，“青训班”领导层不是简单地干涉，而是通过隐蔽在同学中的党员学员，把握动态，掌握方向，实现民主中的集中。从班排到连队，凡遇到学员意见分歧较大的讨论，允许学员自由发表各自的意见，注意火候，适时地由党员学员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发表意见，然后由数位同样是党员的学员来响应，扩大附议范围。如果估计附议者不足多数，则以休会的形式暂停，私下里作巧妙的说服动员。在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再行表决，获得多数通过。然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执行某种规定、纪律或意见。

规章制度执行过程遇到违反者，主要由每周六晚间的民主生活会（亦称生活检讨会）来开展思想斗争，予以矫正。民主生活会的规模一般分班排和连队两个等级，在班排小规模上，每个人都发言，大家都表态。谈个人小史，彼此感受叛逆精神的共同命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洗刷骄娇二气，完善个人革命道德，维护集体组织纪律。“当同学们谈起过去那不幸的小史时，大家总是热烈地倾听着，好像每一个故事都是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一样，也许是这么一个缘故，女同学们能最亲密地团结起来。”每一期新学员入学，带来新消息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习气，自由散漫、卿卿我我、爱出风头、自我封闭、洁身自好、吃零食……“可是这些浪漫古怪的等等习气，不久便‘沦亡’了。因为在每个星期六的晚间她们经常地举行一个生活检讨会，大家拿出自我批评的武器消灭了各种不良倾向，积

^①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训练班同学总会会章》（民国三十五年 远月），《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源页、源页。

^② 《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节录）》，《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源页。

^③ 《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节录）》，《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源页。

极、诚恳、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精神大大地发扬了，渐渐地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①这是和风细雨式的民主生活会。

如果出现私藏武器、造谣污蔑、打骂斗殴、盗窃财物等恶性事件，民主生活会就变得激烈起来。学生自治的手法除了说服，还有：团体制裁，事态调查，理清线索，发现目标；个别谈话，发动群众，集体报告，民主生活会上专题思想斗争，公开制裁。实践证明，“除了极少数最顽固的汉奸土匪，这几种方法都能收到很大的感化的效果”。^②

民主而能集中，个人意见可以在可控制的时间、空间内发表，集体的意志最终必须执行，关键在于党员学员以隐蔽的身份一呼数应，积少成多，星火燎原。只要你进入民主生活会的会场，就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只要你开口发言，就有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褒扬与自我褒扬的责任和机会。可以申辩，可以争论，人人表态，人人过关，最终将每个独立的意志瓦解、消融，组合成具有革命英雄主义情感的集体道德精神。

社会科学发 展理论可以武装人

“安吴青训班”课程安排，初办时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知识”、“军事常识”和“抗日青年群众工作”。从第二期开始，1938年时任“西青救”宣传部长 的乔木调任青训班副主任，兼文化教员，开设并负责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后来逐渐增减，形成政治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教育（抗日游击战争）、路线方法教育（抗日民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社会发展科学常识和唯物史观）等一整套军政训练课程体系。

其中的社会发展史，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 发展有始终，有过程，有规律，有阶段，认识掌握这些规律，就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目的在使学员了解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基本规律，使每一个青年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③这种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规律，其价值判断标准与社会阶段推进成正比例关系，革命的总是进步的，进步的必然是革命的。学员们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获得革命行动合理性的理论支撑，而且从此掌握了思想武器，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胆量。

教学方式舍弃简单灌输，突出学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根据教学目标和宗旨，组织学员参与教学任务分解和时间分配，表决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学

① 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159页、160页。

② 张琴秋：《生活指导处是怎样工作着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282页。

③ 刘瑞龙：《青训班的教务工作》，《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298页。

习以讨论为主,分班组讨论和连队集体讨论,教员及教务处工作人员按时参加各班讨论,掌控思想倾向和发展动态;辅之以自由问答、研究信箱、问答晚会、集体自习等方式。为了及时解答学员提问,教务处指定专人担任读书顾问,负责答复问题,介绍参考书报,并组织编写“读书之友”墙报,借以交流读书心得体会。针对学员文化程度高低参差的实际,教务处还安排文化高的学员担任文化低的学员的辅导,以及不同连队班级之间的经验交流活动。普遍开展学习竞赛,“通常是某一连的同学向某一连挑战,同时也就有几个连应战,这样便把全校的各个连都卷入竞赛的漩涡中。各连代表的联席会议通过竞赛的具体目标和日程,竞赛评判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各连的突击员也纷纷出现,紧张的学习空气弥漫了全校。”^①

考试方法也完全变了。事先公布许多有关课程题目,并帮助同学找参考书、整理笔记、解答题目。考试时另外出题,考场允许查阅笔记、参考书,但必须用自己思索过的语句作解答。试卷由同学中水平高者负责审阅,或以班级为单位互相审阅,辨其正误,然后将理由写好交给教员审阅。另外约定时间,由教员主持召开问答晚会,通过正确答案,学员根据正确答案改正自己试卷上的错误。

这样的复习和考试方法,使学员关注的不是分数,而是经过多次反复辨析修正后,不仅获得知识概念,更提高和统一了思想认识。

“青训班”学员的生活是严肃、紧张、活跃的。“在天还没有大亮,常常星都没有落完的时候,起床号就呜呜地吹了,于是各连队里就充满了口哨的声音。所有的同学,除去每班整理内务的‘值日’和因病请了假的,就一齐迅速地集合起来,连长领导着,指导员协理员参加着,开始上早操。哪怕大地还是死一样沉寂,哪怕寒风迎面割着皮肤,我们同学总是一面唱歌一面行军,或着叫着雄壮整齐的口令,走向郊外的野地甚至十里外的山头上。”早操后漱洗,四季冷水,且水很少。然后是两小时的集体自习或上课。“课堂一般都是露天的,凳子就是一块砖或几块砖,或根本没有砖,也没有讲台,不过有时有一块黑板。”课后才是早餐时间。因为“饭在寒天吃两顿,热天吃三顿,就是除了早晚两顿干饭以外另加中午的一顿稀饭”。夏天时间,午餐后是集体午休两小时。下午时间变化较多,自习、辅导、问答。晚饭后的时间,开小组讨论会、集体讨论会、民主生活会、听报告、参加娱乐晚会。“直到熄灯号吹了,于是劳累了一天的身体,就都在铺了一些卧草的地上,一个靠一个地享受着甜蜜的安眠,只除了那轮流放哨一小时的同学,他们为了保障青训班同学的安全,却还拿着简单的武器警醒地守在门外。”^②每一天的每一个时辰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从生活起居、思想言行,到人生理想,都被

^① 刘瑞龙:《青训班的教务工作》,《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

^② 张琴秋:《生活指导处是怎样工作着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

集体组织设定了目标、路径。

“国防教育的训导是以培养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所应具有的各种品格为目标。”^①安吴训练班的时间是短暂的,学员们的身体在磨炼中变得粗糙起来,生活上尝到了令行禁止的军事化滋味,精神上感受了革命集体主义的崇高格调,思想上基本上获得了社会发展科学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鼓舞。这样,从一个抗日爱国青年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雏形就基本定型了。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员)

^① 柯柏年:《国防教育》(1935年),《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源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 摇唐少杰

本文试图述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教育革命”的诸多方面。毫无疑问,清华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也是“教育革命”首屈一指的样板。清华“教育革命”在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超过了其他大学,而且其本身就标志着文革的诸多取向和部分轨迹。即使在其破产~~十~~余年后的今天,追溯并评析清华“教育革命”这一典型个案,依然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14

大学人文「
第一辑」

文革的“教育革命”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1958~~年的“教育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的许多现象和经验都在后者以及文革前的教育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得以孕育或表现。清华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全校上下进行了各为时数月的大张旗鼓的“教育革命”,就有着某些文革“教育革命”的种子或影子。例如,以“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形式来办教育,盲目扩大生产劳动在教学中的比例;师生停课“大炼钢铁”;在教师中大搞“拔白旗”和“送西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压制正常的学术争论,禁锢不同的教学主张,鼓励学生以“大跃进”的速度自编教材、讲义,贬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倡导“阶级路线”,愈益加强以“血统论”为特征的“出身论”和“唯成分论”,注重以“阶级斗争”来干预和统率教育问题,不断强调政治标准高于学科知识标准,时常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教学质量,越来越趋向激进而荒唐、狂热而粗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等等。尽管文革前的与文革时的“教育革命”不是等同的,但是人们对于清华乃至全国“教育革命”的直接由来和历史根源所作的分析和批判远远不够。~~1978~~年~~1~~月颁发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中称赞~~1958~~年“教育革

命”和指责 1957年以后这一革命“夭折”，①就清楚地说明了文革“教育革命”实质上是把文革前“教育革命”所带来的片面和纰漏推向了极端。

然而，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打倒“走资派”和群众性的抢权、夺权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教育革命”还没有成为文革初期“狂飙曲的主题”。不过，这时延续着文革前教育改革的思想“惯性”，清华内外关于“教育革命”的许多讨论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例如，1957年 8月 15日，《人民日报》在连续多期关于“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讨论中，发表了清华电机系电 苑班全体学生的来信。此信提出：

(员)工科大学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圆)学制缩短为二、三、四年，现有大学生提前毕业。(猿)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毛主席著作为首位教材，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军训，教学以生产实践为主。(源)改造教师，今后工科大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工人，是生产者。(缘)废除研究生制度。(远)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生水平。

在文革第二年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尽管“教育革命”的实践还没有排上文革的主要议事日程，但是群众造反派已经把“教育革命”问题纳入到讨论和规划的视野之中。1957年 11月 15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要依靠革命派群众的最新指示，在自己的《井冈山》报第 120期上用三个版面论述“教育革命”，发表了“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的文章，该文提出：为了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新生比例 1/3 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 1/3。招生必须贯彻以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步骤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 1/3 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 1/3 ~ 1/2。对五类学生不予以录取：

(员)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杀、关、管者；(圆)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猿)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且又屡教不改者；(源)刑事犯罪者、反动言行者；(缘)长期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对于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实行开卷考试。”②

清华文革“教育革命”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在 1958年初。显然，文革头两年的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当文革群众两派围绕着权

①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50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

②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1957年 11月 15日，第 120期。

力斗争进行着生死较量之际,谁来具体领导“教育革命”还无从谈起。1958年源月 圆日至 苑月 圆日,清华发生了牺牲惨重的“百日大武斗”。①毛泽东以此为契机,一举扭转了大学的文革局面,终止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气数”,结束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给教育界派出了新的领导力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并从总体上把全国大学所有师生列入文革的对象。

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换言之,大学师生不可能在“教育革命”中当家做主。工宣队进驻清华后,首先是在政治上对清华作出了一番变革。

从毛泽东 1958年 缘月 苑日给林彪的信(著名的“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被当作文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工宣队首先要做的就是否定和推翻文革之前的所谓旧清华。工宣队进驻之初,全国文革正进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每一单位的成员都要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和社会历史关系等方面接受政治审查或“验身”,以确保文革“正统”阶级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工宣队领导的这场重点清查个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运动,致使清华共有 圆人自杀身亡。1958年 怨- 圆月,清华先后召开 远次全校万人大会,揪斗了 怨人,还召开了其他形式的批斗会。全校举办各种“学习班”,开展政策攻心和立案审查。 圆月和次年 员月,又召开两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校万人大会。在持续了两三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运动中,清华全校被立案审查的有 员圆人,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的有 员苑人。②这种人人过关甚至人人自危的运动,使得一些当事者今天回顾起来还心有余悸。相比较清华整个文革时期约有 员圆人被立案审查、员圆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可以想像,“教育革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异常恐怖、严峻和残酷的形势下来临的。

清华工宣队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成《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1958年 员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对 1958- 1959年清华历史的否定和为随后清华乃至全国的“教育革命”所作的铺垫。它认为,清华“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清华各级干部大都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要他们“承认错误”,才能“给予适当的工作”,清华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进行再教育”,清华著名教授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出路”,“留着做反面教员”;父母在文革受到审查和打击的学生,只要同父母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是“可以教

①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 猿月 圆日。

②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圆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子。1956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清华在文革中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他派身边的人员迟群、谢静宜主管清华和北大等,这也就从某一角度表明了清华“教育革命”对于全国的典型影响和示范作用,并经由工宣队而赋予“教育革命”某些独有的特性。因此,文革“教育革命”是通过清华大学,具体地说是通过清华工宣队,普及到全国高等院校的。

工宣队成为“教育革命”的“总管”。无论怎样,所谓工人阶级对清华的“占领”、工宣队的领导乃至1958年下半年直至1959年4月初在清华大学“执牛耳”的领导人,都不过是凭借着毛泽东的权威,用迟群等人倍感自豪的话来讲,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兵”。这种大致上具有初中学历的“兵”能否真正“驾驭”清华的教育及教学、科研大业,可想而知!

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①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是一块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敌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清华的系(所)、教研室(组)、实验室(车间等)、学生班级等一律按照军事建制分为营、连、排、班的层序,它们所显现的是“教育革命”准军事体制下的生活和运作。

清华领导人在1958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②这是信口雌黄,因为在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5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几乎没有)、老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1958年后,在恢复和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在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中,工宣队却一直作为最高主宰。工宣队实际上驾驭了“革委会”和党委会。1958年初成立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58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知识分子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工宣队进驻学校,是完全来自学校之外的“钦差”,是文革“空投”到教育界的一个“怪胎”。在教育界之外,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工宣队实际上就是文革中后期教育界的“幸臣宦官”。在恢复了学校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驶着大权,这势必造成学校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原有的学校干部的区别。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恢复学校秩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200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第 20 期,1958年 5月 5日。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2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序 稳定学校局势 消除群众武斗 整合不同群众势力 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 ;从长远来看 ,是为了取得教育界的领导权力 整治甚至敌视知识分子 不相信学校原有的中共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 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各个方面 ,试图以崭新的“教育革命”改换整个教育事业 ,并为塑造文革的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第二 ,清华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无疑 ,工人是领导 ,学员是主体 ,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

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过去在校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变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 ,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又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 ,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必须强调的是 ,“学员”这一用语绝不同于“大学生”、“本科生”或“学生”用语 ,前者的取向和内涵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从工农兵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 ,“教育革命”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教育革命”的学员培养意味着力图造就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教育革命”的一个别出心裁的做法就是制造出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 ,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 ,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总是紧紧地依靠校内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学员 ,把他们放在斗争的第一线” ,让他们在教育阵地上冲锋陷阵 ,发挥生力军的作用 ,直接参加教学改革各个环节 ,即受教育者参加办教育 ,还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 ,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① 1968年春 ,试招的清华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 :“我们上大学 ,还要管大学 ,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一口号后来改成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宗旨 ,即“上大学 ,管大学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并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 ,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限。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 ,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 ,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 ,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②因而 ,“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③

这时 ,1958年前的清华校训“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和 1952年前的清华宗旨“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 ,被“上、管、改”口号所取代 ,并出现了校、系甚至班级

^① 清华大学档案 :全宗号 圆案卷号 2327号,《工宣队、革委会 关于“七·二七”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有关材料》。

^② 清华大学档案 :全宗号 圆案卷号 2327号,《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③ 清华大学档案 :全宗号 圆案卷号 2327号,《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的学员“上、管、改”组织。这种组织与过去的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不同,它是监督、改造教师的组织。学员们不断受到告诫:不要忘记自己的工农兵“主人翁”地位和意识,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教育的回潮和旧知识分子的复辟”。“上、管、改”一类的组织在清华以及其他大学的出现,仿佛农村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协会”,被视为推行“教育革命”的一支群众队伍。

第三,“教育革命”伊始,清华与北大一起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独立王国”是“只讲教学、科研,不关政治路线”的修正主义组织。“旧大学教学组织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教研组,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的。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在这样的组织下,广大工农群众进不来,广大工农兵学员无法参与教育革命重大问题的决定,世袭领地的气味甚浓,修正主义‘业务党’、‘中庸之道’等黑货极易泛滥,对修正主义复旧走老路的抵御能力甚微,对‘老三段’(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育体系十分适应,而对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教育上一系列变革的阻力却很大,其要害是排斥工人阶级领导,阻碍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改革组织体制,根本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破‘黏土’成堆的‘教研组’体制,将‘黏土’散到沙子堆中去,用多种方式使工人、学员、教员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教育基层单位,这样,就使在基层组织中组织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加强了工人阶级领导。”^①具体做法就是解散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师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做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教育革命”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1958年 苑月 10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式”。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权威的形式出现,它又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②。《创办》还是 1958年 苑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1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②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22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创办》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的六个内容分别为：

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在清华连续四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真可谓“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所提出的体制、师资、课程、开门办学、教材、教学方法等，对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清华“教育革命”随同整个文革，把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当成文革及其“教育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经过 1966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潜在敌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实，这“两个估计”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显示出来了。

1966 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尤其是对“教育革命”把教师的世界观当成异己的这种束缚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紧箍咒”做法，大为不满。这种对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实质上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使那些 1955 年之后到 1966 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感受到的，不啻是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甚至沦丧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直接针对“五七指示”，而是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教育革命”斗争的焦点之一。清华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①他们引用毛泽东在 1966 年 1 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

^①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21-122页。

次可能出四千……”^①这也就再次表明,一方面,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另一方面,由世界观问题来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中的“另类”,这也就使得文革由荒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闹剧般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命”。

清华“教育革命”自 1969 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尽其可能地予以纠正或修补。他们借着 1969 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但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0 年 1 月至 3 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所经历的第一场大的斗争,它整治了被称为体现着“旧教育路线回潮”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 1 源 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1 源 人 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为数更多。^②

正如清华当时的材料所总结的,这场运动表明,教育阵地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有人)硬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路线,以此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学校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步亦趋,紧密配合,极力煽动批极‘左’,实际上就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教育革命,批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这种代表人物强调“‘教育革命进入业务领域,工人不懂业务,没有实际领导权’,他们在党的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专家’,在群众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干部,以业务为武器,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实质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有市场,复辟资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潮流,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了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不改造就会本能地倾向修正主义。”文革教育体制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撤销原来的教研组(室),实行厂校挂钩,互为基地;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师生合编;基础课教师下到各个专业等。这些“教育革命”的做法受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责,一时间出现了“厂带专业害死人”,新教育组织体制“不正规、不像个大学样子,是所谓连队办大学,搞得‘质量低了,理论弱了,秩序乱了’”等说法。一些单位恢复了过去的旧组织体制。“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总是要恢复旧的组织体制。因此,恢复知识分子成堆的旧教育组体制,就成为他们复辟的组织手段之一。”^③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 苑 苑 苑,《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材料》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 苑 苑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1 源 源 页。

这场运动还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同批判孔子及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起来,说这次回潮的代表人物们“总是梦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复兴蒋家王朝的‘礼’,复兴封建教育路线的‘礼’”。他们以“林彪事件”为契机,错误地估计形势,大加指责文革的新生事物。“他们为什么对批极‘左’那样感兴趣?实际上是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新生事物。”①在“教育革命”方面,“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从四个方面加以否定:一是恶毒攻击文革。他们认为,文革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伤了元气”;“害得好苦”;文革“执行了极‘左’路线,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后遗症很大”,“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文革“完完全全失败了”;二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三是诽谤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道路,认为文革开始后没有真正的大学生;四是极力抗拒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什么走“五·七”道路是“珍珠入土,上当受骗”,“外国卫星上了天,中国教授下了田”,认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作出的“两个估计”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用这两个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没门儿”②。

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他们表现出的不满和指责主要集中在下列十多个方面: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做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③这些不满和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深切和尖锐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即使在文革“教育革命”的兴盛时期,清华大学都有一股根深蒂固的批评、怀疑和动摇文革以及“教育革命”的心态在潜行。例如,正是分管“教育革命”工作的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强调:“对教育阵地十七年不能全面否定,”“工农兵学员质量像面包,看起来鼓鼓的,一捏就瘪,像这样,我们民族文化要毁灭了”。他被称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在党内的代言人、“保护伞”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急先锋”,他和清华一批干部因公正观察和客观评论而受到批判和免职。

1968年底,清华“教育革命”的偏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华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目录号 政,案卷号 圆,《政治部 员,源年 原,缘年梁校和校理论组等所写的部分有关路线斗争方面的批判稿件等有关材料》。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③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目录号 临,核,查,案卷号 圆,《整党办公室核查处“文革”中大事件调查报告 员,关于“三个月运动” 缘,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同志的材料》

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教学改革改得怎么样？所承担的工厂任务完成得怎么样？”①到了1957年，他们继续强调，“现有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从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来看，从他们的世界观来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来看，大多数还是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②。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坚持认为“直到今天，我国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大多数知识分子距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一遇到风浪就会左右摇摆。极少数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遇到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这一次的右倾翻案，都是从知识分子成堆的上层建筑领域首先发难，就是一个明证”③。

总之，清华“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上了大学，即使学的技术能上月球，而人的思想却趴下了，这样的教育再‘高’，也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④迟群典型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⑤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二

清华“教育革命”的模式除了上述的政治方面，还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

清华“教育革命”在招生对象问题上，鉴于文革前招生以考试为标准所带来的“智育第一”和学生中非工农子弟比例一直不高的“教训”，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过去清华招生中由于家庭出身及父母职业的影响等因素，使得非工农子弟（如知识分子、职员和干部等子弟）入学比例相对较高，而工农子弟比例相对较低。据统计，“1955年到1956年，清华新生中的工农子女的平均比例占新生总数的19.1%（1955年为19.1%，1956年为19.1%，1957年为19.1%，1958年为19.1%，1959年为19.1%，1960年为19.1%），比当时全

①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00，案卷号 1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②③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00，目录号 100，案卷号 100，《政治部 1957年 原1957年梁校和校理论组等所写的部分有关路线斗争方面的批判稿件等有关材料》。

④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原载《教育革命通讯》，1957年。

⑤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1957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国平均比例还低“国豫”^①。这成为清华文革前的教育的一条“罪状”。清华“教育革命”把改变招生方式、改变学生成分当作一项基本的内容。

从1956年至1959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收大学生,这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闻。算上文革前招收并在文革期间毕业或结业的大学生,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培养至少有七年或七届学生陷入“非正常学习”的时期,例如1959年进校的大学生只有近一年的学习时间。随着“教育革命”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如何办学及怎样招生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学的面前。

1959年7月至8月,清华在校内外举办了100个教育革命试验班,招收1000余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教改探索。清华还听取了钱伟长等老教授关于教学改革的想法。1959年8月底、9月初,清华1000多名师生分赴校外100个对口单位进行劳动,“探索”“教育革命”。1959年10月至1960年8月,由工宣队队员、教工、学生组成的100个教育革命小组,先后到几十个工厂、公社、部队及部分院校、机关,召开了近1000次讨论会,听取对大学招生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日后实行“教育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最主要的是针对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确定了:“一、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分子。从工农兵中招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挑选政治思想好,具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优秀分子入学。二、招生和分配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三、关于文化程度。……今后大学从工人中招生,文化程度不宜限制,既有文化低但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培养前途的老工人,又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三、四年级实践经验的青年工人、农民。四、学生年龄以18~25岁为宜。五、招生办法。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群众路线,学习解放军征兵办法,采取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与选拔相结合。”^②在稍后的几个月里,清华继续派出许多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等进行教改试点工作。到1960年底,清华校内外试点班招收了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1000人,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8岁,多数是18~25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以初中程度居多。选拔和培养采取单位推荐,结业后“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学习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两年。^③这样,到1960年夏天,清华“教育革命”的招生方案实际上已经形成,同年底,这套方案的试验经验已经定型,一年后推向全国。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0,目录号:政,案卷号100,《政治部 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简介(讨论稿)》。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0,案卷号100,《1959年10月10日,《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报》,1959年11月1日第100期、12月1日第100期、第100期。

^③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0,案卷号100,《1960年,《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1956年猿月,北大、清华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的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①远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56-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1956年,清华大学共招收各类学员1000名,均系推荐入学,未经考试,文化程度严重不齐:小学100名(占总数10%),初中100名(占10%),高中100名(占10%),中专100名(占10%),上过大学的100名(占10%)。②实践经验有10年以上的有100人,10-20年的有100人,20-30年的有100人,30年以上的有100人;学生来源为老工人的100人,青年工人100人,农村青年100人,现役军人100人。③在1956年招收的1000名学员中,高中一年级以上水平者占100,初中二、三年级水平者占100,初中一年级水平者占100,中等技校和其他水平者占100。这一届的学员学历要稍好于1955届的学员,前者的初中学历者(包括未完成的)约占100,而后者实际毕业的100名学员中,初中(包括未完成的)及初中以下的学历者就有100人,约占100。^④这是因为1956年,在不少省市工农兵学员的选拔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文化知识考试(后来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取消了所有考试)。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半,1956年改为三年。“三年半教学过程大体安排是:学员入学后,首先参加专业生产的全过程,同时参加工厂的技术革新,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基本知识;然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结合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生产、科研任务,边实践边学习,同时紧密联系实际,安排一定的理论提高阶段。”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100页。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100页。

④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

“现在工农兵学员培养的整个过程,始终坚持开门办学,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直接参加推翻剥削者的斗争,直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单纯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组织教学的旧传统。”在反驳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学生在学习期间主要是学习书本知识后,强调这种限于书本的做法就是使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修正主义道路。……结合各种典型任务,边实践边学习,这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培养学员的一个基本的、有效的过程。结合典型进行教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教学环节。它的目的是通过完成典型任务,学习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立场感情和革命精神,培养学员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典型的选择,应该是生产科研的实际任务、有利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体现专业的培养要求”①。

1970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的“工农兵学员”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三年制)②

课 程	汽车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房建专业	
	学 时	比 例	学 时	比 例	学 时	比 例
毛泽东思想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学军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学农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学工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课 (包括专业基础)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专业课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清华大学在 1970 年规定,切实保证学员在每学年 10 周中有 10 周的业务学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0000000,案卷号 00000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1911—1949)》(讨论稿),1979年远月,打印稿。

习时间。① 林彪事件前后,针对“有些班级一度学习纪律松松垮垮,教学进度完不成,业务学习时间无保证,甚至有的班第一学年教学时间只占总学时的~~缘~~”这一情况,清华取消了一些空头的“政治学习”,决心保证教学总学时中~~苑~~~~~愿~~的时间用以业务学习。②稍后,还一再强调应使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时间应占每个学年学时的~~苑~~~~~苑~~,但事实上只能保证~~缘~~左右,因为大部分学时还是被入学教育、政治报告、政治讨论、大批判会、排练庆祝活动、野营拉练、挖防空洞、挖坑栽树、挖河清泥、清理仓库、迎接外宾、看内部电影等所占用。③自动化系学员反映,入学怨个月,理论教学只有~~缘~~天。汽车系的学员反映,在校期间,真正学文、学工的时间不到~~缘~~个月。④又如,~~苑~~年~~缘~~月~~缘~~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学员每周活动时间安排的通知,规定除每周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外,每周政治课时间为~~源~~小时,星期四晚上党团活动,星期五晚上机动,可安排讨论“教育革命”、班务会等,星期日晚上为业余读马列著作小组活动时间。⑤这样,在一周七天~~愿~~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约~~源~~个小时)中,至少有~~缘~~个单元时间为非专业学习时间。学校也承认,由于教学总学时减少了~~缘~~、教学内容减少了~~源~~,教师均对此表示了不满和批评,如何看待教学质量成为教育斗争的一个焦点,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借他们在‘文化’上某些传统的优势,以‘文化’业务这条大棒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教学质量、文化考查、知识分子的思想反复等问题上的斗争,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在教育阵地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还要在这个领域,利用他们某些文化的优势,反对无产阶级的占领。”⑥在“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就是最大的业务”的思想支配下,学时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学校是否进行政治运动等活动。例如,在~~苑~~年底至~~苑~~年,学员的学时就被铺天盖地的“批邓”运动占用了许许多多。反正,工农兵学员的学时最难以得到保障,也最容易被打发掉。

清华“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业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无法依赖教师,但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而另起炉灶,现实唯一可行的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一)》。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二)》。

③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④⑥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⑤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革委会下发文件》。

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在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清华“教育革命”中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不过,以1956年招生为界限,清华“教育革命”对待教师的做法还是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工宣队刚进入清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广大教师处在一种无形而又深重的恐怖和压抑之中。除了进行前面所提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宣队还把广大教师下放“改造”。1956年缘月,清华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5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①。同年缘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1000名教职员(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1/1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10月来的一批人带有战备疏散的特点)。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患有血吸虫病。这个农场与清华本校相距千里,主要是用于教师的劳动改造;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农场本身几乎接触不到农民,自称是自给自足,但来往的人员车费开销巨大,从事农活的花费巨大,生产出的稻米每斤成本不低于当时人民币1元(那时全国各地的稻米每斤销售价格一般不超过圆角)。到了1956年,农场劳动改造和校内教学任务,两边都“争夺”教师。最终,这个农场所造成的沉重负担使清华无法继续承受下去,1956年10月后不得不迁移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

1956年底,清华大学近万名师生员工(包括1956年和1957年入学的学生1000人)主要分布在四个地方:校内有1000人,江西农场有1000人,四川绵阳有1000人,三门峡、丹江口、邯郸、张家口等地进行“教育革命”的有1000人。^②造成清华这种分散的局面,除了“教育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还有当时备战形势的作用。这时的清华经历了继“西南联合大学”历史之后的最大一次“分化”。

1956年招生后,教师们陆续回到清华,但他们的政治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教师从事教学,他们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后面还要提及这一点)。“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③进而,工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远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简报》,1956年缘月猿日,第1000期。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③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远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报》,1956年10月15日,第1000期。

宣队更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之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

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①

“教育革命”一再带来的重压，使得一些新教师力图向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看齐，他们不想接受教师的身份和称号。例如，~~1966~~1966年夏天，文革前招收的清华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或结业，~~愿~~愿名毕业生留校工作，其中不到一半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其余的从事工厂、后勤、机关等工作。为了表示与旧教育的“决裂”和与工人阶级“画等号”，他们自称为“新工人”而放弃“教师”的称号。另一方面，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影响下，清华一些老教授试图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改换成对“教育革命”的某种适应，工宣队对此概述为：他们从“业务名词不离口，到红宝书不离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到大批判战场上杀上去；从‘神仙会’养尊处优，到‘学习班’斗私批修；从消极等待‘斗、批、休’，到积极投入斗、批、改”^②。这往往是教授的异化式的表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文革“教育革命”都是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难史和精神炼狱史。

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清华“教育革命”作出了非同小可、波及全国的举措。清华“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演变成为整治知识分子、冲击教学并使教育裂解而蜕化的“大棒”。

~~1966~~1966年愿月，清华确定建立汽车制造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以厂带系甚至以厂取代系和专业来进行办学。~~1966~~1966年愿月，为了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工宣队决定，在清华汽车厂生产纪念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七·二七”牌~~猎~~猎吨中(小)型军用载重汽车。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文革前清华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政策推向极端，力图把清华变为生产与教学并重(几乎谈不上科研)的单位。工宣队以汽车系、机械系等系为汽车厂的主干，提出“以厂带专业”，调动汽车、铸造、锻压、焊接、金属热处理五个专业的全部力量，来进行汽车生产及教学。与此相关的大部分教师乃至全部学员都成为该厂的“工人”，办厂不久，有的学员就抱怨“我们是廉价劳动力。”汽车厂群众批评学校在办厂问题上有“贪大求洋”的倾向。^③原计划该厂~~1966~~1966年上马，~~1966~~1966年生产~~缘~~缘辆，~~1966~~1966年生产~~缘~~缘辆，最后只生产了~~缘~~缘余辆，生产出来的汽车实际上主要是依靠外面的汽车厂提供大部分零配件加以组装的。这种“七·二七”牌汽车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为了它的生产，调动全校各系各专业的人力和物力，使全校的教学、科研及其他

^①清华大学《清华战报》编辑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原载《清华战报》，~~1966~~1966年愿月愿日，第~~苑~~苑期。

^{②③}清华大学档案 全宗号 档案卷号 ~~远~~远，见《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简报》，~~1966~~1966年缘月~~猎~~猎日，第~~苑~~苑期。

生产都受到影响,仅在人力上就调动了上千名的教学、科研、技术等人员,所建起的汽车厂占用了相当大的实验室、车间和教学区的用地。有的实验室被强行改行,损失巨大,三年难以恢复元气。^①清华汽车厂的上马和下马所造成的巨大的甚至无法估量的损失,是“教育革命”办学办厂存在严重问题的最有力的佐证。当时,偌大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人对这种办学办厂进行了一针见血、有理有据的公开批评,他就是在机械系一车间以“待罪之身”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②

这种“以厂带专业”的办学方针,使得非汽车专业的电力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自动化控制、数学、力学、热能学、水利水力学、电子学、工程物理学(即原子能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化学等专业遇到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有的清华工科和理科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办成工厂或走出校门“办教学基地”。例如,土木建筑系四连就提出:“土建系必须到工地上去办”。^③不难确定,这种办学必定是以牺牲或削弱理论教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为代价的。这种办学在清华还对作为理论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实验室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清华的实验设备普遍落后,大体上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 40 年代水平的实验设备。^④到 1968 年,全校 50 多个实验室,除 1 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害,有 10 多个需要完全重建。清华科研人员也由文革前占教师人数的 1/3 下降到 1/5。^⑤即使在文革结束之际,清华全校的实验室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教育革命”的办学方式不仅在于上述的以办厂来代替教学,还在于使学员走出教室和实验室,作为直接的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这种“开门办学”的方式不仅是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首先是使学生向“工农思想开门”,^⑥从而保证学员学习的所谓政治质量、路线质量。清华“教育革命”一再强调,“开门办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人”和学生“为什么人”和“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清华文革前五年制或六年制的大学生没有解决,而通过“开门办学”,文革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解决了。

“开门办学”的方式还表现在抛弃清华过去通行的“老三段”教学程序,即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25,题签《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简报》,1968 年 12 月 1 日,第 1 页。

^②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原载《光明日报》,1968 年 10 月 1 日。

^③ 《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创办,1968 年 12 月 1 日创刊号。

^④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25,题签《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⑤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87 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88。

^⑥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01,案卷号 25,题签《迟群、张凤瑞等在华北五省及北京市有关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指责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清华引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并于次年初引发了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一时间,清华又一次成为文革政治台风的风源,现有的教学等工作被打乱,“教育革命”在上达天庭、下通八方的政治斗争中急剧地转换和普及。清华园内,铺天盖地的数以万计的大字报,成百上千次的大批判会、揭发对证会、经验介绍会、座谈会、誓师会等,成为日常工作的主流。从1958年7月到次年9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国各行各业约计有近1亿人先后来清华大学“参观学习”,10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使节、记者等也来清华参观“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1958年底到1959年初,围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显而易见只是一方的大批判),清华在接待宣传提纲中指出,辩论的分歧在于:

一、如何估计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二、如何估计文革以来特别是“七·二七事件”后的教育路线?三、当前教育路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四、学校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五、如何看待文革教育战线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六、学校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和坚持什么样的培养学生的标准?七、要不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八、教育界由谁来领导?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能不能领导?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在文革的战车上,清华“教育革命”的政治功能总是超负荷地满载。

1958年8月15日,清华大学党委有关常委及有关人员约1万人,事先得到授意并经过排练,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批判邓小平的会议,①他们直面斥责、声讨邓小平的种种所谓“错误”,开创了基层党组织人员直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围攻中央领导人的“先例”。他们回到清华后,又把这一事例传达、介绍给广大师生群众,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波助澜。

文革的两次整顿(1958年周恩来的整顿和1958年邓小平的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导致了文革中的“反复旧”、“反回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仅教育界处于主要的、中心的战场,而且清华大学始终处于这种战场的前沿,甚至是使“教育革命”一再兴师动众、呼风唤雨的制高点。这再一次显现出清华“教育革命”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说,清华大学成为源头的上述批邓运动是文革的最后一场运动,标志着文革走向穷途末路,那么同样由清华大学掀起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也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丧钟,并且最终致使文革“教育革命”走向了不归

① 参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58年》,上卷,152-15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三

清华“教育革命”乃至整个文革“教育革命”的重心,不断超出教育领域,几乎失去了教育的本意,成为泛政治化的东西,成为文革政治斗争的仆从或工具。这类革命对于教育界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异化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由外来者所强加和主导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教育的鄙视和对教育者的歧视,如同当时清华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①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文革从教育界开场,又在教育界落下帷幕。教育界,具体地说,大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文革的摇篮和坟墓的“结合部”,成为文革罪过和灾难的渊藪,成为“教育革命”的“标本”,无疑,这些都具有值得后人不断加以审视和借鉴的某些人文因素。

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对待“教育革命”则意味着如何对待文革,反过来说,亦然。进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反过来说,亦然。但“教育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失败的必然性来自它自身不可化解的两个主要“内因”。

首先,“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②的确,为时愿年之久(从1966年至1976年)的“教育革命”所带来的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切反思和痛切批判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国内评论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这种实质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③而我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显而易见,“教育革命”带来的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知识和反知识分子运动,也不是凸现或褒扬农民大众的文化价值,更不是什么倡导全民教育上的平均价值和均等状态,而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苑苑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国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②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愿愿页。

^③ 参见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愿愿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愿愿页;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人格的大蜕化。下面仅用清华“教育革命”的事例来说明。

1958年 8月至 10月,清华校级领导人先后分头到各个系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发现学员的文化知识程度和年龄严重不齐,例如,水利系水工专业二年级 150人中,工人、农民学员各占 1/3,解放军学员占 1/3,初中程度 1/3,占 1/3(其中初中毕业的 1/3),高中毕业 1/3,小学程度 1/3。学员入学时年龄在 18岁以上的占 1/3, 18-17岁的 1/3, 17岁以下的 1/3。二是发现学员的学习水平实在差强人意,据统计,全校平均学习好的学员一般只占全部学员的 1/3左右。例如,机床专业二年级有 100个班共 1000人,学习好的只占 1/3,学习中等的占 1/3,学习差的占 1/3,其中第四班是由分出来的困难学员组成。三是发现学员中具有难于想像的学习困难和无法克服的学习障碍,即有的学员不会做作业,只能抄袭别人的;有的学员在数学方面还没有达到初等数学的水平,数学必须从复数、四则运算、三角函数等补起;有的学员不懂原子结构等基本概念,分不清克分子浓度、百分比浓度等;有的学员在函数、对数和指数的运算中频频出错,连运用计算尺也不习惯、不熟练,常在单位换算、小数点定位上搞错。四是发现基础课往往冲掉了专业课,课程学习中不能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严格可行的标准。^① 清华当时的校方总结材料中也承认,在教学中遇到了学员文化程度严重不齐的尖锐矛盾,学员最高的程度达到了中专水平,学过微积分,而低的连加减乘除运算都很困难。学员学习中遇到了“吃不饱”与“吃不消”的抵触。^② 清华还把机械系的一些学员的水平从四则运算到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的“提高”,作为“互教互学”的经验加以介绍。^③ 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学员不仅基本概念不清,而且就没有基本概念,一位学员就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为此还与教师争论了半天。^④ 有的学员甚至连书信也写不了。

学员也对“教育革命”的无序和混乱表示了不满。他们批评清华校、系的许多领导人的工作作风,认为他们只习惯听汇报、看简报和发指示,凭借着第三、第四手的资料进行一般号召,胸中无全局,手中无典型,很少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虚饰、浮夸严重,形式主义的东西颇多,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东西不少,工作头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案卷号 10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常委对各系学员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案卷号 10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③ 《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1958年 10月 10日,第 100期。

^④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案卷号 10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绪繁多,抓不住重点,搞什么工作都是虎头蛇尾,最拿手的就是一号召、二发动群众、三大批判、四大总结,这完全是一套八股,对于解决实际矛盾无济于事。^①除了前面提到的批评教学时间没有保证外,他们还对学生安排、所谓“以干代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方式等提出了意见,尤其是对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有些教材编得还不如文革前的教材好懂。这些意见主要如下:数学教材从小数点运算到微分方程要一年内学完,有些学员被“灌得够呛”;有些教材是上来一段毛主席语录,下面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在中学遇到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理论基础不够,对实验室教学重视不够;学员的自学条件差;老师不敢在课后或者课下给学员进行辅导,害怕被指责为犯方向错误,等等。^②更为荒唐的是,由于学员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同一个专业班级的学员往往迫不得已分开上课,即在同一个上课时间,有的学员补习中小学的知识,而有的学员在学习大学的知识。这种同级同专业同班学员分班上课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因材施教”,是分裂工农兵学员,提出“还我战友”。有的学员反映,教学只能吃“份饭”,有吃不了的,有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只好去找“野草”,弄不好还得“中毒”。机床厂的学员提出:“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也不让一个阶级弟兄停步不前。”^③这也不过是口号而已。可以想像,即使同一个班级所有学员都上同一门专业课,学员在学习上的差异更显著,后果更难堪。另外,外语课学员是可以免修的,不少学员没有学过外语,连外语字母都不认得;还有许多学员不具备起码的外语拼写、阅读和语法知识,这使得外语教师无法给他们开课。很多学员事后非常后悔,在清华期间没有学习外语或者学好外语。

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出国人数总共为 500 人次,其中只有一人赴法国短期进修,其余都是短暂访问。清华大学在这 5 年里没有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清华大学在这 5 年里不但没有学习世界先进的大学教育,反而扩大了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教学和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要询问的是,难道“教育革命”需要的正是远远低于大学水平的东西吗?对此,邓小平作出了非常中肯的定位。1970 年 8 月 9 日,在有 100 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清华一位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四四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四四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③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四四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学课程半年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他插话说,那就应当称为清华中学、清华小学。^①“教育革命”使得清华大学蜕变为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这是“教育革命”的“平均奇迹”,还是“教育革命”的蒙昧标记?

清华大学文革中历届招生人数 ^②

年招度	入学年月	招生人数	其招招招招招中	
			普通班	进修班
1966年	1966年 愿月	1000	1000	1000
1967年	1967年 缘月	1000	1000	1000
1968年	1968年 怨月	1000	1000	1000
1969年	1969年 怨月	1000	1000	1000
1970年	1970年 愿月	1000	1000	1000
1971年	1971年 愿月	1000	1000	1000
总招招计		10000	10000	10000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及进修生的人数,居于全国各大学之首。1966年,清华和北大率先在全国招生,为全国其他大学招生提供经验。1967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开始逐渐恢复招生,而这一年清华没有招生。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他们的学习质量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文革之际,就有对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学习水平的很多指责和讽刺,例如:“你们初中毕业,念了三年半,就叫大学生?最多是个中专生”,“(每月工资)100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00元就是工农兵大学生”。^③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下达规定,把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定为大专。这就意味着“教育革命”所“培养”出来的大学学员没有达到大学本科程度。同时,这还意味着文革不仅没有使大学教育达到本科水平,而且根本谈不上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尽管清华 1968年出现过以数十名留校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三个研究班(固体物理、激光、化学),但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完全陷入停滞状态。文革给清华在内的全国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留下了 10年之久的空白。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档案卷号 1000,《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②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00页。


^③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1966—1976)》(讨论稿),100页。



其次，“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


“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做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后门”上大学的现象，即一些学员通过职位关系或利用特权关系，不正当地获取上大学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个别班级高达约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对此，中共中央年缘月员日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毛泽东批示“同意”发布此通知。该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招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①上大学“走后门”的现象实际上一直没有杜绝。年底至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初期，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亲自干预，使得试图纠正关系到全国数百万人上大学、参军、招工等“走后门”的做法中途夭折，不了了之。其实，据后来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本人也直接把自己身边的有关人员送进了北京大学。^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后门’也使‘文化大革命’自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如此史无前例的‘斗私批修’和灵魂净化之后，人们却变得如此‘自私’和言行不一……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③不仅如此，“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似乎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思想“遗传”，它根本不可能把反对和抵制在上大学问题上的封建特权置于最起码的议程上。因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近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不管“教育革命”有多么外在的辉煌、表面的激进，都无法掩盖它的黑暗和反动。

清华“教育革命”与整个文革“教育革命”一样，由于试图为了建设文革的理想社会而塑造“新人”，由于以异常偏激的教育举措来试图纠正文革前教育的某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档案卷号 ，《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②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校”往事》，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③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页。

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更由于以极端激进、富有空想的教育实践来试图建立“教育乌托邦”,所以具有至今都没有销声匿迹的某些迷惑、诱惑直至蛊惑的特色。

这里,从清华大学1958年制定的“教育革命”长远规划初稿中就可窥见一斑。这个规划提出在未来几年里,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提出逐步实现教育经费自给以及粮食、副食自给,“不要国家一分钱”,办学方式有:普通班、短训班、业余大学、分校教育、函授及电视教育,争取每年通过短训班及业余大学培养 1 万学员;加强普通班的改革,普通班要认真落实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半工半读,积极进行专业改革;力求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改变重尖端轻一般、重理论轻实际、重设计轻工艺等现象,改变各种专业之间分等级的做法,不断缩小和取消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和取消专业分散的现象,既面向工业,也要为农业服务;培养清华内的工人,使他们半工半读,在若干年内达到或接近大学水平;要扩大教师的工农成分,力争在 1962 年使工农成分的教师占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 1 万左右的教师既能讲政治课又能讲业务课,同时使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学员一起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教师在五年内应累计有一年以上的劳动时间,“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在一个工种顶班劳动。”^①更有甚者,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华有关写作班子在论及在教育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些文章中,把“教育革命”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就应当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同时还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手段”。因而,结论就是“教育单位同生产单位的分离,是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灭”,“至于大学消亡的问题,到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完全做到了‘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独立于生产单位之外的教育单位——大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那是将来的事”,尽管现今大学还是要办的。^②

“教育革命”真可谓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也同样是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破产。“教育革命”以形式上的消除不平均而带来了事实上的绝对不平均,以名义上的革命而带来了实际上的连续不断的人身迫害

^①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案卷号 苑四四),《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②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圆,目录号 政,案卷号 四四),《政治部 有关论因循守旧、翻开历史论教育、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以及进一步深入批邓中做好政治工作等意见》。

及冤假错案,使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使学校沦为政治的“角斗场”,全盘钝化甚至取消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和粗陋,等等,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 摇徐友渔

最近 100 多年,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两次形成势头:一次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著称;第二次发生于 20 世纪刚开始,1919 年达到一个高潮。可以说,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值得注意的思潮之一。

1919 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保守主义思潮在 1919 年特别活跃,特别引人注目。有人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因而叫作“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哪三件大事呢?

一是蒋庆提出“读经”的口号。围绕这个口号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有人称为“读经大讨论”,还有人叫作“蒋庆读经运动”。他编撰的 1 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在 1919 年出版,1919 年夏,在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有报道说,截至 1919 年底,中国已有 100 万个家庭,100 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

二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怨月 缘日,“1919 年文化高峰论坛”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著名学者许嘉璐、杨振宁、季羨林、任继愈和王蒙发起,由 苑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这个宣言表达的主张是: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认为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宣言是各种意见的折中产物,力图显得全面,但很多人认为它的实质是想弘扬国粹。

三是《原道》创刊十周年，并举办座谈会。陈明从1999年起主编《原道》，以弘扬中国文化和提倡文化保守主义为己任，《原道》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2009年源月初，陈明赴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批评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刘泽华认为中国古代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陈明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讲演引起强烈争议，论战发展到了网上。

其实，还有第四件事值得一提。2009年夏，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这次会讲也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会后，陈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也应成为中国今后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而蒋庆说，他们最大的诉求便是政府能够认同他们所倡导的儒家价值观，并且能够予以行政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他们是想要把孔孟的所谓“王道”运用于今日中国；第二，他们盼望并谋求官方采纳、支持他们的复古运动，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不但有文化含义，而且有更多的含义。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学者拉在一起，可能有壮大声势和搞统一战线的意图。

我个人经历中所遭遇的“保守主义”概念

就像“自由主义”等概念一样，“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长期遭到扭曲，现在要认真地讨论它，需要作一番梳理和澄清。我不知道同学们理解的准确性或者曲解的程度如何，我想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曾是怎样被理解和使用的。

我最早接触“保守主义”这个词大约是在1958年，那时是“大跃进”时期。报纸上每天都是“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知道反对保守主义发生得还要早。在1955年，毛泽东号召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把主张按部就班的人称为“保守派”，挖苦他们是“小脚女人”。

后来从报纸上知道英国有个政党叫保守党，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保守等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一个政党怎么可以把自己称为保守党呢？这等于说自己是反动派啊。教科书确实是这样使用“保守”一词的，比如历史书上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保皇派的斗争，讲革命派内部不断有人从革命转向保守，从革命者变为革命对象。

又比如，书上说五四时期的辜鸿铭是保守派的典型，他居然主张三妻四妾合理，说就像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一样，是自然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说到黑格尔

时,说他的辩证法是革命的、结论是保守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又叫保皇派。那时最常用的“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所以造反是好的,保守是坏的。

应该指出,这是革命的话语系统中的理解和用法,在世界上不是这样,在海外的中文世界也不是这样。“革命”、“进步”、“激进”绝非天然是褒义词,有时甚至是贬义词,而“保守”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意味着不好,当一个人以“保守”自我标榜时,他往往指自己尊重传统、热爱家庭和社会。

保守主义的本来含义

“保守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词语,要正确理解它的含义,需要追根溯源,从西方的语境中、从学理上进行梳理。

保守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最大代表是英国的爱德蒙·伯克,他的著名著作是《法国革命论》。伯克在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时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

最近出了一本书,是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作者来自保守主义的故乡英国,他不但精通保守主义的历史和理念,而且积极参加保守主义的政治活动,所以他的说法是有一定权威性的。作者说,可以给保守主义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把它说成是一种保守的愿望。每个人都有保全可靠而亲近的事物的愿望,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认为个人从属于已经存在的、连续不断的社会秩序,人们永远都能感觉到某种持久不断的法则。正因为能从现在看到过去,从变化中看到恒常,保守主义者不会批判现行秩序。当然,更反对以激烈手段改变现存秩序。

为什么要维护秩序?这涉及保守主义的公民社会观,它包含三个重要的、有内在价值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权威”,它指使人尊敬、服从甚至作出牺牲的能力或力量,是人们从内心认可的合法性,权威和权力有关,但不是赤裸裸的外在权力,而与天然的情感、爱、尊敬联系在一起,就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第二个概念是“忠诚”,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是首先把自己认同于更重要的东西,例如社会、集团、阶级、国家或民族的一分子,从政治上来说,忠诚的纽带是超越个人的价值,某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个概念是“传统”,这对保守主义的社会天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终极概念,它包括形形色色的习俗、礼仪以及制度化生活的参与方式,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展现出来的,传统必须具备成功的历史,能够博得参与者的忠诚,必须指向某种持久的事物。

保守主义还有以下内容和特点。

极度重视对个人财产的尊重保护,甚至有人认为财产权是个人权利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下于个人自由,财产权和生命权唇齿相依。

崇尚经验,对理性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有人自以为凭借理性认识到了宇宙进化的终极目的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就有理由引领甚至强迫人们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

崇尚国家,鄙视民主,尊重宗教,重视教会的作用;蔑视群众,甚至讨厌知识分子。

按照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这本书的解释,保守主义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最大敌人是自由主义。分歧主要是:它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观,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谎言,根本没有历史和经验方面的根据。

对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和解释。1988年出版的刘军宁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同一种思潮。他的例证主要是爱德蒙·伯克。爱德蒙·伯克既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不反对自由,因为这场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恰恰相反,是剥夺自由,是专制,他对待美国革命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他是最早、最坚定地支持美国革命的。刘军宁的基本定义是:所谓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这个定义对英国很合适,因为英国有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但用到中国就有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国也有自由的传统。不过,我在此无意评价哪一种观点更正确。

20世纪 80年代关于保守和激进的争论

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外学者余英时于 198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 8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它在 8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思想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在大陆,长期以来“激进”的含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含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好坏分明,不存在疑问。如果不是从海外引入新的思想维度,造成新鲜感和刺激,可能大陆学人不会那么早就对激进和保守进行反思与争论。

余英时在讲演中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他认为,虽然思想激进化在“文革”达到了顶点,但激进化过程并未结束,“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个性解放的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

林岗在《二十一世纪》1995年 9月号上发表文章《激进主义在中国》,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压倒性的主流思潮,首先出现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然后迅速地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又反过来加强文化激进主义。这两种主义的推波助澜,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激进传统。

陈来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绝天下的历史”。陈来像余英时一样,感慨“文革”虽然结束,但文化激进主义居然并未消失。知识分子借助于批判儒家学说来表达他们的民主理念,科学主义大行其道,1980年代的“文化热”表现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惊人的相似性。

姜义华在《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中认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和余英时相反,认为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

余英时在回应中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他指的是思想史上的激进现象,而姜谈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他认为,姜义华的最大问题是完全看不到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其在1989年之后造成的灾难没有感觉。至于“文革”,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激进理论在当时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传统成分就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更何况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和天才论来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将之归为中国的“封建余毒”是说不过去的。

《二十一世纪》在其后刊登多篇文章,继续讨论激进与保守问题。汪荣祖认为激进与保守难以一概而论,余英时和姜义华描述的现象同时存在,“自戊戌而辛亥而五四,激进的浪潮确实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在惊涛骇浪之间,社会保守势力稳坐钓鱼船……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他还认为,改革是保守和激进革命之间最好、最有希望的道路。许纪霖主张,谈论激进与保守,应区分文化和政治这两个不同层面,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0世纪中国的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以渐进社会工程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弱了。李良玉说:“我们不必把中国近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看得过于可怕。他们远非任何情况下都成生死对头。”知识分子有责任防止这两种主义极端化,使其形成互相制衡、互为补正的良性关系。

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认同。在19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

王元化说：“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了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

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李泽厚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这又引起一场争论，他的本意是维护现状，但为了理论上逻辑的一贯性，他要否定革命的、激进的传统。

李泽厚、王元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属于著名的“新启蒙派”，他们的思想转向很能说明知识界方向和风气的转变。

80 年代保守主义在文化上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国学热”，鼓吹中国传统的优越性可以挽救人类文明。和 80 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全力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思想文化倾向相反，80 年代初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倾向。人们把这样的思潮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0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季羨林在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

季羨林等人的主要根据是，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季羨林在《东方》上发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

季羨林的观点受到了批驳，批评者认为，要把“天人合一”观说成是当代的生态哲学非常勉为其难，认为只能靠中国传统思想解救人类危机纯属一厢情愿。

80 年代的保守主义红火了一阵就消沉了，因为有人以政治正统的面目出现，大扣其帽子，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倡导者有意识形态的不良动机，想用传统思想取代正宗。这一下子就把人吓住了。但总有人是吓不住的，而且一种思潮的出现

往往有比较深刻的原因,只靠扣帽子不能真正压住,所以过几年又冒出来了。

关于“读经运动”的争论

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说:“既然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那么,复兴中国文化就自然成了复兴儒家经典。而要复兴儒家经典,第一步就只能读经,而读经的第一步又只能是少儿读经。所以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或者说第一步。”至于读经的方法,则是绝对盲从,与古代完全一样:“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題,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读经运动”引起强烈反响,薛涌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中说,这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是“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被视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青年学者则支持读经,王怡在《“读经”和文化保守》中说:“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今天属于你,昨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吴小龙在《谈读经和读经运动》中写道:“‘中华文化之复兴’是个大题目,做好如此大题目,窃以为首先靠的应该是制度的安排,靠的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现代制度。在更大的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指望通过读经来‘收拾迷乱之人心,恢复民族文化之信心’,恐怕也就不对路,至少不够……今天的人心迷乱和道德沦丧,不是因为不读经,而是因为转型期制度安排中的许多重大缺失,以及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根本性的滞后。民族的道德和素质的现状,只是这更大的问题的一种反映。大问题不解决,提倡读经救世,跟过去的提倡读经救国一样,怕是不着边际的空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制度背景和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读经运动只会沦为—场闹剧。包括道德沦丧、民族自信丧失

之类的问题,读经是解决不了的。”

庞朴在回答“您对儿童读经的态度”时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倾向于儿童读经限于业余时间,以后再逐渐在教材中增加相关的内容。等时机成熟了,有了相应的教师以后,可以考虑专设为考试课程。我认为科学也有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分。中国科学因为有很多的人文因素,它不会去盲目扩张。”他还宣称:“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

李泽厚的态度是:“我不欣赏‘少儿读经’之类的笼统做法、提法,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尊孔’彻底分清。蒋庆甚至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张之洞、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统统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这里,李泽厚对五四的启蒙是肯定的。

蒋庆的政治保守主义

其实,对蒋庆来说,他的保守主义早已不仅是文化上的,而且有政治上的明确内涵。他认为当代新儒家把自己的抱负和学说局限于心性和个人修养是迷失了方向。他在《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中说:“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来化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丧失其本位性。要做到这一点,非政治儒学莫属!政治儒学正是站在中国政治文化本位性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问题的儒家外王之学。”

蒋庆的政治儒学即是“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

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差别，人的平等只能是心性上的平等，用西方文化（基督教）的话来说只能是上帝面前的平等……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不能把适用于超越界的绝对平等运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比如，一个 18 岁的无业青年同一个 38 岁的大学教授在智力、学识、社会经验和责任感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极而言之，一个 18 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被有些人认为是新世纪的权威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康晓光明确支持政治保守主义，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论证。他说：“我皈依儒家，确实是从现实问题入手的，而且我对儒家的选择和对民主的拒斥是并列的。如果有比儒家更好的，或者民主比儒家更好，我就不需要这个力了，我们都可以睡大觉的。但因为民主并不是万能的和正确的，所以我否定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走向儒家。有人说我搞这些东西，是为现存体制辩护的。”

袁伟时则对政治保守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须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所谓“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合流”

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等，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中道自由主义”的态度受到保守主义的欢迎，陈明说：“我很看重自由主义

我们的许多文科教授居然看不懂,或者感到十分新奇、大惊小怪。确实,大陆的人极少有人身上透露出儒雅之气和君子气象。作为文化修养,应该读经。现在学生花多少时间学外语、学计算机,古典文化的学习几乎为零,这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场讨论中,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否需要自己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谓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靠拢,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转向现代化时是彻底与自己的传统告别,全面拥抱西方文化,还是使传统与现代接榫,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很难设想,我们的现代化是文化上的彻底新生。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学者走向保守主义,心中就有这样的考虑。此外,他们还要考虑,就算自己可以做到在思想文化上彻底弃旧图新,那也是极少数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亿万人和整个社会摆脱传统,那么这些极少数的人难道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习惯和惰性?难道不应该告诉人们,迎接现代化、自由、民主的价值,不是抛弃和斩断传统,而是让传统和现代对接,是对传统的维护和创造性转化?他们的苦衷值得同情地理解,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很深刻的难题。

当然,他们的对接、转化工作也有不少难题。中国传统文化要与现代的自由、民主价值接得上是有个前提的,即传统中必须含有重要的元素,与这些价值一致或相近。这就涉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评价。如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体现了自由民主思想,那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有些朋友其实也未见得相信中国传统就是那么美好,但他们模仿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路子,在论证和鼓励人们接受、追求现代民主价值时,引几句经书上的话,然后说:“你们看,这不是外来的异端邪说,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有!”用心良苦,但学理上好像不太认真、严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专制的东西、等级森严的东西比比皆是,与民主自由接近的东西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极其稀少。如果我们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是什么,那么李泽厚的说法我认为是对的,他说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这也是从鲁迅、胡适到当代的顾准、李慎之给予的回答。所以我的结论是,要谈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恐怕传统中可资利用的东西少,需要批判、改造的东西多。

最后我还想说,蒋庆的政治儒学有一种意义。他要强行“开出”,这就把新儒家的路线推到极端,推到了它的逻辑终点,把它的错误和不可行暴露得清清楚楚。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现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为己任,但他们大多认可现代自由民主的价值。而自五四以来,人们一向认为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新儒家阵营内思路也不一样,提出了不同的对应方案。一种思路认为,就制度安排而言,中国旧传统已经没有价值了,但在个人伦理方面它还有价值,有西方现代价值所不及的东西,所以儒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另一种思路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发掘、打捞出与自由民主一致的因素,如果大力发扬这些东

西 ,抑制、改造与此相反的东西 ,就可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两种思路都有困难。要说传统中有多少重要的因素与自由民主一致 ,需要曲意解释。如果避开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 ,把儒家学说的意义限于日常人伦 ,倒容易使人接受 ,但有人反对说 :儒家讲究的是“内圣开出外王” ,你只讲“内圣” ,不要“外王” ,就算不得儒学的复兴。蒋庆就是这种观点 ,他的第三种思路就是既有“内圣” ,也有“外王” ,主张孔孟学说既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安邦定国的指导原则。他的主张的优点是逻辑上能自圆其说 ,但致命的缺陷是 ,鼓吹这套复古复旧的东西 ,毫无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性 ,无异于痴人说梦。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大学人文”是一门公民常识课

■ 摇邢小群

156

大学人文「
第
源
辑」

登上大学的讲坛已经 30 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与老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关怀着人类的前途、中国的命运,共同追逐着思想文化界一波波新潮,为触摸每一朵新浪花而兴奋。90 年代中期,我离开讲坛,做了几年编辑工作。回到讲台时,已是 21 世纪的尾声。

重返讲台,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我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已经很少得到学生的共鸣,我跟学生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大。上专业课如此,上公共课也如此。是我老了还是学生太小?是代沟不可逾越还是世风不可抗拒?我困惑,我苦恼。我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滑铁卢?我甚至产生了提前退休的念头。

这时,《大学人文读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我决定在高校讲台上作最后的尝试,向校方申请再开一门新课——“大学人文”。如果还是不能与学生沟通,我就告别讲台。

一开始,我把这门课放在三年级。当时以为,高年级学生的理解力强一些,可能更好沟通。但我忽视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学生人文类选修课的学分,到高年级早已修满。所以开课时只有十几个学生报名。我校规定,报名不足 30 人的选修课不开。多亏系主任的支持,让中文系新生补报,这样才有了三十几个学生。否则,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以后,我就把这门课调整到一年级。至今为止,我开“大学人文”课已是第四轮。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一轮比一轮多。本学期报名的已有 150 人,小教室换成了大课堂。我又看到了热切的目光,听到了争论的声音。下课后,学生常常不愿意离去,总想与我继续探讨,我的疲惫感消失了。我重新感到课堂有了温度,我的思考终于得到了回应。

上学期的期末考查,我出了两道问答题,其中之一是“谈谈你对大学人文课意义的理解”。在答卷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曹珊珊同学说:“我选这门课本是抽签被涮的无奈之举,听后却发现它是目前选得最成功的一门课。大学人文课有利于引发我们独立思考,培养怀疑和批判的精神。通过15年的应试教育,我们的思维不可避免地有所僵化,答案唯一的阅卷方式使我们总倾向于相信课本,而忘记了历史很可能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文科学生,所受蒙蔽更甚。老师所说的‘要活得明白’这句宣言,使我们开始审视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大学人文’课还使我们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看待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自我实现’这一章,使我们明白了自我实现是一种美德,是马斯洛描述的最高需要层次。尤其是‘寄生型’和‘寄售型’精神残废人格,对女大学生更有警示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女生越来越倾向于回到贤妻良母的角色,愿意直面挑战的人越来越少,学历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婚姻交换的砝码而非自我实现的基石。怎样选择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也是由很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但自爱、人格独立却是始终应该坚持的精神。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身价值才能无悔今生。”

肖俊同学说:“身处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身处一个传统与道德不断被质疑的时代,身处一个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时代,大学生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在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天平间徘徊。社会主流意识在不确定的复杂波动中翻滚,迈进校门也好,走入社会也罢,迷茫总是笼罩在我们头顶。也许我们真的面临一个理想、信念的真空社会,在我们本应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年龄。‘大学人文’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因为它有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让我在混沌的精神状态下仍能得到一种警醒。坦白地说,它提供的知识有的印证、坚定了我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判断,有的填充了我的认识真空,更多的则与我许多的固有观念激烈地碰撞。当然它教会了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轻易否定,不盲目跟从。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不能算是精英教育,它的门槛儿在降低,它更需要一种人文的滋养,去抵消功利世俗与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陈霞同学说:“‘大学人文’这门课让我感触的一个词是‘真实’。真实地看世界,真实的感受。感谢‘大学人文’课,给了我第一次社会调查的机会,平淡而珍贵。我们调查了敬老院,看到了老人们的生活,看到了暮年的‘人之为人’,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大学人文’课让我看到了真实,纪录片《天堂花园》让我心灵震颤,电影《双城记》则是让我对民主与宪政更有感触——‘民主其实是一种信念,一个人对于民主应该充满敬意,对于政府来说,则要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要对它有一种纯真的感情’。这句话讲得极好,这是宪政和民主对我们的要求。社会在演进,一切在变革,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而去狂热追求革命,尽管它有着疾风暴雨的力量。总之,‘大学人文’给了我一双真实的

眼睛,我将用这双真实的眼睛看清事物、寻到智慧,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有了这双眼睛,心灵永远敞亮。大学人文——一段真实而美丽、沉重而忧伤、欣喜而沉默的心路之旅。”

褚鹏宇同学说:“选‘大学人文’课,是因为中间‘人文’二字。我想:‘人文’的东西应该是最有底蕴的,因为它往往经过了历史的沧桑,沉积了文明的点滴。出乎意料的是,老师第一堂课就大胆讲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内容,似乎与以前知道的大不相同。怀着一股好奇心,我继续保留了这一选修课。现在,我觉得这一门课,犹如推开了一扇从未推开过的窗户,使我呼吸到了一股从未呼吸过的空气,感触很多。在许多方面,‘大学人文’课都讲述了正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使我受益匪浅,它影响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大学人文’课让我体会到中国若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民主自由才是公民生活安宁和谐的最终来源。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也许要几代人努力,但如果需要,我愿意随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奉献自己的青春。”

姜冰洁同学说:“对‘环境’一章的学习,我感触颇深,也真正明白了学习‘大学人文’、培养‘人文精神’、树立一种人文关怀和情感的真正意义。此章的学习,是以观看《可可西里》这部电影的方式进行。来自北京的记者深入可可西里的全程记述,让我看到许多血淋淋的现实,感受到中国当前环境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大量藏羚羊被宰杀,保护区队员的牺牲,犯罪分子的残忍,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景,发人深省。也许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但更多的思考是不可以停止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沙起额济娜》正是反映了我的家乡的情况,这一期节目的播出,也让我感到十分羞耻与痛心。”

黄晶同学说:“有精神追求会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和快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成功的成就感。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必要的品德和意志去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胸怀大志却一事无成,有多少人出类拔萃结果却惨遭失败,因为他们自己存在一些人格或品德上的缺陷,如骄傲、虚荣、自满、嫉妒……有时,一种品德的不足会使我们整个人生功亏一篑。因此,在人生的历程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品质,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使自我实现得到根本保障。”

二

其实,我上这门课,一开始也感到力不从心。这门课远远地超出了我原有的知识储备。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而这门课很少涉及文学,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心理、伦理、教育、环境等学科的知识。一门课跨这么多一

级学科,可以说前所未有的。

后来我想,这门课虽然涉及的领域很宽,每个专题几乎就是一个学科,却不一定都要进行专门的学理探讨。这些专题大多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不是要人远离生活,而是力图使人回到常识。“大学人文”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表达,实际上是一门公民常识课。

己故学者李慎之先生有一篇文章《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他还说:“獯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公民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他还说,他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可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 遯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点东西。他还表示,如果有下一辈子,最大的志愿是当一个公民教员。他的话给我触动很大。

大学生已往的教育内容中,公民常识是缺失的,自己当教师,未尝不同样存在缺失。年轻人面对这些领域大多是一脸茫然,自己面对这些领域何尝不感到陌生?所以,我的态度是与学生面对常识,共同探讨,交流对话,老师仅仅是破题者。因此,每讲一章,我并不追求学理的深奥,而是尽可能寻找实例,吸引学生进入问题。

比如讲“大学精神”,我放了凤凰卫视拍摄的《水木清华九十年》上集,让学生看到,中国的现代大学,起点本来是很高的,在梅贻琦时代就已经做到了向世界看齐。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我们现在虽不能至,但可以心向往之。

讲“青春、性爱”,则以重庆某校开除一对怀孕的大学生引起的司法诉讼为例,引导学生讨论两性关系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讲“自我实现”,围绕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探讨生命如何活出意义,赚大钱、当大官是否意味着自我实现。

讲“知识分子”,就放影片《左拉传》,通过德雷福斯案,和学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两个特征:公共性和批判性。

讲“民主、宪政”,关键就是两句话: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如何对待少数人。“宪政”是依宪治国,保障民权,限制政府。

讲“历史记忆”,我放了凤凰卫视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片《西路军军魂》,让同学们意识到,我们接触到的教科书,远远谈不上历史的全貌,还有许多真相被遮蔽着,需要我们怀疑、追寻,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讲“革命”,我放映了影片《双城记》,让学生反思革命是否一定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建立新制度是否可以有不同的途径。

讲“环境”,我放映影片《可可西里》,让学生体会保护环境的艰难在于一部分人的利欲熏心。

影视的优势是真切可感,可以使课堂进入情境。从感性的形象进入理性的思考,比单纯的讲解和照本宣科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一门选修课,只有三十几个学时。想通过这门课,完成学生的公民教育,是不可能的。我只想通过这门课打开一个窗口,引起价值层面的思考和人文方面的渴求,引起大学生对公民社会的向往。或许,公民意识可以从这里起步。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学科内涵与工作分类

——出席“华东地区高校文化
素质教育研讨会”感言

■ 摇周建忠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的十年回顾与总结。热点是“大学人文”——不仅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热销的“大学人文”系列，而且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的《大学新语文》。“大学人文”系列的特点是“冲淡知识性，舍弃工具性，凸现价值性”，《大学新语文》的选文方针是“现代人文，经典诗文”，读后使人感到：《大学语文》还可以这样来编，“大学人文”理念还可以通过“大学语文”教材这样一个基本定型的载体来体现、来实现。

《大学新语文》不是着眼于“教师”的教，而是以学生为中心，本质上是提供了一个新读本，编者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开设，使大学课堂大面积激活“元阅读”，达到全新的理性冲击及感悟。——这样一些全新的理念与课程观，不仅对传统的“大学语文”是一个“冲击”与“改造”，而且涉及一系列学科内涵与工作分类问题。

《光明日报》报道《大学人文读本》时曾用了“人文教育：直面大学生‘精神成人’”这样的标题，点出了“大学人文”的主题词。该书主编曾说：“《大学人文读本》汇集了思想者们从生命体验出发所获得的人生感悟，让当下的大学生读一下，看看他们是否能被感动。假如他们也被感动了，那么我相信，那些普适性的文化价值将由此进入孩子们的精神生活。”

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说，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做人”的教育又分为三个层面：第一，行为层面——侧重礼仪；第二，趣味层面——侧重情调；第三，精神层面——侧重心灵。“大学人文”就体现在精神层面，而人文的

内涵就是为了帮助大学生“精神成人”，内化为“德性”。对此我想谈两点感想。

关于学科、学理问题

第一，“社会科学”。

就科学范畴来说，“文革”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院”，其中有“社会学学部”、“工程学部”，~~1978~~世纪~~1978~~年代后，“社会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程学部”独立为“中国工程院”。有人指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就是说，“科教兴国”的“科”字，既指自然科学，也指社会科学。各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就采用了这一概念。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

有人强调，自然科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标志。

国家、省分别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但在内涵与外延上还是有所区别，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就涵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艺术、教育、军事。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巴黎，它采用了法国的分类方法，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是指传统的文史哲，往往从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篇文章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无法用经济价值衡量。

资中筠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人文学科研究的结果不是出政府官员，出老板，而是出精品，出大儒。

而“社会科学”，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等，旨在紧密联系现实，所以有“智囊团”、“思想库”等提法。

教育部设立了“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就采用了这一概念。

~~1999~~年秋季实行的高中“新课标”，将原来的“语文”、“英语”合为“语言与文学”，将原来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合为“人文与社会”；“数学”名称保留，将原来的“物理”、“化学”、“地理”合为“科学”；将原来的“体育”改为“体育与健康”，将原来的“音乐”、“美术”合为“艺术”；增设了“技术”，包括“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这一分类显然体现了一种学科学理建设的走向。

相对于“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的“自然科学”，在概念上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还设立了五大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教务处、团委 科技创新、科技制作、科技竞赛、科技活动又涉及科技处。由于工作有所交叉、叠合,就可能出现人人皆管而人人皆不管的现象,于是各校也先后成立专门的机构,如“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或归属教务处,或归属学工处。

显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涉及多种因素:思政工作、教学工作、学生活动、学术研究乃至商品行为。有时商品行为会获得合法的渠道而抢占学校市场、学生市场,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在分工上,我们可以模糊、抽象一些,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且资源共享,密切配合。但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必须具有素质上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从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教育者,自身须有较高的人格境界与文化素质。

第一,必须坚持教育的底线。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调剂、协调教育领域的基本矛盾:一是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二是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与个性差异之间的矛盾,三是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四是教师本位与学生本位之间的矛盾。文化素质教育不仅强调社会需求,还必须高度重视个性发展与个性差异,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不得偏执一隅。

第二,必须坚持工作的底线。课堂教学对教师而言,不只是为学生成长所作出的努力,不只是领导交付任务的完成,它同时应该是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和自身发展的组成。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项事业。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教授多尔说: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开放的课程观,不仅通过科学性而且通过故事的描述性和精神的超越性来思考关于生活的深层问题。

第三,必须坚持人格的底线。人性由四种基本属性构成:一是物质性,指物欲、利欲、性爱等与生俱来的习性;二是竞争性,往往指一些趋利避害的习性,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本位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这些方面往往为人们所自然接受;三是合作性,主要指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观念,这些需要后天环境的熏陶与逐步教育;四是意识性,也就是理性,理性的增强,使生物的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群体升华为人的以文明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

事实证明,人性层面越高的,越要靠后天努力、不懈努力去提升、强化教育。重复教育是不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受到抵制或对抗,但效果可能就在重复与抵抗中完成。

柏拉图说:“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我向往这样的境界,并愿为之努力。

(作者:南通大学教授)

与母亲谈林昭

■ 摇唐 摇罄

166

大学人文「
第源辑」

让我去采访崔卫平(我的母亲),这多少有点意外。在这之前,我只是模糊听到一点林昭的故事,除五分钱子弹费外,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忍受着怎样的非人折磨,以及在这过程中她的思想又如何发展等,我并不清楚。这次为了采访匆匆读过几篇文章,才逐渐有了一点轮廓。从对权威的盲信到后来连呼“受骗”,从在粗辫子上系着白色蝴蝶结到头顶一方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的白布,林昭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一点点成形。在了解她的过程中,她前后几乎矛盾的形象又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这种不断变化中有什么东西是一直没变的?她吸引或感动后人的那种坦然与率真的基础是什么?她为什么会被称作英雄,或者更独特一些的——被称作一个“圣女”?带着这些疑问,我决定和母亲探讨,到底是什么一直充盈着她的身体,且让她如此地誓死捍卫。

唐:关于林昭,你写过一篇《传唱英雄的故事》的文章。“英雄”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崔:按照古希腊的解释,英雄是指这么一类人:说了一番伟词,干了一番惊天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他们“开天辟地”,像神话或史诗中传唱的那样开创了某个业绩,使得后人都生活在他们开创的业绩中。那些人都像是巨人。这是有关英雄的基本含义。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历史中,这样的业绩通常是由男人完成的。男人体格健壮,意志坚强,能忍受长途跋涉和泥泞,比如远征到欧洲的成吉思汗被认为是蒙古的英雄。

唐:这些事显然不是女人所能做的。但你在文中又说:“在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数得出来的女英雄有秋瑾、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林昭是她们并肩的姐妹。”“女英雄”这个词又是什么含义?

崔：“女英雄”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我们能想起来的女英雄，比如法国的圣女贞德。贞德的业绩首先是率领国人打仗，她曾率领上万法国军队去抗击英国人，这确实不是一般人所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有花木兰，不过她的事很少被传下来，我们只知道她替父从军，不知道她还做过些什么，有没有做过一些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至于张志新她们这批英雄，其共同特点在于，她们用思考来面对现实，是自己独立地、不人云亦云地进行思考。在人们众口一词，仿佛都一律倒向谬误的时候，她们能坚持自己看到的真理，而且把这种真理和自己的血肉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唐：在她们当中，人们又特别将林昭称为“圣女”。你是怎么理解“圣女”的？

崔：首先我想到了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少有的女英雄，她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这并不是因为她做的事，而是因为她认为有天使在她耳边说她就是上帝选中的那个人，是上帝让她这么做的。她不通过教会把自己直接和上帝联系起来，她认为自己的精神是和上帝直接沟通的，从她的精神出发才产生了她那些率军打仗的行为。因此教会要处置她的灵魂，对她独立的灵魂作出惩罚。这也是人们后来把她封为圣女的原因。她身上有两个东西，一是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二是她独立的灵魂和精神。

林昭和她的不同之处是，林昭没什么耀眼的外部行为。但林昭有一颗独立的头脑。在当时高度的精神压制和言论压制的环境中，独立的头脑就是她此后一系列行为的开端，当然这个行为不是说开创世界的行为，而是和专制力量作斗争、经历磨难、经历痛苦的行为，她的灵魂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开始她只是帮朋友说话，后来被打成“右派”，她是被甩出日常轨道后才看清了更多东西并逐渐觉悟的。实际上她后来和朋友合办《星火》杂志才是她更大灾难的原因。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份志同道合的杂志，写诗，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何罪之有？林昭就认为在这点上自己一点儿没有错，不能退。一般来说，对与错是我们能够分辨的，我们缺少的是为自己坚持的真理付出精力和勇气。在她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林昭显示了常人不具有的勇气，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磨难，用青春的血写下了她对真理的热爱和对黑暗的谴责。因为她对真理忠贞不渝，所以我称她为“圣女”。

唐：你刚才说人们能够分辨对与错，那么，那个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呢？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很可能在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封闭或者信息的误导，人们很有可能对事情作出错误的判断。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除了认识层面，还有一些生存的问题，如生存的恐惧。出于

生存的恐惧,或者某些利益的诱使,某个人不能公开地表达他对某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收子弹费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而大多数的情况是由于某种环境原因,人在良心方面变得很麻木,很迟钝;人们习惯性地躲避自己,习惯性地不动脑筋,习惯性地不去接近自己的良心,使得人的“心灵感知”这一块被切除了。当他给对方施加痛苦时,他对这种感知所导致的结果的想像力一点儿也没有。也许,这个收子弹费的人无法感知到他的行为会让一个母亲晕倒过去。但这个细节主要表明当时那种制度的野蛮,不是这个人的问题。

唐:林昭是一个个人,收子弹费的也是一个个人,他也应该拥有与林昭一样独立的判断能力啊。

崔:你想,假如人在日常生活里每天做一点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免习惯性地按照别人给他安排的轨道走去,而不再去拷问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他没有想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出发点,他要什么,他想要过哪一种生活,他的生命应该怎样打开,哪些东西是他独特的,哪些东西是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他没有体验过生命的力量,没有体验过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需要自己给自己作出交代的那种责任感。林昭是独立的,有个人的灵魂,而这个收子弹费的人却只是一个机器的工具。

现在的环境不像当时那么极端,但人们依旧随时随地干一些不大不小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似乎成了一种不加思考的习惯性的行为。比如我在电影学院教“艺术概论”,有些学生不喜欢这门课,我认为他们不来上课是可以理解的,来考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考试前琢磨我的意图,结果个个都考80分以上,我就很难理解了。你可以考100分嘛,那70分完全可以不要,这属于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撒谎。有些撒谎是有理由的,有些撒谎是没有理由的,这种说谎就是一种习惯性行为。

唐: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英雄是做一些常人不能做的事的人,那么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英雄不需要跟别人打仗,他们更多是跟自己打仗,是跟自己的愚昧无知进行斗争。

崔:你这样说很有道理,但是你说的与自己打仗,在我看来,也是在与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斗争。认同你的愚蠢行为、支配你的愚蠢行为的,仍然是某种大于个人、高于个人的社会力量。

唐:林昭之所以能一直坚持这么做,是不是和她的基督教徒身份有关系?

崔:即使是基督徒,把自己交给信仰也是一种过程。信仰给了她支撑的力量,忍受痛苦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毅力,但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来,她并不是为信仰而斗争,她为之斗争的是她所认定的东西,即人应当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说话

的,不能歪曲事实,她是坚信人的基本良知,而基督教的信仰加强了她的力量。在这点上林昭给良知加冕,赋予了人类良知以荣耀。她之所以令我们感动,正是因为她触动了我们的良知,使我们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良心的。

唐:但是似乎我们很多人只是在读林昭的故事的这一瞬间良知得到了唤醒,一旦背过身去又去做一些不大不小违背意愿的事情。我们似乎只会在大问题上奉献我们的良知,可回到日常生活,良知就又睡着了。

崔:良知不止在大是大非或有关国家、历史等问题上才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表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它真实的样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把它说出来?包括某句话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怎么更有分寸地来说,都是衡量的问题,尺度的问题。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衡量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唐:也就是说,良知作为一种普遍尺度,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崔:对。比如人们说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这都说明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这又说明她是很自爱的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出矫揉造作之气,她是一种天然质朴的美,并且一贯如此。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唐:并不是只有英雄才能这样做吧?

崔:当然。我们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让自己当英雄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并且谁也不能苛求每个人付出非凡的勇气或精力,但我们有权也有义务拥有一个比较结实的,不那么前后不一、不那么漏洞百出、不那么互相矛盾的人生。这是林昭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迪。

因为要吃午饭,与母亲的讨论只好到此中止。尽管时间很短,但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已经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是的,林昭那静穆的高贵是任何人都能在她的故事中感受到的,她透明的良知是任何人都能为之感到震撼的,她用自己的

生命发起的对专制的责难是任何人都会有共鸣的。但如果仅仅在此停留,那么,林昭的死就仅仅变成了一种对于历史的反省和为了后人的教训而作出的牺牲,变成了一座高高悬挂的明灯,而这种明灯只有在我们想打开开关的时候才会发光。不,她不仅是在质问和敲打那个扭曲的时代,更是在质问和敲打造成那个社会的所有人,以及现在像我们这样阅读她的所有人。她激起的不应该仅仅是对专制统治的怒气或对她逝去的惋惜,还有我们以她为镜所作的自我反省。更关键的是,这种反省并不是一时兴起,不是在一种激昂情绪中所产生的冲动,而是即使背对着她时,也能一直保持的清醒。

关于林昭的感慨已经太多,我只想再补充一句,不要愤慨那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良知始终明亮,那么,我们自己也可能沦为那个收五分钱子弹费的人,甚至在良知的忽明忽暗中,比那个人还要可笑可悲。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 四年级学生)

美摇丽摇的摇心

■ 摇萨林娜

一个人可以显得很渊博。当他谈歌德、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时,他可以滔滔不绝,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读过好多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读的是外国名著缩写本,或者是精读本什么的,而且他也知道,当初促使他读这些书的动机就是要在今天卖弄。

可事实上,他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这些所谓的精读本,缩写本,实在是最无耻的文学杀手。它杀死一个个有血有肉、哭着笑着的人,它使鲜花变成标本,使少女变成木乃伊。阅读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为何把它变成如此功利性的差事?他再也不能随着那善感的作者,进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之中,他再不能与哀哭的同哭,与欢笑的同笑了;他再不会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辗转反侧了;他再不能陪着扑在地上痛哭的维特一起流泪了。他可以说:“是的,我知道维特后来为绿蒂自杀了。”其实对他来说,维特压根儿没活过。没有一颗爱慕文学之美的心,读得再多也是枉然。

一个人经过良好的训练可以很出色地演奏一些乐器。他可以在文艺晚会上以精湛的技巧博取四面掌声。可是,如果没有美的清泉从内心深处流动,如果每个音符是从指尖滑落而不是从心里涌出,那他只能算作一个高级技工。

一个人可以参加很多社团,参与很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他为此花掉大量的时间,也慷慨地捐献钱财。他在镜头前亲吻孤儿,又搂着临终老人拍照。可一转过头就嫌恶孤儿的口水,恶心老人身上的味道。呸!世界上再没有比这虚伪的爱更让人恶心!没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一切行动上的善良和同情都让人生厌。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那世界对他还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心呢?一颗美丽的心若是死去了,外表再充实再华丽也是给朽木镶金镀银;相反,人的心若是美丽的,不管他的外表多么软弱,低贱,笨拙,丑陋,

他也如同宝贝装在瓦器里，终有一天会显出尊贵和荣耀来。

有梦的人跟没有梦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梦的人大学毕业了，他说：“我的底线是月薪三千。”有梦的人说：“每天有十块钱吃饭就好。”岂知，一个人在物质上的底线越高，他坚守原则和梦想的底线可能就越低；他双手牢牢抓着三千月薪，就像被带了手铐，就像梦想的翅膀被黄金坠住；不愿舍弃的越多，放弃的和妥协的也就越多。相反那每天有十块钱就好的人，没什么能威胁到他，他随时可以舍弃现有的一切，就能专注地充满激情地追求梦想，就能坦然无惧地面对诱惑和威胁而不丧失原则，使良心得到安宁。由于随时可以舍弃，反而更加勇敢，执著，果断，勤勉。心中有梦，就可以转脸不看蝇头小利；心中有梦，就可以生活在别处。

或许有人会说：“我哪里有闲工夫管自己的心？我现在月薪还不够两千块。我还要买……还要做……等我……的时候，再考虑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结果，说这话的人一辈子都在庸庸碌碌中挣扎度过。诡诈的终在诡诈中，算计的终在算计中，争竞的终在争竞中。心思太缜密了，反结了网把自己套住；筹划太殷勤了，反而举步维艰。但那些心里清洁又简单的人，却什么好处都不缺。他们不会太在乎他人的目光和议论，他们由于心中对所做之事的热爱，就更加执著，更加专注，更加有激情，有灵感。因而，他们的成功和荣耀如同赠品一样接踵而至，虽然他们追求的不是这个，却附着着得到了。如同跳高运动员，两米都跳过去了，难道还跳不过一米吗？

整个世界都在说谎！如果你稍微停下来想想，如果你还有能力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如果你从轻浮、毛躁、大喊大叫的人群中退出几步冷眼看看，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说谎。媒体的工作是像吹气球一样刺激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并将各种欲望不断地正当化、美化，鼓励人们为了满足欲望可以堂而皇之地不择手段；大学也不再干净了，学生们各自算计着怎样学习、怎样表现、怎样考证最有利于将来获得权利，最有利于赚钱……人们鼓吹物质上的丰足就能使人的心满足快乐。他们说：“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发达了，精神文明就自然提高了。”他们说：“先赚钱，等有钱了，再谈什么理想，什么心灵，什么梦之类的东西。”多么荒谬啊！难道人——这宇宙之中最高贵的生灵，是没有灵魂的畜生吗？难道人在年轻时一切劳苦只是为了将来的汽车和别墅吗？物质只能满足肉体，只有真理才能满足心灵的渴求。使人活着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肉体是无益的。若一千块钱就能使人丰衣足食，人却花了一万，那剩下的九千就会败坏心灵。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能使人从里面腐烂。

我们“向外看”看得太多了，就会丧失自己。外面的世界堕落了！时候到了，我们该“向内看”和“向上看”了。“向内看”就是关注自己的心，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问问自己：“我的心麻木了吗？我还能付出无条件的爱吗？我的眼睛还能

为别人的痛苦流泪吗？看到花朵、清泉、朝霞……的时候，我还能像孩子一样快乐吗？”

“向上看”是要叫人懂得敬畏，是叫人在永恒和无限面前记住自己的短暂和有限，懂得谦卑，专心听真理的启示。

“你要保守你的心脏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是从心发出来的。”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团学四级学生）

在矛盾中负重前行

■ 姚瑶瑶

174

大学人文「
源
辑」

五一假日,我翻开自初中以来的日记本,欲从中觅取一些成长中心灵的痕迹。但还未读完初一时的那本,我的心头就仿佛被某种沉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六七年来,自以为不断成长、成熟、变化着的我,其实某些本质的东西早在少年时甚至可能是童年、幼年时就已扎下了根——在种种的矛盾纠葛中生存,宁愿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前行,不愿卸下些什么,而把沉重当作一种安慰。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矛盾在我眼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常常能够说出它们的名字,尽管多数时候我还是拿它们没办法。

在种种的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大概要数心气过高与心智局限这一对矛盾了。不知是书香之家赋予我的与生俱来的心气,还是成长中一贯的优秀助长了它,这颗心常常在天宇外飞翔。我渴望自己在各方面都变得卓越:我习过武,练过琴,恋上过文学,更迷上过物理;在其中任一方面,我都曾相信自己可能有天赋,且其中某些也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我踌躇的理想中,我就曾执著于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融文学才思、艺术灵感于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大师。然而,年年岁岁过去,现实牢牢地束缚住了它,至今我在其中任一方面都平平庸庸。其中有应试制度的戕害,因为我一贯要求自己拥有第一流的学习成绩。但很多时候,我又宁愿把这种平庸归因于心智的局限——我不是天才,而我心中的理想又往往要高出我的能力范围。每每想到这,我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有时想来,这是何苦?“人为动物,唯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然而这种性格,我却无力改变它,或许是一种宿命吧。

活得认真,这是我常感生命之沉重的一大理由。自打自我意识鲜明起,我就一直在构筑着属于自我的一套价值体系——它是我对世间的一切作出价值评判的标准,是我个人一切思想与行为的价值取向。我读到初一时写下的诗句“……

从来不想在弱者面前高高在上,也从来不想在强者面前缩头缩脑。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毫无矫饰的我,一个能让自己欣赏的我”,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欣喜与感动。原来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懂得了要用自己内心的标准来评判自己,要力求活得真实、坦荡,而非随波逐流。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现在,有时形成一股倔强的气质。尽管这种品质至今还有待考验,但它毕竟已较早地扎根于我的心田,融入我的血液。但与此同时另有一重矛盾,当我遇到新的人和事从而触发新的思考时,我心中的价值标准又不断地接受着我自己的拷问与责难。这种内心的冲撞时常令我心灵疲惫,我必须重新对许多问题加以思索与整合,从而巩固那松弛欲坠的价值大厦。尽管辛苦,这却是不得不做的工作。因为我必须把我的价值大厦建造得牢固,它是我在这世上存活下去的支柱。

这一贯以来的认真,使我总感到我在这世上的生活是孤独的。当然我有无比呵护我的家庭,有始终关爱我的师长、朋友,但很多内心里的东西只能是独自默默地去承受。因而长期以来,我喜爱独处胜于群居,我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看书、弹钢琴、想想问题、写写文章……总觉得,许多有分量的工作是必须在孤独中才能完成的。孤独是精神独立的保姆,寂寞是接近成功的良伴。如果说在我短暂的前 10 年中,我曾获得的令多数人仰视的学习成绩、曾达到的专业的钢琴水平、曾写出的那些被高中语文老师认为有深度有见地的文章等可称得上一种“成绩”的话,那么所有这些无不是在孤独中酿就的。更重要的是,在独处中,我年复一年地磨砺着一颗独立、坚强的内心。尽管大学的生活格局早已打破了这种自我的生存模式,但我始终没有忽视我的内心世界,这世上唯一能真正属于我的存在。在一个个十一点钟左右的深夜,我独自一人走在从自修教室回寝室的路上,我常常与我的内心展开对话,谈谈最近的生活感受,问问她的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讨论讨论我的未来该走向何方。

夏老师在“大学人文”课上常提到“自律”。关于我的“自律”,其源头也当在于我的内心了。记得中学老师曾说过,中国人缺少的就是“羞耻感”,而在西方,宗教就发挥了作用,当一名基督徒想做不道义的事时,他心中便会默念:上帝就在我的周围,他看着呢,这事是做不得的。当时我就想:何必需要上帝?“我”看着呢!难道这个“内我”的力量还不比上帝强大吗?她对自我思想行为的约束作用还比不上一个虚拟的上帝吗?这个“内我”一直伴随着我,清醒地活在我心的一隅。每当我哪怕仅产生不道义的念头时,这个“内我”的鞭笞便让我羞愧。我不得不活得谨慎。有时这种谨慎甚至有些过分,让我对某些事情束手无策,寸步难移(这又是一重矛盾)。

白发。年纪轻轻的我也有了白发。不是染的,是天生的,而且不止一根,大约有四五根吧。节假日的时候回到家,阿姨常会帮我理出、剪去,每次都有,生生不息。高中时写过一篇随笔,开头写道:“从前听到同学对我说‘你头上有一根白发’,我总感到难为情,想竭力把它遮掩住;但后来不了,我想自豪地告诉她:

‘白发 ,是我认真对待人生的写照!’我一直延续着这种心境。在我 24 岁的生命中 ,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我的道路在许多人看来应当是平平坦坦 ,甚至一帆风顺。然而 ,我心里明白 :我的每一步路都迈得很认真 ,我的日常的行为往往凝聚了我长期的思考。

中学时代我爱独自走在家附近的河边 ,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最爱那河边的野花 ,它那么小 ,只有一个指甲大 ,那么不引人注目 ,只默默地开放在小河边 ,但俯下身仔细观察它 ,它却是那么精致 ,淡紫色、粉红色 ,和谐的颜色 ,完整的结构——它是一朵‘花’ ,正如我 ,是茫茫人群、茫茫宇宙中如此渺小的一个个体。但我却是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人’ ,我有我的尊严 ,我完全可以把我的生命过得精致 ,过得完美。”过一种虽微小却精致的生活是我一贯的理想 ,哪怕在我最雄心壮志、意气风发之时 ,我也深深地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局限与渺小——“精致”是唯一一种负责的活法。

认真活着的人头上有几根白发应属正常 ,哪怕是青年人。我常常感到生命之重 ,在我翻开从前的日记时我感受得到它 ,在我夜夜从自修教室走回寝室的步伐里我感受得到它 ,在我时常产生的内心的冲突里我感受得到它……生命之重让我感到生命的分量、生命的质感 ,我宁愿背负着这沉重的行囊上路。我也曾试图减轻它 ,但毕竟“分量”让我心里感到安慰、踏实 ,若要从中卸下些什么 ,让生命轻飘飘起来 ,我反倒会无所适从。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 2004 级学生)

我应“变”成一个怎样的人

■ 摇傅迺嘉

我已年满 16 岁了。

对某些人来说,16岁正值青春之年。一个“已”字,似表明他完成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即将去闯荡社会,去成就伟业。但对我来说,那个“已”字,却表明我耗费了整整 16 个春秋,在探寻怎样做人,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我心中堪称“完美”的人。

从我呱呱坠地起,我就开始“变”了。当然,我不可能有婴儿时的记忆,只能从现在对其他婴儿的观察来推测当年情境:父母总喜欢用好吃的、好玩的来哄我,只要我不哭不闹,他们就格外高兴,而我也就能得到更多好吃的、好玩的。于是,我变乖了,变得听话了。

后来,我进了托儿所、幼儿园,我开始接触亲人之外的人:老师和小伙伴。我发现,只要听老师的话,就会受到老师的表扬,继而成为小伙伴羡慕的对象。当然,除了我,其他小伙伴也会听老师的话,这样就出现了“竞争”,比谁更听老师的话,更能按老师的要求做。在我印象中,有一件事特别深刻:那是在吃午饭时,老师要求我们吃得快,吃得干净。可那天我肚子不舒服,饭吃到一半,突然反胃,肚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吐进碗里。我看看左右,发现没人注意到我,我想,是否应该报告老师呢?犹豫过后,我作出了至今让我难以想像的举动:把碗里的东西再吃下去……

16岁,我背起书包,踏入校门。这时,我又发现老师是通过一个具体标准来决定他(她)对学生的喜欢程度——分数。而我的优势在于,我可以花比别人较少的时间来获得比别人高的分数(仅限于小学)。于是不难理解,我当了班长,后又当了少先队大队长。那时,我考语文、数学双满分,可谓家常便饭,而获得的各项荣誉也数不胜数,还经常和老师参加各类校外活动。我小学四年级时还当选为区优秀少先队员,有幸和一些老师、同学去西安考察(说旅游更贴切些),至今难忘。

然冒出一句自己平日未必想说却能真实体现自己心境的话。渐渐地,我发现要刻意保持“完美”愈来愈难,因为那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但令人痛苦的是,我又不肯彻底“变”回“真实的或本性的我”,因为那将让我很难被社会认可,甚至会被社会排斥。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啊。

如今,我在两个“我”中间不断地寻找平衡,这虽然活得很累,但如果我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可能活得更累。一个人在世界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他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这是一个矛盾,但也未必不能走向统一。我相信,这中间应该存在着一个答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它。

我应“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对此,我探寻了四年,但还会继续探寻……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学生)

“生活在别处”：我的昆德

■ 摇武跃速

182

大学人文「
第源辑」

半辈子倏忽就过去了,回想 1997 年前的大学生活,竟感到遥不可及,感到这中间的距离是如许的长,长到我踮起脚尖也望不到头,似乎隔着整整一个世界。我坐在窗下,望着窗外连绵的清秀山脉,寻找回去的路径。山上薄雾缠绕,山前一大片住宅,有一排排香樟树。望着这陌生的南方风景(许多年漂泊之后,刚在此安顿下来),我的视线模糊,心镜上浮起的竟是昆德拉的小说意象:“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当我“不知所措”的、散乱的目光逐渐瞄向了 1997 年 猿月 猿日这个日子时,眼泪居然不可收拾起来。

我是七七级学生。也只有七七级的人们才会在 1997 年的冬天考试、在 1998 年的春天入学。世间总有一些事让我泪流满面。对于“七七级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让自己泪流满面的事可能很多,多到人再也流不出眼泪,但 1997 年上大学这件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得意着还是失意着,永远是心底一块柔软之地。

但我恐怕不能写好“我的大学”。因为我基本上是“内视”天性,只有撞到我眼前的事和人才会进入视界,如此便会遗漏许多更大更有意义的风景。这让我有点惶恐。

课堂内外

我翻开相册,一张大八寸的黑白照片,“似曾相识”的一张张面孔,一律皱巴巴的中山装。这是我们班的毕业照,远位 19 岁左右的(我是其中之一),其余都 猿多岁(老三届),我们在中文系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大学时光。相比那些很大很有名的高校,我的大学有点小,在当年甚至是寒碜的,寒碜到人们也常常不把她当大学。她叫晋东南师专,坐落在山西长治。1997 年 猿月下旬,当一群身着灰色、蓝色、草绿色中山装和军装的男女,手持入学通知书,从工厂、农村、农场、街道走进

校门时,事实上她还没有真正地存在。于 1976 年下马的师专尚在恢复之中,她和自己的儿女们一样,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始新的生命。

说实话,站在新起点上的我颇有些黯然,高中毕业三年(七五届),常常在村头眺望远方的白云,向往白云下那不知名的广大世界,心里装满的是“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理想之歌》)和“黄河似弓,长江如弦”等当时流行的诗句;又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本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反复地读,女主人公坐在钱塘江边,渴望白帆船迎她而来,后来她果然乘船到巴黎求学,沿路扑入视线旋即又被抛在身后的什么新加坡、吉隆坡等陌生地名,对人来说,多么富于新奇感和诱惑啊!好不容易盼来能考大学,且在 1977 年的考试中还是故乡黎城 10 个被初选(当时高考分两步,第一步是初选,然后再筛选录取)的考生中唯一一个“文革”后的毕业生,我在故乡小城颇“牛”了一阵,连检查身体的医生都在祝福我,因此我多想展翅如“乘东风报春”的大雁啊!但事实是严酷的,“文革”开始后才进小学的我,身居偏僻之地,得到高考信息时已经很晚,没有复习资料,没有老师辅导,自己糊弄一阵就去考试,因此进入师专还是低分段的。怨谁呢?后来知道诸多老三届原都是名牌大学的苗子,由于种种缘故(出身的、政治的、年龄的——恢复高考第一年依然有这些障碍)而“低就”师专,我实在已经算是“得其所”了。

我很羡慕那些毕业于名校的学界同人,当他们说起大学母校下巴朝上时,我虽然有些不舒服,觉得在受血统论“迫害”,但内心还是能体会的。这不仅意味着学习的条件、气氛、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名师、大家、传统。而我几乎一开始就在零起点上:师专旧址被一所海军学校占用,听说正在谈判要回,我们暂时借住在一所中学(后来成了师专附中);大多数教师还在调动之中;师专的旧图书散落在长治的各个学校,新图书还不知在哪里……于是,我望着我的“大学”,将一种梦想搁在落差很大的“远方”和“现在”之间的一块绿草地上,在那里纷乱地唱歌跳舞和半睡半醒。

只有在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才有能力公平地讲,一座小的、偏远的学校,自有其短处,但同时又有其长处:起始阶段不拘一格的自主作风。就人才而言,学校领导当时几乎搜寻了散落在整个长治地区的知识分子,将那些“文革”时落难此地的各路精英噼里啪啦地卷进校园。我们翘首企望他们的到来,我们还“慧眼”识珍珠,就其知识呀、抱负呀、才情呀、品貌呀等,给他们逐一冠以诗意的称号。中文系是颇有几个名流的,让我在此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当时印象,以志纪念。

储仲君,苏州人氏,1956 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是施蛰存、钱谷融先生的高足,是长治地区有名的才子。俄文也好,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等刚出版。走进教室,一派儒雅,讲课诗情画意又幽默风趣,被同学们誉为“江南才子,翩翩然遗世独立”。至今还记得他徜徉在讲台上,惆怅地吟诵“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他曾在教育局写材料),还逼我们背诵《报任安书》。

宋谋琦,湖南将门之后。高大魁梧,一表人才。从小私塾出身,经史子集烂

熟于心,本任职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又戴过各种“反动”帽子,被一路下放、批斗,被关“牛棚”时开始研究《红楼梦》,在红学界常有惊人之语。此公为人处世大大咧咧,虽受尽苦难却毫无忧怨之气和忧惧之心,精力充沛,兴趣广泛,被同学誉为“大家风范,嘻笑怒骂皆文章”(宋先生已去世,在此祝他在天之灵依然洒脱自如)。

李蹊,辽宁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因出身问题被发配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教书,1964年,相比以上两位属于晚辈。其英俊刚毅,敬仰鲁迅,讲课既激情满怀又功底扎实,口才滔滔,说话抑扬顿挫,被誉为“关东英豪,面壁十年,纵横开讲惊四座”。

另外还有北大、人大、河大等“文革”前后的老毕业生,由于这些老师的相继调进,中文专业逐渐在省里有了些名气。当时许多理科生也常常跑到我们教室听课,作深沉状,然后在校园里到处鼓吹宣扬……

当我凝神回眸故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散乱的场景:

在我们破旧宿舍的旁边,有一个大操场,前面是一片小树林,我们经常在那里散步谈天,讨论“真理标准”。偶尔也有浪漫情爱,但很少。同学们大都很用功,星期天,会有人带上马扎,坐在小树林,静静地看书。树枝上,小鸟唧唧喳喳。

打饭时排长长的队,很耐心地等待。全校只有十几个女生(大都已婚),是被压倒多数的男生议论和审视的热点。深夜,有想孩子的女生在悄悄哭泣,这让我很惊讶。

每到周六晚上,隔壁海校都会在院子里放电影,我们每人夹个马扎——是学校发的——去海校的院子里排排坐看电影,算是我们重要的文化生活,也是海校给予的优惠。

在校园里走着,用心地听大喇叭里正在倾情热播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激动于“爱”这一字眼居然可以在广场上大声传播。

教室里,文艺理论课上,同学们踊跃讨论“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一”的含义,讨论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

仔细想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这三年的学习时光的。我不知珍惜。无论哪门课程都学得稀里糊涂的。没有学习计划和预期目标(这是我现在对学生的要求),听凭兴趣上课看书(托人到处借书,多是外国小说),听凭个性逃学游荡(曾和两个女友在街上疯狂地骑车,有意识地闯红灯——是我吗?天哪,居然还活到了今天),听凭性情“得恋”、失恋,或阳光朝霞,或愁云惨雾……一切没头没脑。“我的青春是一场晦暗风暴”(借用波德莱尔的名句),根基没有打好,至今都为没学问而苦恼。上述对诸位业师的评价,是老三届同学的杰作,我呢,很认同也很敬仰各位老师课堂上的境界,但更多的时候是“耳朵里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储师对我的评价)。校园外就是田野,春日沉沉,黄昏暮色,都能打动我的身心。记得当时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写诗,将所有的青春感受都写成分行的文字。有一位傅同学,常问我约稿(他好像是校报的编辑),将我那些所谓的“诗”“发表”在黑板报或学校的报纸上。我还给顾城写过信,只记得其回信中有一句:你的信就是诗。于是高兴了好些天。

还订阅《北京之春》,如饥似渴地读,跃跃然,热血沸腾地、深沉地思考国家前途。应该还有《探索》,很多同学都问我借读……多少年后,当人们跟我一本正经地谈及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时,我总是长叹一声,沉默而对。是啊,这个道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了,而且满世界发行,现在也算见解么。而我,这份热情早已在世事沉浮中湮灭殆尽。但又有点不死心,而今只要一听到或看到这类热血性情景和思想性文字,就会瞬间触动心里的一块地方,以至热泪盈眶。是的,我出生、成长在忧思天下的年代的末端,过去的虚妄会在岁月中消尽,被灌输的“思想”会被淘洗,而持续不断的读书生涯,却在我心里逐渐沉淀出普泛的价值理念。也许我在更加芜杂的现实人生中总难免缠夹不清,但在思想、情感的价值田园还不曾失却自己的一点坚守。我已人到中年,失去的早已失去,得到的还在得到,我珍惜自己的坚守,明朗而坚定。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你可以不追求崇高,这很正常,但你永远不要嘲笑崇高,否则就不健康。

后来访学华东师大,我告诉夏(中义)师,我从小就想上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夏师惊讶,问是什么样的环境使我有这样的梦想。我哑然。过后仔细想了想,才慢慢记起,实际上是在读师专后,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本《俄罗斯文学史》,于是知道了莫斯科大学,那里出了赫尔岑等让我景仰的人物,我也由此喜欢上了19世纪俄国文学。而读了现代文学史,才知道五四以及北京大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叱咤风云,于是在某一天,我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向往。我的记忆把时序先后倒错了,但说出的是心里话。当我第一次徜徉在未名湖畔,眼泪还是模糊了双眼,尽管我早已知道,此北大已非彼北大了。

“大海”边的实习

在我手头仅有的几张师专的黑白照片中,我最喜欢这一张:八个人在水库边的草丛里,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层次分明,神采奕奕。我手捧一束野花,站在前边笑。这是毕业前的那个秋天,我们在大水库边的一所中学里实习时拍摄的。八个人,三个女生,中文数学理化齐全。除了我,其他一律老三届,上大学前就是某地的实力派教师,因此一到中学就都正儿八经地上课,也无所谓实习。我则跟着像一条不起眼的小尾巴。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去水库边溜达,水边凉风习习,空气清新。有时早雾朦胧,几步即不见人,透露出一缕神秘。我从小在缺水的地方长大,从没见过漫无边际的水,常常伫立岸边,张开双臂深情呼喊:大海啊,大海!于是大家就把水库改称大海了。

与我最合得来的,是一个物理班的男生王同学,和一个数学班的女生程同学。我们三个泡在水库边的时间最多,采野花,洗衣服,散步,打水漂,或坐在石头上,把脚伸到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程同学是我同宿舍的好友,嗓子柔润甜美,会唱好多抒情歌曲,诸如《苏武牧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儿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等。我俩一起在月夜的校园吹口琴,自我感觉像夜莺。她人如其名,有一双纯而美的大眼睛,冰雪聪明,思考、表达皆清晰明亮。她学俄语出身,记得她在宿舍外咿咿呀呀地念英语字母,儿童似的,煞是可爱。和她同龄的女生都觉得她真用功。我俩虽然专业不同,但很谈得来,互相间不需要多余的话就有一种透亮的感觉。

我原先并不认识王同学,分到一起实习时才成为朋友。他很幽默,有点粗犷,爱说话,对文学有好奇心。我还给他大侃报告文学的社会功用呢(当时正是报告文学热,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几乎全民皆知,后来是刘宾雁等)。而他偶尔会讲自己的过去,我不记得他讲的什么,似乎很深情又很无奈,我听得津津有味,也作很深情很无奈的表情。当我诉说自己的理想与忧伤时,他会给出建议,一副大哥哥的样子。

中秋之夜,有的同学回家了,有的去吃喝了,我们三个相约去“大海”边赏月。那晚的风有些大,水库边一涌一涌的浪拍打着石头。天上一轮明月,对岸是黑黝黝的山,寂静的乡村,只有水声、风声,世界离我们远了。我们沿着岸边慢慢走着,浪花打湿了衣服,偶尔有鱼在水中跃起,鱼鳞在月夜闪闪发光。我们竭力搜寻脑子里有关水、夜、月的抒情句子,动情地吟颂着。此时此刻,我的心分明又听到了那哗——哗——的波浪声,闻到了水的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如今在何处。自从毕业分手,除很早时见过程同学一面外,就谁也没有音信了。然而曾经有过的友情,共同拥有的美好,永远印在我心的页码上;平时忙碌人生,一切沉睡,似是忘却了,消逝了,可一旦翻开,声音与颜色又立体浮现,将我带进那喧哗单纯的日子,而过往青春又像生命的泉水深情地汨汨流出。记得那个夜晚,我们从水库回到学校,余兴未尽,又聚在一起唱起歌来。从当时的流行歌曲(如《老房东查铺》、《妹妹找哥泪花流》),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语录歌(如《下定决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后又从地方曲调到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乎一出出唱过来,唱一阵笑一阵,还自我鼓掌。他们俩嗓子好听,尚有些味道,而我素来五音不全,也兴致很大地乱唱,真是噪音啊。可谁管那些呢?夜已深,学校师生员工都回家过节了,校园一片空旷,我们就这样自娱自乐直到东方既白。

实习期间,我们八个人还去太原的晋祠旅游了一次。分别时,两位学友都写了长诗送我,诗情友情尽在其中。我自然也写了,都与水库——我们的“大海”——有关。

我的大朋友们

当1968年春我以16岁的年龄跨进大学的门槛后,我就注定了与一批十多岁的孩子爹孩子妈同窗共读了,也注定了我充当“老三届”小尾巴的命运。我不知道,后来我的至交好友中大多比我长好多岁,是否和这早年的交往经验有关,但我非常清楚的是,这种时代特色给予我的馈赠是丰厚的,因为这批同学不仅仅是同学,他们阅历丰富,功底扎实,本应是名牌大学的候选人,是特别的历史将他们沉落到晋东南师专,他们的光彩也就自然撒落到我这样的小字辈身上。

上述两位友人,典型的理科生,感情内敛,我们只是相聚于特殊时日而相知,然后将美好情谊深留心底,便淡然于江湖了。在我的生命底片上留下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的人生,并使我为之感叹唏嘘的,是下边这几位同班同学。

卢叔宁,北京知青,原北师大附中的高才生。1967年恢复高考后,一心想考回北京,但因其家庭背景(父亲和弟弟皆死于“文革”),最后进了师专。我在未见其人时却先闻其声——是高谈阔论之声,循声而去,一群人站在宿舍门口,其中一位风度翩翩、气质不凡,在不断地讲着什么,声情并茂。我暗想,可能是新调来的老师吧。后来见此兄居然坐在教室里,才知道是班里的同学。

当时卢在写诗,说是整理多年来的诗作,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整理云云;而我也写诗,故接触多起来。他还为我改诗,于是我不知不觉成了他的准学生。记得他的诗大多有关政治,间或有爱情诗。他读书多,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英语的、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多,他还订阅了几本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其经历想必丰富,家庭的、自身的,或悲哀或激愤,或自信或迷茫,时而像小舟,在风雨中沉浮飘摇,但绝不沉落,时而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望无际。在此录下其1968年写的诗句以存念:

草长鸢飞童时梦,枫红雪白少年乡。
卷破欲酬壮国志,腹空岂忘九州强。
忽如一夜狂飙起,玉碎柱倾泊清漳。
牛瘦土瘠知民苦,陋室残灯索疗方。

应该说,这也是这一代插队知青中许多人的写照。卢说话跟演讲似的,讲得兴奋时眼睛炯炯有神,表情会演绎成一团热情与浪漫,如天边的流火(当时印象)。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小事,他在插队时,和朋友一起怀揣几块钱去周游祖国大地的种种遭遇,包括后来没钱了扒火车被抓进班房、念报纸挣窝头吃等,让我大开眼界,感到有意思极了。他有时不听课,读自己喜欢的书。我也时有逃课,听

他给我讲政治、经济、哲学之类,但更喜欢听那些忧国忧民的见解和身世故事,为此掉了许多泪,沉迷不已。同学们公认他是我班最优秀的学生,老师非常欣赏他。

可惜,这种状况未延续太久,卢因家庭和感情上的困扰,频频回家,似乎有数不清的事。这让我十分失落,只好望着秋天的树叶漫天飞舞,一片片落下。后来我留校,由于种种人事缘故(我至今不清楚),他留校失败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中学任教,而且是教数学(据他说,一是自己喜欢数学的清晰确定,二是自己教语文的方式对学生高考不利)。他现在在深圳某中学,依然教数学,间或写诗作文,依然是出名的好老师。记得我留校不久,读过一个短篇,叫《在路上,希冀或流浪》,主人公似乎也是一群插队学生,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在被人遗忘的某个角落,穿着破烂,却不断地心忧天下,眼睛或迷惘或深邃,在思考和谈论中熠熠发光。我读后喉咙发哽,知道了什么叫灵魂的高贵,懂得了什么叫命运的不公。后来卢出了一本书,叫《劫灰残编》,是其 194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日记书信节选。这些文字当年如被告发,作者恐怕很难活到今天。我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代曾经年轻的思想者,他们觉醒得比较早,勤奋、广思、敏锐,有才华,且富于使命感。他们本该是思想界的精英,本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但被浑浊的世俗无情地淹没了。我谨在此,对他们表达我的敬意和对历史的悲悯。

李远苗,我班的才女,古诗文功底好,随口就来,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念,论文也写得好。这些都让我羡慕。我和她很快成为好友,互诉心曲,无话不谈,她还被我拉去在初春的土地里寻找“溪头荠菜花”,却在荒草下发现绿色的蒲公英幼苗,大喜,便去颠覆古诗,说原来“春在野地蒲公英”。远苗在中学时曾因是“白专”典型被别人写大字报批判,1959 年毕业回乡种地,后来当民办教师,在“心如死灰”(她的形容)的情形下突然恢复高考,她感觉是太阳重新出来了。尽管学校不太称心,但她依然珍惜,读书十分用功。记得毕业前夕,她说反正时间很零散了,就定了一个读外国名著的计划,于是见她每天捧读大部头的翻译小说。回故乡中学后,自然也是好老师,但她不怎么喜欢中学教师这个职业,因此显得孤单,不大和人来往,有空依然是读古诗文,给我写的信也总是诗词流淌,很美的文字。有时我们也互相走动,记得她说过,无论你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都可到我家来,我都会尽力帮你。确实,作为“过来人”,她在各方面帮我很多。而说到一些人世无奈,她经常伤感“一江春水向东流”,“寂寞开无主”,她对自己各方面的命运皆感叹、悲伤,我几乎不知该说什么。我也曾鼓励她写东西,帮她寻找发表之地,不知为何,她似没怎么认真去写。

可有一段时间,不是好几年,那是我到处流浪的年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看她或者问讯她的生活及精神状况,也没跟她讲我的自我放逐、我的深山读书、我的同样凄凉无助的心情,我们失去联系。于是日子在无声中流逝。可就在某一天夜里,她在深睡中悄然离去,从此不再醒来(据说是心脏病猝发)。那时我在

北师大读博,一天上午友人打来电话,说远苗突然病故。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拿着听筒的手抖着,泪如泉涌,感到自己身体上突然被撕开一道口子。

之后很久,我才慢慢地相信远苗是真的死了。我渐次看到,她其实早就在走着归去的路了。记得最后一次她来看我,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和我谈读书的事,也不再诉说感情方面的悲伤,只是一直和我唠叨生活琐事,且吃过饭很快会睡着。我当时有些诧异,却不知该作何理解,还暗暗庆幸她终于变得世俗起来,这样就可以较容易地活着了。谁知灵与肉是不能分的,哀莫大于心死,其心在长长的伤感之河中泡着,没有救助,而我,这个她在人世最好的女友(几乎是唯一的),整日忙乱于名利场上,总也找不出时间去看望她,哪怕说一些没用的话,也是对心的拂照,可我没有。她孤独着,沉默着,终于到了那种时刻——灵魂关闭了,血肉冷却了,她平静地、沉默地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世界。

我无法弥补。

不知为什么,我在师专七七级中文专业最好的三个大朋友,其中竟有两个已经不在人世。魏天平,是在1985年得肺癌去世的。而那一年,是我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年头,我现在想说的是,当时我在太原调工作,没能回去参加天平的葬礼,是我的大憾。

和魏天平走得很近是因为卢,而且是在大学生活最后一年。魏是走读生,常常听完课就回家,还在市文化宫开办的各种成人讲座上教课。我开始和他并不熟,只是偶尔在课堂听到他的高论。三年级时,魏可能觉得学生生活已有限,便常呆在学校,并和卢在一起,有时也叫上我瞎掺和。天平是长治中学生中的才子,入师专后是班里的尖子,毕业留校是很棒的老师。除此之外,还是个十分爱才和仗义的人,甚至可以说有点“江湖义气”。正是因为后者,他主动和卢走到一起,成为好友,并在卢恃才自傲口无遮拦惹风波时为他遮风挡雨。二年级末,他和卢都是中文系选中的留校苗子,可能要着意培养,我当时好像也是(我一直没弄清楚),三个人一块到刘老师(刘好像时任系主任)家聆听教导,并选定自己的专业。魏是古典文学无疑,卢是文艺理论,我是什么?我告诉老师,不,我不想当老师,我要当作家。老师哈哈大笑,说没有这样的专业,要不你教写作?我半信半疑,无可言状,他们也就不理我,继续他们的讨论。后来魏告诫我,说留校是很难得的机会,你不要乱讲,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专业。卢笑说,她就是想成为诗人么。后来我以自己喜欢的外国文学“力”胜群雄(那些学习很棒的大同学大多不喜欢外国文学),不知道是否是在那个时刻定下的机缘。后来再出现的场景,就是储师谆谆教导我将来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卡片了。我听得一头雾水,心乱如麻,根本不知他说了些什么。

后来听魏讲,储是因为看了我发表在校报上的一首长诗和交他的一篇作业后认为我还孺子可教的。这真是歪打正着,让我始料不及。后来还是听魏讲,说我留校不容易,教师会上不少人认为一个黄毛丫头不过读了几本外国小说,纪律

也不好,不可留校,是储慷慨陈词,说年轻人有思想,只要用功,未来前途不可限量。那时储在学校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在那个“科学的春天”深得器重知识分子的王书记之尊重,这话就很有分量了。魏告诉我要懂得珍惜。我感到戴上了紧箍咒,我必须一切做得好,给恩师长脸。于是以后每当我做了什么不入别人眼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到储那里告状,害得我挨批。所幸储是有境界之人,虽然有时也板着脸“审问”警戒一番,但在根子上对我是很理解、很宽厚的。

天平对自己所敬仰的老师会到处鼓吹之、渲染之,并能表现在行动上。当时他和卢是老师家的常客,与老师谈天说地,谈学问谈人生,谈品格谈性情,兴发时还会在年龄相近的老师家吃喝一通,搅得老师全家不得安宁。魏说话富于感染力,什么事被他一渲染,那是绝对的好到极致也坏到极致,我听得过瘾,会不知不觉受些影响,因为我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总是很糊涂。想来他对我颇尽学兄之责,在一些事情上他会给我出主意想办法,我也习以为常。

让我如何叙说他的去世?后来他是拼命工作(教很多课,也教得好)、拼命玩(下棋、打球、打扑克,也玩得出色)、拼命抽烟(一脸烟色),眼看留校工作的同学升官的升官、上职称的上职称,他作何感想?留校后他是第一个走上讲台的,给七八级讲古典文学,也是第一个拥有成果的,和人合作写了一本小册子《上党史话》。刚留校时他还住在宿舍,每天早晨起来背日语……可在七七、七八级留校生第一次评副教授时却没有他。记得他和我谈起此事,怅然的样子,我无言以对。再后来他生病了,在北京做手术,坚持了一段日子,走了。据说最后是他自己拔掉身上的氧气管子,似乎还咕啾了一句粗话。

尾摇声

如今,母校已升为本科,改名长治学院。当年的小树已繁衍成林,阴及四方。校园里红楼绿树,回廊草地,高大的图书馆,连绵的学生宿舍楼群,现代化的实验室,一大批的硕士、博士,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届届学子……大学校园应有的她全有了,只是没有了我(矫情,可这是我真切的心事)。我一直在从事自己当初愣头愣脑不愿认可的教师工作,用母校给予我的最初的知识 and 人生启示来不断地滋生新的知识和见解,并再努力传授给学生。

是的,大学生活的内涵可能因时代与人而异,而大学生活在过去好多年再回首时又让人拥有一份美好和怀恋,则大体相同。因为它记载了一个开端,无论欢喜还是悲伤,无论清晰明确还是迷惘阴郁,都会成为一个人怎么也绕不过的生命记忆。而最为重要的也许是,那喧哗着或沉睡着的,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青春。歲苑年考入晋东南师专这件事将母校很温柔也很严肃地栽入了我的身心,多少年后,尽管我在别的学校获得了硕、博士学位,但总和我有隔,总觉得那不是我的大

学,而只要一提起师专,就会油然而升起一股温暖,因为那是一个和我血肉相连的所在,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无论我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想起和青春渗透在一起的母校,我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几千个日日夜夜中的情景、事件以及心情,会在一刹那蜂涌而出,铺成我如梦如烟的大学春秋。

这是我的人生珍藏。

(作者:江南大学教授)

怀念陈琼芝老师

■ 摇杨支柱

圆年 远月 圆日凌晨 陈琼芝老师告别了她病床前的 员位家人和亲友 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她曾经热爱并在她离开时依然热爱着的世界。

也许是为了能让外地亲友早点回家的缘故——陈老师和他的丈夫窦英才老师一生总是这样首先为别人着想 愿日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家属和学校通知的人不多 但实际去告别的人却不少 大约有二百好几十人 其中许多是陈老师教过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未得到陈老师家属和学校的正式通知 他们是通过同学间的手机短信才获悉陈老师辞世的消息的。一部分学生的悲痛之情 似乎还远在亲友之上。这是罕见的 因为陈老师不过是无职无权的退休副教授 又被病魔折磨了整整五年。但我并不奇怪 因为我知道陈老师过去是怎么善待学生的。据说陈老师的儿子“豆豆”上中小学时对母亲很不满意 总觉得陈老师更像别人(那些常上陈老师家的学生)的母亲 我想 这只是一个不习惯与他人分享母爱的未成年独生子女的错觉。陈老师当然是热爱儿子的 任何学生在她心里都不可能拥有她儿子那样的地位 她不过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若将众多学生所分享的陈老师的母爱加在一起 倒是真有可能超过了“豆豆”所得的份额。

愿日晚上 李牧师为陈老师主持了“追思会”。参加追思会回来 我终于敢坦承我对陈老师辞世所抱的庆幸心态了。我觉得陈老师既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又离开了俗世的污浊与残酷 真是双重解脱。“那边”的有无 我不敢断定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 但如果有“那边” 陈老师在“那边”一定过得比“这边”好 对此我倒是深信不疑的。李牧师说：“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 因为陈琼芝老师回到了她在天国的家 回到了天父身边。”他说得真好。

这次陈老师住院总共也就一个月左右 住进去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去看她 大约是在她住院的第二天。这天去看她的人特别多 我对她大概只说了一句话。刚见面时她说 她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生活不能自理了 而且浑身不舒服 。

自己不快乐,还拖累别人,还是早点走好。看到她脸上浮肿,说话有气无力,很痛苦的样子,我内心难过,竟一时说不出话来。突然陈老师问我:“支柱,你觉得杂跟运怎么样?”我脑海里立即浮现一个高个子将军头(前额掉头发,显老,似乎到了当将军的年龄)和一个小小娃娃脸。这两人都是陈老师教过的学生,大龄未婚,男孩是我的朋友,女孩曾是我的学生。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恐怕不成”,就被护士赶走了。后来那女生还打电话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成”,显然陈老师对我的看法很重视,曾把我的看法告诉她。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成”,这只是直觉,说不出什么道理的。

“支柱,你觉得杂跟运怎么样?”这就是陈老师在“这边”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在病危状态还惦记着某学生没媳妇、某学生没丈夫,这哪是师生情?这分明是母爱。我很感动,回到家里就给杂发了条手机短信,杂也很感动。我不禁联想到我的母亲。圆年前我母亲辞世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你回学校去吧。别耽误学习。”这话倒更像是老师对学生说的。不过我那时还不满圆岁,生活自理能力有了,又没到想媳妇的年龄,我妈最关心我的学习,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母爱和师恩,到了深处,是相同的。友情、亲情和爱情到了深处,也是相同的。同是一颗爱心,落在不同的对象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次探望陈老师后不到一周,陈老师就皈依上帝并且受洗了。这使她面对病痛时更加平静,病状也有所减轻,又有了一些活着出院的希望了。她仍然热爱这个世界,但对于离去却并不感到恐惧,这种通常鱼和熊掌难以得兼的两样东西,她都得到了,她是同时带着对“这边”的深爱和对“那边”的希望离开的。

听说陈老师受洗,我曾打算去看她一次。有人说看望病人的人太多不好,跟告别似的。我觉得有理,就没去。远月圆日我在校门口碰到雷老师,他说晚上准备去看陈老师,她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家了。我当时心里想,陈老师的病估计还得反复几次,我最好是周一监考后去,自己一个人去,那时她的身体状况可能要好一点,我可以跟她多说会儿话。我特别想知道她是如何体认上帝的。我对上帝是宁信其有,但尚未确信,且害怕教会的“组织生活”。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受无神论影响比我还深,她对“那边”的有无持比较彻底的不可知论立场。如今她竟然“顿悟”,皈依上帝了。一个不会说谎的朋友在生死边缘的宗教体验,是很可宝贵的。

我万万没想到,陈老师竟然走得那么快。我永远失去了一个从可信的友人那里求证“那边”存在的机会,这是我深以为憾的。

陈老师的幸运不止表现在她离开的时机和离开时的心境上,还表现在她生病的四年中。她一生无私地把爱奉献给家人、亲友、学生、同事甚至陌生人,在生病以后她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一直在爱的包容下与病魔搏斗,最终在爱的包裹中解脱了折磨。

陈老师为学生所做的一切,远远超出了尽责的范围而接近母爱。她不只是

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心灵。她对学生的关爱不因学生的学习不好、观点不同而加以区别。她所谓学生的范围,也不以学校安排她授课的班级为限。凡找上门来向她求教的年轻人,她都以学生待之。即使退休后,她还曾辅导过多名学生跨学科报考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两名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对学生的关爱还延伸到学生毕业以后,甚至延伸到学生的孩子身上!陈老师对同事的评价是以对待教学和学生的态度来划界的。学校的教职工凡认真对待教学、关心爱护学生的,她就赞赏;凡草率对待教学或对学生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她就贬斥。她对学生的爱是如此博大,以至于通常只有在舞台上才能见到:在 1994 年“萨斯”肆虐的时候,她虽然身患乳腺癌且已到晚期,却支持退休返聘的丈夫在校园封闭期间留校授课!

陈老师生病以后,问候和探望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说“朋友遍天下”,在别人也许是吹嘘,于她则一点也不夸张。实际上许多朋友和学生不得不因为探望她的人太多而取消探望或减少探望的次数,以免她因为说话太多而过分劳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悲哀,她可能再病 10 年也没有机缘体会。

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还形成一道很厚的屏障,将她与俗世的丑恶和残忍隔离。对于丑恶和残忍,我们所耳闻目睹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使得我们过去可以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而不受良心的过分折磨。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这种状况,我们身边的丑恶、残忍与千里之外的丑恶、残忍一起奔涌到眼前,深重的恶臭拷问着我们的良心。我们被迫跟丑恶和残忍搏斗,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因此可能得以新生,但这也注定了我们一代乃至几代人要承受前人所没有承受过的心灵痛苦:今天某地煤矿塌方或爆炸死了几十人,明天某地小学生被水淹或火烧死了几十人,后天又是某地食物或药品中毒导致数百人住进了医院。一个无辜者被警察刑讯逼供活活打死了,一个“罪犯”被枪毙了十几年后而“被杀害的受害人”又活着回来了。区委书记、区长、教育局局长们由旁人撑着伞在观看,怨个 10 岁的小女孩在大雨中表演舞蹈,这个活动叫“关爱女孩”。定州某村农民因为征地补偿款被克扣了一大半而占地抵抗,结果遭到数百流氓的袭击,被打死 10 人、打伤 10 多人,地方政府还扬言要追究“带头闹事”的农民的责任。……每天从网上看到这类新闻时,我心里都在流血。我本人因为娶了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妻子,准生证办了一年多还没办下来,我妻子怀孕后担心被捉去强制堕胎,没有我陪同她不敢出门。

陈老师的心肠远比我柔软,头脑比我还天真。如果她这几年经常在社会上跑,天天上网看新闻,那么,面对这些连我都难以忍受的丑恶和残忍,她的痛苦同样是难以想像的。这几年疾病一直折磨着她,但正是因为生病,她被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层层包围,与这个世界的丑恶、残忍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免受了有良知的健康人所承受的大部分精神痛苦。正是基于对陈老师最近几年生活状态

的观察,我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时琢磨出一个“痛苦守恒定律”——饥饿的人吃得香,劳累的人睡得香,生病的人良心少受折磨,权力和财富并不能增加人的幸福感,一个人承受痛苦的多少只跟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有关而跟其遭遇无关。这是陈老师送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

我和陈老师相识,是1987年夏天在法律系1987级学生的“大学语文”课考场上,我们同为监考老师。开考前,陈老师很热情地过来跟我说话,我大概只是偶尔敷衍一两句。考试过后一起去教务处送“考场记录”,她问我老家哪儿、父母是否退休一类的问题,我也礼尚往来地问她老家哪儿、何时退休。这样一来一往,我发现她不但是湖南老乡,还正好与先母同龄,心理距离一下就缩短了许多。她问我爱吃什么菜,我说最爱吃萝卜。她问我爱吃什么萝卜,我说无论是鲜萝卜、干萝卜,还是咸菜萝卜,只要是白萝卜就爱吃。她说她家里有一大坛腌萝卜,开学时给我带一点来。

开学后不久在食堂碰到陈老师,她果然用塑料袋带了一碗萝卜来。我对此并不奇怪,因为1987年下半年我教法律系1987级学生的民法,对陈老师富有爱心已有耳闻,她肯定记住了一个从小没妈的孩子爱吃萝卜。

我之所以能把我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陈老师在我们熟识之后不久对我说过,她对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她说我那时很傲慢,要不是因为我跟她儿子的年龄差不多,她才懒得搭理我。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概是1983~1986年在北大上学的经历,使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在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的教师是最有学问的,1949年恢复高考后本科毕业或原来的工农兵学员,1951年以后研究生毕业的人也是比较有学问的,但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学问的,因为那时留校主要根据政治标准。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不经意间就从脸上流露出来了,被她敏感地觉察到了,只是出于博大的母爱她没有跟我计较。如今看来,我当时的表现的确很可笑,把不完全归纳得出的结论当作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即使碰对了,一个有修养的人能够仅仅因为别人学问稍逊就傲慢对待他(她)么?正是陈老师的宽容和真诚,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粗糙和傲慢。

此后一年左右,我跟王老师去过陈老师家两次。去的路上,王老师总是说别太麻烦人家,聊个把小时就走。但事实上他总是聊起来没完,要走的时候,奚老师、陈老师又不让走,非留吃饭不可,吃完饭又接着聊。我没有王老师那么健谈,但胃口好,能吃。不过我喜欢去陈老师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她家饭菜可口,而是因为我在哪里能找到家的感觉。这对于一个早年丧母又连续吃了10多年食堂的单身汉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有一次在陈老师家,我帮陈老师收拾蔬菜,奚老师一边跟王老师聊天一边给我补毛衣,这场面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1988年初,因为我抱怨集体宿舍学习环境不好,陈老师给我配了一枚东方文化研究所的钥匙。我在那里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两篇比较专业的当时就发表了,

还有几篇后来收进了我的《地下室磨牙集》。

因为到东方文化研究所看书、写作，我每周都能见到陈老师一次。有一次陈老师跟我说，她最初并没有看出我有什么特殊之处，是因为听雷老师说我有见解，而我又抱怨集体宿舍环境不好，她才给我配钥匙的。这并不能怪她没眼力，因为我到团校一年后才认识她，认识后最初跟她的交流也不深，而我对雷老师和王老师一开始就是另眼相看的。不过陈老师如此直率实在是有些冒险。如果我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她这么说，岂不是做了好事还可能遭我记恨么？陈老师跟人说话就是这样掏心掏肺！

有许多朋友对陈老师这样一个热情、友善的人在职称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感到不理解，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因为陈老师太天真，她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一些小人，而自己完全不知道。她的天真有时让我非常惊讶。记得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后不久，有一晚我去看望她，她兴奋地告诉我：上午她阻止了一件残忍的打人事件（可能还有别人帮助她，我记不清了），并且到法庭去作了证。

我以前没想过陈老师也有“不诚实”的时候，这是陈老师去世后听窦老师说的。据窦老师说，如果有人来访时陈老师正在赶稿子，她也会很烦恼甚至很痛苦，但她从不流露出来，她怕伤害客人的心；这种情况下陈老师仍像平时一样热情接待，等来访者走了再加夜班，实在不行就跟人家协商延期交稿。如果陈老师偶尔说自己有急事必须办理而不留人家吃饭，以她平时待人的热情和真诚，我想客人是能够理解的。陈老师本来是个直爽的人，只因为过多地顾及他人的感受，她竟然把烦恼掩盖起来，把痛苦留给自己。学生把陈老师家当成自己的家，陈老师是引以为荣并乐在其中的，想不到她有时也苦在其中。

六年前陈老师退休了，退休后大概过了一年陈老师就得了乳腺癌，但又过了一年才确诊和手术。手术后最初两年多，陈老师只是每年去化疗两个疗程，日常生活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自陈老师退休后，我大约每年去她家三次左右，有时是因为老家有人带土特产来了她叫我去吃，有时是我路过她家门口顺便去看看。陈老师的癌病确诊以后，我暗下决心不在她家吃饭，以免累着了；但她和窦老师仍然像以往一样热情地挽留和招待，因此除了正月的拜年和陈老师主动邀请我去她家与过去的学生聚餐，我总是选择在晚饭后去看望他们。

我在陈老师家常碰到陈老师、窦老师教过的学生或其他客人。有一次在那里认识了朱正先生，还有一次碰到两个年轻姑娘在她家长住——她们是陈老师在延边大学时教过的学生的女儿。学生或其他父母不在身边的年轻人去陈老师家，究竟是看望陈老师、窦老师，还是到那里去寻找家的感觉，我想当事者大概是说不清楚的，或许是兼而有之吧，至少我是这样。

2004年我创办“问题与主义”网站以后，陈老师经常推荐别人看我的网站，对我的称呼也由“小杨”变成了“支柱”。陈老师夫妇很少当面赞扬人，他们是用热情的款待、热心的推荐来表达赞扬的。这种含蓄的赞扬更接近母爱的自然流

露。我就想不起我母亲何时赞扬过我,但我当然知道她是爱我的。

1995年夏天我结婚的时候,因为陈老师经常化疗身体大不如以前,我就没请陈老师、窦老师喝喜酒。陈老师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却反过来要请我和妻子去海淀影剧院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喝喜酒。我一再推迟,但她坚决不依,说我结婚也是她的喜事,喝不了酒可以吃饭、喝茶,不然她就不高兴。没办法,我只好答应。那天一同吃饭的除了陈老师夫妇和我们夫妇以外,还有陈老师的弟弟、妹妹和小学同学,真有点像是她家在办喜事——尽管规模不大。吃完饭陈老师、窦老师又送我们一床亚麻凉席,我们收下了;但我们送她的一小盒高丽参她却不肯收,说家里有很多,后来我说要把亚麻凉席退还给她,她才勉强收下那盒高丽参。

不久我和妻子打算买房子。因为陈老师、窦老师在房山区西南角的“古桥镜水”买了套期房,每平方米才1500元。我们打电话问陈老师那里还有没有房源,周围环境和房子质量怎么样。陈老师得知我们可能跟她做邻居非常高兴,主动提出她要给当初带他们去看房的小伙子打电话,说可以接我们去看样品房。过了两天,那小伙子果然来了电话,说他现在到大兴售房去了,我们到大兴看房他可以派车来接,到房山看房他也可以叫他的朋友来接。但考虑到距离太远上班不便,我们最终放弃了跟陈老师、窦老师到房山做邻居的想法。那时我们和陈老师夫妇都没有想到,直到陈老师去世,他们在“古桥镜水”买的房子连影儿都没有。我想这是开发商的问题,跟售楼的小伙子应该没关系。

陈老师、窦老师是因为家里客人太多经常住不下才决定买房的。买房从银行贷了十几万,每月都要还本付息,尽管医疗费大部分可以报销,但经济上仍然非常紧张。我担心陈老师没钱治病,多次想过要给陈老师一点钱,但因为我自己欠债更多,怕妻子不高兴,又想到陈老师肯定不会接受,所以终于没有开口。我想等我哪天发笔财,还完债还有富余,一定要支援陈老师、窦老师一把。如今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想起陈老师这些年来给我的母亲般的爱,我十分愧疚。

我们在西三旗买房入住时,陈老师又做了手术。手术本身很顺利,术后就出院了。陈老师说,等放寒假了要来看看我们的新房。放寒假后,陈老师身体虚弱怕冷,反过来邀请我们夫妇去她家聚餐。那天是腊月廿八,吃饭时陈老师还说,等天气暖和了大家一起去看看支柱的新房。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陈老师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

今年猿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顺路去看望陈老师,那时她刚做过手术,恢复得还不错,只是大夫说还有两处肿瘤要做手术。离开的时候,陈老师执意要送我们到公共汽车站。等了十几分钟,也没见到“愿苑支”公共汽车的影儿。我们发现陈老师尽管衣服穿得比我们和窦老师都厚得多,却冻得嘴唇发乌、脸色发青。我们一再劝她和窦老师回去,窦老师也一反常态地劝她回去,她却不肯。后来我们说马上“打的”,不等公共汽车了,她才跟窦老师一起回家。

陈老师 1938年 9月生于湖南常德。195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

教于吉林省延边大学,1984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调入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3年退休。

陈老师于1984~1985年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1985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的注释和编辑工作,另有愿篇文章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同年,她的《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发表于《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新版鲁迅杂文集》中《三闲集》、《二心集》两书由陈老师校注。朱正先生对于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说:“陈琼芝做的《三闲集》、《二心集》也很好,校注两个方面明显比1985年版有不小的进步。而且她特别认真,像藏原惟人的生卒年,她是写信到日本去查明的。”^①

陈老师在借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两次访问巴金,后辑录巴金著作和答记者问中有关巴金的内容,结合这两次访谈的记录,编成《巴金自叙》一书,经巴金女儿审阅后,198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1985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陈老师所著《生命之华·巴金》一书。1985年第3期《鲁迅研究》发表陈老师的《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该文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读大师》(祝勇编)一书收录,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86年《生命之华·巴金》经陈老师修订后由鹭江出版社以《生命之华·百年巴金》为名再次出版。

陈老师还辑录了《活的中国》一书,1986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活的中国》英文版是埃德加·斯诺在萧乾和杨刚的帮助下编译的中文作家小说集,1986年11月由英国伦敦乔治·悦·哈拉普公司出版,选文包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矛盾的《自杀》、《泥泞》,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大连丸上》、《第三枝枪》,林语堂的《忆狗肉将军》,郁达夫的《莛萝行》,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并附有作者小传。《活的中国》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影响都很大。

中国大陆的教师,家就是办公室。太多的学生、亲友频繁地跑到家里来吃、住,占用了陈老师大量的时间,使她忙于接待、疲于接待,这既妨碍了陈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极大地影响了她著述的数量。如果考虑到陈老师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考据性的而非思想性的,那么时间被挤占的影响就更加严重。陈老师曾经采访过数十位几乎是最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其中对曹禺采访过十多次,记满了好几个厚厚的采访本,一直打算整理成一本《现代文坛知闻录》,却不得不一拖再拖直到退休,最后竟因为病魔的降临未能如愿。尽管如此,

^① 朱正:《这也叫“审读”吗?》,原载《书屋》1986年11月。

这些访谈仍然在课堂上发挥了作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不久会有朋友将陈老师当年做的这些访谈记录整理出版,但速记的文字由他人整理,效果恐怕是要打折扣的。

陈老师对于鲁迅研究和巴金研究,甚至于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她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她提出了什么新思想,而在于她对史料的发掘、考证。你可能认为她的某个观点是肤浅的,你甚至可能认为她的某个观点是错误的,但你研究相关问题时可能不得利用她发掘、考证出来的材料。我曾在朱正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他引用陈老师采访来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却与陈老师当初的思想倾向相反。作为一个诚实的人,陈老师的考证可以完全排除作弊的嫌疑,作为一个认真的人,她的考证出错的可能性也不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老师的这份学术小传的所有内容我都是先在互联网上找到,然后再找龚英才老师核实的。陈老师不上网,她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是因为出版社的广告、学人的引用和朱正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北京的“鲁编室”》而在网上传播的。这证明陈老师所有的学术成果今天仍没有过时——其实陈老师的一些观点早就过时了,或者说本来就是错的,之所以几十年后还有人提及,原因就在于她的文章中总是包含一些对现代文学史史料的发掘或考证。

相对于陈老师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她的思考和著述都是不到位的。不过陈老师对不同观点是非常宽容的,跟她对于邪恶的不宽容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说,用“宽容”这个词来描述陈老师对于不同学术观点的态度,本身也不到位。实际上陈老师对于任何美好的事物或深刻的观点都有一种敏感的直觉,持一种欣赏的态度。因为这种敏锐的直觉,陈老师的朋友虽然很多,但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因为这种敏锐的直觉,陈老师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朋友虽然也很多,但几乎都是有识之士,其中许多人远比陈老师深刻。

陈老师不是什么大学者。我知道我这样说陈老师,她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听了会不高兴。但我觉得,评价陈老师的学问,应该把她跟那些她所尊敬的或引以为友的学者相比,而不应该把她跟那些投机取巧或滥竽充数的教授相比——这样比是对她的侮辱。事实上,陈老师一生的时间除陪伴家人、关爱学生外,主要是花在跟那些优秀学者、作家的交往上。她不是一个喜欢丑女陪伴以衬托自己貌美的人,她没有这样虚荣,更没有这份心机。

因为陈老师在退休前申报了一次教授资格而未获通过(是在二轮等额投票的情况下,以苑比源为不到三分之二多数而未获通过的,而此前一直以苑比源为三分之二),陈老师在乳腺癌确诊前又一再为此申诉、上访,所以在后来缅怀陈老师的活动中,不断有朋友说“陈老师早就够教授了”。老实说,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一些人买书号印一本市场上谁也看不到的“专著”,甚至抄袭已被公开揭发,都照样评教授、当教授。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是“官越大耻辱越大,钱越多耻辱越大,职称越高耻辱越大”,申报职称本身就近乎耻辱——不管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

在职的人申报教授尚有其不得已之处,既然打算退休,何苦还要自取其辱呢?因为申报教授又未获通过,陈老师既耽误了《现代文坛知闻录》的写作,又影响了自己的健康,着实令人痛惜。

陈老师的“争教授”,并不意味着她喜欢自己被置于滥竽充数的教授中以显示自己木秀于林,也不意味着她对于当教授的虚荣十分热衷。如果她对教授职称那么热衷,在 1980年代后期条条框框没这么多而又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她就应该申报,那样她早就当上教授了;如果她对教授职称那么热衷,她就不会在学生身上花那么多时间,耽误自己的写作;如果她对教授职称那么热衷,她就不会副教授当了 15年,等到要退休前夕才第一次申报教授。她没当上教授而产生的痛苦,我认为主要来自她的“组织观念”,而不是没有当上教授这一事实本身。她不能理解,“组织”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公,居然认为她陈琼芝还不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抄书公”。正是因为对“组织”抱有幻想,所以她抗争,直到病魔降临。陈老师在观念上、气质上都是个集体主义者,而不是个人主义者,她一直在努力把“组织”和“坏人”分开。这是她的悲哀,但或许也是她的幸运。她的不可知论倾向比我还深,后来却顿悟了,皈依上帝了,说不定跟她的集体主义情怀有关。

中国人讲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排在第一位的。尤其是当下这个社会,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物产大为丰富,每年出版的所谓“学术作品”汗牛充栋,可以说是“什么都不缺,就是太缺德”。而陈老师首先是立德之人,其次才是立言之人,她在立德上的贡献远远大于她在立言上的贡献。学问这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被人超越的,很容易过时的,但爱不会过时,道德不会过时。陈老师给我们的爱将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田,陈老师所立的德将永远阻止我们堕落。陈老师是不朽的。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的改造

■ 摇方悴农

问真爱友：

匆匆地回到农村来，又是将近缘天了。在这短短的时期中，都是干着这个开拓农村大荒的工作，流浪奔波着。

有时天已晚了，可是归宿的老家还远在数里之外；有时亦赤脚在田场中工作，看见县政府里派员下乡放款、施赈……又要忙着整衣去招待。更有时进城去跑街提货，写着呈文，拜见官府大人，忙得头昏眼花；甚至连换衣服、洗澡、喝开水、大小便等最重要的日常生活项目，也没有工夫去进行。只有，也是拿着一本日记簿子、一枝铅笔，坐在厕所里拟计划、写日记。……这些，那些，并不是我故意开玩笑，实在是我近来生活的写真；——或许也就是每个苦干农村运动同志的家常便饭。不过，这样干虽然是身子痛苦一点，但所祈望中的新事业跟着创举起来，也还足以自慰的。

半个月的农忙，倏忽已成过去了。二十天的临时农忙托儿所也跟着《幼儿教育实施计划》的第一步完成而结束，从事开始着第二步计划工作的进行。乌溪村小学随着也得开学了。

观音庙依然还是静寂得萧条如旧，这顽固腐朽的乡下士大夫王先生的脑袋，却已充满了新的生气。是上周星期六的晚上吧，我和王先生在月光皎洁的草地上坐，讨论攀谈起托儿所结束的事情，及预备第二步进行的方法。以后正提起讨论这乡村小学的改造问题，和本学期进行的计划，王先生首先提议说：“……探先生，你真有像《古庙敲钟录》^①里那位朱先生的毅力、才干和学问。我想要改造我们的观音庙小学（原为乌溪小学，因设在观音庙内，故称），还是请你来做古庙的朱先生吧，我来做个古庙的钟儿。现在我们住的这座观音古庙，也正像陶先生描写的

^① 陶行知：《古庙敲钟录》，上海儿童书局。

那个古庙同样的情境……”以后,王先生又说了许多他当乡村教师的经验:“过去,教育局里也时常发下一纸具文训令,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要切实施行生产教育,又要从速兼办民众教育。……起先,我们正从师范里出来,还是初次碰到,也曾被他弄得天昏地黑,头晕眼花,不知从那里做起?怎样做法?着急万分。现在当教员当得资格老了,有经验,每逢收到了一纸具文训令,有空把它看了一遍,也同样夹在学生写字簿里去,拿到杂货店包铜板,换得几支烟来了事。这种穷干法,说也惭愧要笑,不过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但现在看到你探先生的服务精神,和你介绍给我看的这些新书之后,很想照这些理论的办法来干干看。像这次的农忙托儿所,以前我也畏头畏尾地当作具文看待,要不是你探先生的鼓励、指教和帮助,恐怕做梦也不会发现有这样美的一块园地。现在,我很希望借探先生的力来把这奄奄垂毙的乡村小学改造一番,使成现代的教育产儿,实施全村人民生活教育的场所。”

的确,现在对于乡村教育,虽有少数觉悟的教育家在那里拼命地提倡、鼓吹和试验。然大多的乡村小学一方受着农村经济破产和灾荒的影响,同时,大多数的乡小教师,因生活穷困欲改谋他途,而把万年根基的教育事业忽略了,无心去致力。一方又因年来民众教育的空气汹涌,乡小教育的经费渐渐减缩,以致每校一个学期发不到八元钱的补助费。因此,也怪不得乡小渐渐地颓唐下来了。教育当局单靠一纸具文,自然不会有多大的效力。

我们要想改造农村,要在农村中实施新兴的建设事业,切不可忽略了固有事业的改革,最好是利用固有的事业出发,来干新的事业。乡村小学的改革,是我们农村建设工作底一个重要活动,以小学为中心来推进农村建设,我觉得在现在经济、人才均感缺乏,而农民知识幼稚,未能直接接受新事业的时候,也是很值得提倡注意而不可忽略的问题,因此,我就竭力地帮助王先生:“现在你既肯不惜牺牲,来为我们乌溪村教育改造而尽瘁,我当然是以十二万分的感激欣幸来帮忙的。不过,你说要我来做个古庙的朱先生,这是王先生未免过分地客气了。我想朱先生这把交椅请你不客气地坐着吧,像钟儿本该让生长在本地的我来做。老实说,这种人在我们乌溪是不怕没有的,只要我们能想法子去利用他。”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月落西山才告完结,第二天又整整地谈了一天。于是才讨论出一个本学期改革旧教育,创造新的农村学校底办法大纲。预备要铲除伪知识的麻醉,打破为儿童升学而办学校的假教育;从这悬崖万丈的教育危途里先把这小小的学校生命夺了回来,放在实施整个农村人民生活教育的中心,以实行生产之工,来纠正历来消费之学的错误,使儿童从书呆子制造厂里爬了出来,把农民从事劳力受人治的愚民政策下种死田、死种田,而将种田死的路尽头抢了回来,一同攀上现代科学的新生路,投入生活教育之网,切实励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活人教育;用经济、文化、政治三者合一的办法来改造农村生活,以参加新农村、新中国、新世界的创造。

最低的限度,我们这农村人民生活中心的学校;——也可以说由小学中心推行农村工作的使命和办法是:

第一,要做农人精神寄托的场所。我们知道,现在一般农村人民的精神,完全是寄托在崇拜鬼神偶像和寺庙上。他们自己不食不穿亦奉之于鬼神,有祸患病灾也求之于鬼神。我们的农村教育机关,是要以科学的方法,使寄托于鬼神之上的农人精神,慢慢地转移过来。——但这并不是急捷的办法,占据了寺庙,捣毁了偶像,我们搬进去办公替代偶像所可奏效的。

第二,要做农村政治活动的中心。过去,农村人民的政治活动,像解决或商议地方上公共事业的议会等,都以祠堂和庙宇为会场,敬奉鬼神为先件。未来,我们的农村教育机关是要充作农村政治活动的中心,要指导农人实行合理的政治活动,如民权训练以及各种农村自治组织。

第三,要做农村合作事业的中心。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民受高利贷的压迫、剥削,以及告贷无门,农事资本不足的现象,到处呈现着。合作事业是复兴农村改善经济的平坦大路,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们的农村教育机关,要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农人合作活动,并且要做农村合作社的根据地。

第四,要做农村保健活动的中心。消极地置备简易的药库,实施治疗疾病,预防病源,保持农村人民的健康。如果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要去联络政府及卫生德政技术机关来协助进行。积极的方面,提倡农村卫生运动,锻炼农人身体(恢复固有的农人国术,来普及推行),造成健康的环境。

第五,要做农村人民娱乐的场所。指导并提倡农村正当的娱乐,如戏剧科学的表演、幻灯电影的放映、农村同乐会的举行,以及棋类、歌乐等。

第六,要做农业生产改良的中心。搜集各地农事试验场及农校等的优良品种和栽植方法,介绍推广于农民,并与县农业推广所(或农业改良场及农民教育馆)合作,设计学校区内农业推广的实施。进一步而教师与农民为伍,共同研究讨论农业生产的改良发展。

总之,我们的学校是要做到改造农村生活,促进农村建设的中心;导师或职员便是这新事业推动的灵魂。我们的校舍是破庙、矮屋与农舍,并没有分别,这样既合经济的原则,又可使农人大胆地踏进来,不生畏惧的心理。我们的课程是以现实的生活环境做出发点,由近及远,由今而推古,由具体而抽象,由本村而县、省、国及于全世界……使与农村生活结成密切而绝不分离的关系。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全村人民,不论是儿童、青年、妇女、成人,都施以适当的生活教育,而并不限于能进校就学的儿童。我们的作业是以生产为中心,一方学习农事生产的科学方法,同时直接参加田场农事工作的活动,并进一步要求其优良品种及合于经济的养、植方法,使实际的能参与生产活动,增加收入。我们的教导也并不限于教科书,而以农村人民的的生活为中心,怎样生活便怎样教育,不是为无聊念书而教育,是为有意义的生活、改进农村建设而教育。

我们根据了这个使命和办法 来进行农村建设事业 希望在最近的时期内(至多二年)一定能达到下列的四个目的：

一、全村民众教育普及 ,人人能识字一千以上 ,能记账、能写信、能看浅易的书报。

二、全村生产能力增加 ,生计充裕 ,没有一个不能自治的成人。

三、全村人民身体健康 ,精神活泼、愉快 ,而农家房舍、村道等 ,均能整洁。

四、全村人民能守秩序 ,能自助、互助 ,能自治、自卫 ,能自己起来改进生活 ,建设农村。

因此 ,横在目前的就成了四个大问题 ,使我们夜不能眠、日不能安地探讨、摸索着：

一、教育要怎样普及？一个生活不安定的人怎样去教育这生活不同、年龄不同的全村人民？有什么最经济、简捷而最有效的方法？

二、农民生计怎样改善？农业推广如何进行？有什么扼要有效而我们的能力能做得到的方法和工作？

三、怎样能使终年劳苦而得不到温饱的农村人得到健康？有什么简要而切实的办法？

四、公民教育怎样推行？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农民自治、自卫 ,自动地起来改进生活 ,建设农村？

这四个大问题 ,有的已经解决了一部 ,有的仍在苦苦地摸索探讨着 ;我相信在最近的期间内一定能把这问题陆续地解决了。

最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须在这里讨论一下 ,我主张农村建设要从乡村小学教育的改造出发。就单单是我回到农村来无他路可走而去帮忙小学教师吗？不。我们知道农村建设是包含着政治、经济、教育(或文化)三种建设 ,这三种建设有相互的作用 ,像鼎立之三足 ,缺一不可。农村问题绝不能单靠了任何一种建设 ,可以整个地解决 ;但是农村教育是这三种建设连锁的工具 ,而且是各种农村事业推进的中心工作。

再从广义的方面来看 ,任何工作 ,皆非教育不为功 :如政治工作 ,就是政治教育 ;经济工作 ,就是生计教育 ;卫生工作 ,就是保健教育 ;美术工作 ,就是美术教育 ;礼俗工作 ,就是社交教育 ;娱乐工作就是休闲教育 ;家事工作就是家事教育。无论公民的训练、社会的组织、礼育的提倡、疫病的防治、生活的改善、村落的整理、环境的美化、游戏的介绍、音乐的传习、风俗的改革、迷信的破除、精神的陶冶、品性的修养等 ,都要靠教育去做先锋队 ,去替它开路。因为若是农村教育不普及 ,农村人民的知识不提高 ,什么新的事业他们都不能彻底地了解 ,不能欣赏 ,不能欢迎 ,不能自动地起来接受去干。虽然你专家怎样努力设计 ,农村运动者如何努力宣传 ,终是言者谆谆 ,听者藐藐。有时不但是不能得着丝毫效果 ,反而引起了农村人民的误会 ,所以有许多热心农村事业的人们 ,常常乘兴而往 ,败兴而

归,有“此路不通行”之叹。① 我们既认定一切的农村建设工作,是离不了教育作用而进行,若由教育机关来主持,当然可以十分考究。并且为谋农村建设效用真能普及,工作范围真能推广,除由其他各方面担任工作外,也还得多依赖农村教育机关和主持农村教育的人员。自然在我们这单纯的农村中,要算这初级小学了。

我们认定目前建设农村,已为万不容缓的事了。但欲求建设有效,其势不能不求易于普及。欲求普及,唯有设法推广单式组织的农村改进区,换句话说,就是以乡村小学校做中心,来施行农村建设工作。因为单式的组织,不用多人,不用多钱,能持久简便而易推行。② 所以,我们今后的农村工作,就柄着这炬火,向着这大道前走了。

末了,新的教育、新的农村,已像太阳般从东方的云雾黑暗重围里,出了一线曙光,晨钟已在狂鸣了!准备着回农村去的战友,及有志改造社会建设农村的同志们!太阳不久就要出来了,我们趁着这清晨黎明,振作精神,奋起兼人之勇,开辟广漠的农村,冲破委靡萧条的空气,共谋农村建设,民族复兴吧!

(选自方悛农《农村建设实施记》)

【编者旁白】

这篇文章选自《农村建设实施记》,作者方悛农是中国有名的农学家。这本书是方悛农1934年完成的,当时他还是个青年。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时“到农村去”、“复兴农村”是对青年有很大诱惑力的口号。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半个世纪前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也可以体会一下当时青年为中国农村的复兴在做什么工作,他们的努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意义。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走近历史同时也就是走近当下,因为一切历史都可以说是当代史。

(谢咏)

① 傅保琛:《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中华教育界》二十二卷四期。

② 江问渔:《农村改进与农村教育》,《中华教育界》二十二卷四期。

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1990年 10月 20日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演讲

■ 摇郑也夫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晚上好 !今天的演讲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 ,也就是说 ,不打算重复我以前所做过的任何一场演讲。之所以这么做 ,一个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我觉得重复一件事情在智力上没有挑战性 ,没有趣味 ,所以我的课程基本上教过三遍就不再教了 ,我要求自己不断迎接智力生活中的挑战 ,学习新东西 ,讲授新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工作伦理。学校团委把我请到这里来做这个演讲 ,还付给我报酬 ,我应该对得起大家 ,这个演讲就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可是我事先只知道听众的两个特征 ,一个是听众都是女生 ,第二个是大家的年龄可能都在 18岁左右 ,所以我的演讲的唯一的针对性就是建立在这两种属性上的。最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怪怪的 ,叫“回归家庭 ,学习生活”。可能在这里讲这个题目有一点挑战的意味。演讲的内容有点超前 ,但大家的年龄在 18岁左右 ,都有漫长的未来 ,思想超前一点 ,或许会帮助大家在未来社会中去应对变化的生活。

演讲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二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 ;第三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工作和生活 ;第四个部分是重新理解教育。

一、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一个部分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挑起的一场争论。1989年 ,我写的一篇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发表在当年的《社会学研究》第二期。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激烈反驳 ,当然最后我也进行了反击。

文章旨在讨论男女平等 ,却是从不平等说起的。不平等实际上有时候比平

等有更深刻的值得挖掘的含义。在人类历史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要比平等有着更漫长的历史。曾经有过两种不平等。一种不平等是女性统治男性,出现过一种母系社会。母系社会何以能够产生?以恩格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当时的社会是狩猎采集的社会,而当时采集的成果比狩猎的成果更可靠,收获更多,女性因为在生产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所以成为了社会的统治者。我不大赞成这个看法。古代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肌肉为基础的,男性比女性更有力量。假设有一种生产方式比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效率高,为什么男性不转移到这个生产领域中?那不是收效更大么?如果说采集比狩猎的收效高,男性为什么不花一部分时间从事采集呢?所以说,这理由不大说得通。我比较赞成一位西方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母性社会之所以能成立,主要不是因为女性在生产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而是因为那个社会中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也就当然成为了家庭以及家族的核心,女性因此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当社会进一步发展,人类不仅明白母亲是谁,也明白父亲是谁的时候,权力当然要重新分配。当权力重新分配的时候,男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什么当社会知道了父亲是谁的时候,男性就赫然居于女性之上,占据了社会的支配地位呢?我想,原因仍然不在生产上,应该是在权力的角逐当中,男性占据了上风,而不是在生产的对比当中。那个时候战争频繁地进行,要靠男性来进行,部落内部同样有很多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围绕着权力的激烈的争夺。在内外的权力争夺当中,身体的力量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从母系社会结束以后,男性就在社会上、在权力上居于支配地位。我认为道理是这样的。

我的文章说到了社会主义和男女平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是保护弱者,就男女而言,社会主义是保护女性的。当社会主义保护弱者、保护女性的实践走到了极端的时候,挫伤了效率,以至于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起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向。反省社会主义的这个宗旨,我认为曾经推行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破坏了中国家庭的角色分工,给中国家庭造成很多混乱。因何破坏呢?因为误导了双方的心理。此前,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分工和人类其他社会中的家庭一样,分工有序,讲究效率:谁出外做工的效率更高,谁出外做工,谁出外做工的效率不太高,而在家庭的效率更高,谁留在家庭之内。作出这样一个理性的选择,符合家庭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告诉女性:你不要以为你的力量没有男人大,你可以和他赚一样多的钱。它提倡妇女到社会上去工作,而且同工同酬。这样的政策推行了十几年,就在大家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对女性的影响是:挺起腰杆来,我们在能力上、在贡献上比他们一点都不差。对男性的影响是:我们在工作上比人家没有什么优势,人家挣一沓多块钱我们也挣一沓多块钱。在这样一种政策下,大家都出去打工,下班回来都很疲劳,丈夫的体力比妻子强,那么家务该多做一些了吧?钱我也没比你少挣,咱俩毕竟是两口子,我比你还疲劳,家务就是你干了吧?男人想想我确实也没多挣钱,也没什么别的能力,在家里就赶紧揉面做饭吧。我觉得这政策造成了一个双向的误导:一方面使男人觉得自

己不行,另一方面使女子觉得自己行。其实在以体力为基础的生产中,女子肯定赶不上男子。我们强调“妇女是半边天”。日本的妇女在 19世纪 50年代前后大多数是不工作的,日本靠男性的“半边天”创造了现代化,靠它的另外“半边天”创造了井井有条的舒适的家庭生活。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靠这一片天没有创造出个现代化来,我们俩一块干还没有赶上日本一家出一个人,回家以后呢,两个人一起面对一个乱糟糟的草窝。

我认为男女平等对女性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个女性,她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做总理,那她就应该做。社会上不应该有歧视,说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做不了;不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来阻止她攀升到任何一个高度。但同时我主张下不保底。在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社会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份工作。社会给你的是权利,不是一份工作。什么叫权利?每个人都有婚姻的权利,社会保障你有一个配偶吗?社会从来没有许诺。社会许诺你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有人说你根本不能结婚,那这个人成大问题了,因为这是对你的歧视,是侵犯你的人权。但当我们保证你有这样权利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理解社会不会配给你一个配偶。当我找不着的时候,我不可能向社会的某个部门申请说“我还没有找着呢,你们帮我配一个”。你有工作的权利,但是下不保底。你有权利,你可以去竞争。要消除性别歧视,但社会保障不了给你一份工作。这是我文章中的主张。

接着就是我的文章中最敏感的回家的问题。因为要出门工作,到一个工厂、一个工地去工作,所以才有了回家的问题。我认为出门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插曲。工业时代之前,男人、女人都是在家里,都是围绕家庭转的。不错,男耕女织,男人离自己的住房可能远一点,犍亩地一头牛,犍亩的那块地的远端最多离家有二里地。女人可能就在房子周围转悠,养孩子,喂牲畜。但是那犍亩地也是在家庭范围内的。所以严格地说,那个时候男女都没有出外工作,都在家里工作。前工业时代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历史,没有一个回家的问题。在后工业时代,人们越来越依靠信息,和工业时代大不一样。工业时代是密集化生产,为了追求生产的效率有必要把人密集在一个厂房里,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需要人们凑到一块去干。此前不是这样,此后大约也不需要这样。所以说,大概也就在这段历史当中,把家庭当中的一半成员推出去工作了,另一半人留在家。留在家里的到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兴起的时候,心理愤愤不平,说我也要出去,出去以后在竞争中下岗回家时,心中怀有更大的不平。我认为回家、出门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插曲,此前不是这样。那此后应该是什么样呢?拿我本人现身说法。我已经在家里工作 10多年了,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每礼拜上一次班,剩下的日子在家读书写作,当我去大学工作后就是上课时去。我是一个不太有纪律性的人,开会的时候我也常常不去。我上课每周一次或两次,其他时候都在家里。我认为妇女应该开创在家工作的方式。索性为大家读两段原文(演讲时本打算读这两段文字,但忘了带去文章,修订演讲稿时将口述换成原文)。

这是首篇文章中的话：

每个中国妇女,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官方恩赐的终结,都要重新为自己定位。再不是以男性的特征作妇女解放的标志。妇女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极,她应该把自己的独特的潜力展现出来,她应该找到切合自己的生存、工作、审美方式。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比造就一件商品低下?为什么在家庭中不可以兼营一些社会工作?为什么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沦为单纯消费单位的家庭,不会因妇女的开发重新成为爱情、生存、工作的共同体?男人们已经走入现代社会为他们造就的窠臼中,难有生存方式的突破与创新。女子则刚刚跨出传统社会,尚处在现代工作方式的边缘上,充满了选择。她们不仅可望重新为自己定位,其潜力的开发还可能会为21世纪的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选择。

这是回应批判者的话：

女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或长或短地退居家庭。如若不是沉醉在工业文明开创的密集型社会工作方式和男人的价值中,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最有希望在家庭中开创出一种新的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生存方式。最终,那将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文明。

这篇文章遭到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猛烈攻击,杂志社一连组织了两期,每期有三四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有一些女性研究的核心人物,比如李银河、李小江。最后我也作出了回击。在1990年《社会学研究》第二、三、四、五期,连续发表了四期。我举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来支持我的观点,他就是托夫勒。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说,现在的很多公司不需要上班去工作。有些公司有犹豫的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有些公司有犹豫的人可以在家工作,他们是从事信息产业,直接通过电脑就传过去了,为什么要天天到单位去呢?当然有必要每隔一段时期,比如说每周大家见一次面,完全不需要天天去。大家知道现在的产业部门的就业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更多的是服务业、信息产业、第三产业,不需要天天上班的。这些对我的观点有很大的支持。我认为最终的争论我是占上风的。

我非常高兴有这场争论。但也感到一点遗憾,觉得参与者都不能超越性别角色,形成这样一个女性社会学家一块批驳一位男性社会学家的局面。还算不错,有一位男性社会学家去帮助这些女性社会学家,打破了性别的壁垒。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应该有一点超越性,他们在追求一种真理的时候,应该超越种族、国家、阶级乃至性别。如果完全不能超越,深深地陷入自己的族群利益、阶级利益、性别利益当中,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争夺者啊!那就谈不到有什么理念,有什么真理。我以为,我在探讨男女不平等与平等的追求当

中,不是在争夺利益,而是在前瞻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我是说你们昨天的弱势就是你们今天的优势,有些男人还迷恋在外面干。我就在家里干了四十年了,你叫我去我都不出去。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说,郑先生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上班,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我们给你加倍,加倍我也不去。为什么不去?我在家里工作挺好的,我不出去干,不受那份罪。你们要出去又出不去,正好在家里寻找为社会服务的办法,你们格外容易作这个选择,你们属于未来。我这么说怎么就不好接受呢?因为我提到了一些敏感的字眼。那个时候女性失业的现象正在发生,这些女性的研究者们正卖力地鼓吹女性的工作权利。于是,引来了这样一场争论。

二、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

家庭变化的第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家庭在后工业时代将重新成为工作场所。因为这样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当然要跟着它而变化。就是说,我们的选择将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是出去还是回来?是出去做一个工人还是在家庭做家庭妇女或者家庭男子?我们将作出的是另外一种选择,是一种比例上的选择,你的工作将有多少是离开家庭去做的,有多少是在家里做的。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重新理解工作和家务的关系。我要强调后者是非常重要的。后者在重要性上应该不逊色于前者,后者中毫无疑问地有一个极重头的工作,就是养育孩子。我觉得养育孩子这件事情比起工业时代里在外面做的若干重要性工作更重要。比如我是专门从事幼教的,你是做电脑的,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差吗?我觉得幼教的工作要比电脑的工作更重要,幼教的工作在深度和难度上比做电脑的工作一点不小,有无穷的深度可挖掘。我认为我们中国现今教育的失败,家长要负一半的责任。家长当然是两位,但是在两个家长当中,特别是在幼年教养的问题上,大概母亲比父亲负的责任还要重一点。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要给男性推卸责任的意图,因为生理的原因,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和母亲的关系要更亲近一些。天然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关系。如果教育不成功的话,家长毫无疑问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在社会。母亲要负四分之一强。我说教育失败,家长要负责任,就是说很多母亲应该说不称职的,所以孩子在教育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不称职当然要找不足,有太多的努力可做了。真的是要有素质的全面提高,最终才能落到幼教上。一个孩子的教育,一言以蔽之,首先应该是兴趣的开发,应该是因材施教。绝不是要强迫他在单一的方向上拿多少分,绝对不是。他就是拿到那个分数,你也得等着他把学过的东西忘干净。重要的肯定是他兴趣的开发。而兴趣的开发,一个孩子和一个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兴趣的不同,谈不上谁比谁高多少,谈不上智商问题。我想,同学们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日益感到,如果活到我这个年龄,对这个道理应该能够非常透彻地看

到。所谓智商对所谓成功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我很不愿意使用“成功”这个字眼,我们还是讲开发人的一些潜能吧。开发的好坏,跟智商的关系不大。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兴趣能成为极大的推动力,能把你的全部精力都凝聚起来,这样的话,在你所热爱的这个方向必然能有所成就。相反,你就像一个奴隶一样,你的智力比较高,你就是一个智力比较高的奴隶。被人逼迫去做一件事情,你不热爱,你智力再高也无济于事,做不好。年龄比较大,阅历比较深的人都会看到,跟兴趣关系比较大,跟意志力的关系比较大,关系较小的大概就是智力。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孩子操这么大心,整天逼迫孩子,关系搞得这么僵,最后事与愿违。这个事情我不想展开,我这里只是要说工作和家务的关系。家务绝对不比工作次要,家务的难度绝对不比工作小。当然,家务不只是养孩子。

第三点就是重申家务不比工作简单。家务的种种内容并不比造电脑、造电视、造汽车简单。我先作一个类比。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做一个农民简单还是做一个工人简单?我的看法是,做一个农民要比做一个工人难多了。农民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收获,然后怎么储藏,一个环节错了都不成。我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做过八年农民。后来到美国留学一年半,得了个硕士学位,回来之前想了解了解美国社会,跟一个美国朋友提出一个愿望,介绍我去一个农民家里住几天。看到美国农民的工作,然后再和美国农民以及非农民作交流,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一点的:一个农民所要拥有的知识要比一个工人的知识多太多了。我见到的这几个美国农民在一个小农场,他们最终的产品是牛奶。他们首先要种玉米,骑着摩托车到地头,然后换上拖拉机去种玉米,开着“康拜因”去收割,弄回来,再把玉米杆儿截了作饲料,要喂牛,喂牛以后要挤奶,还要配种、接生、养小牛,牛奶还要防腐,还要为牛注射疫苗。一共是叔侄三人,要做全套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不得了。作为一个工人,你生产什么?你就是生产航天材料也没什么难的。其实这个对比很类似家务和工作,千万不要小瞧家务。当然家庭中难度最大的还是教育孩子。除了教育孩子以外,别的事情也是很有深度的。

一个农民的技能显然要比一个工人的技能复杂得多了。那么为什么通常我们都认为做工人要比做农民高级,做工人要比做农民更有知识呢?意识形态的偏见。工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工人还不厉害吗?因为工业是在农业之后产生的,而工业更大地创造了财富,更大地改造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所以我们就当然地认为工人的工作复杂,农民的工作简单。实际上这是经不住推敲、经不住分析、经不住对比的。为了生产的效率,老板对工人的要求非常单一、简化,而农业、家务这样的东西非常综合,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第四点讲的是社会交往与公共空间。下一个时代,后工业社会如果彻底降临到中国,有相当多的人把自己相当多的工作时间放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格外地有一种社会交往的需求,有一种对公共空间的需求。这是不同于家庭也不

同于单位、工厂的新的空间形式上的需求,就是公共空间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和实现。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京剧票友,比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无论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都喜欢唱歌,搞了业余合唱团。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很多人想锻炼身体,组成了好多打球的俱乐部,周末去找地方打球。目前他们还属于少数派,但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这是人们未来在工作单位、家庭之外的一种社会生活的选择、一种社会交往的选择。这个东西将为更多的人——不仅女性而且男性回到家庭后——提供一种补充、一种平衡。

三、重新理解工作和生活

195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独创性、可以称为先知的人物凯恩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再三反思。凯恩斯说:经济问题,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是生物界的这个头号重要的问题将在百年内解决,传统的目标将不存在,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如何调整习惯,因为几十年内我们就将放弃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后大概每个人每周工作 50 个小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了。这一段话足以使凯恩斯位居最稀少的先知的行列当中。而且这句话不要到了百年的时候,远远在这之前将实现。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1954年(我手头不掌握更新的数字)全世界创造的财富是 1.5 万亿美元,同年全世界的人口是 25 亿人,1.5 万亿美元除以 25 亿人等于人均的 600 美元。全世界人均 600 美元,多大的一个数字啊!换成人民币,不乘 8,为什么 不乘 8? 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实际上到不了 8,实际上人民币要更值钱一些,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究竟是多少我没有能力计算,但显然人民币要更值钱一点。我们把它放低一点,因为算得多了就是过于为我自己的观点服务了,我把它算成 500,我想这是非常保守的,500 美元乘以 8 应该是 4000 多人民币,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除以每个人,要按人民币来估算的话,合每个月 333 元人民币。人均每月 333 元人民币,生活挺不错的了。再看一看国别:美国人均 1.5 万美元,日本 1 万美元,瑞士 5000 美元。很多脑筋快的同学就会说:你主张不患寡患不均,主张均贫富。我没这个打算,这是国际政治问题,这我能解决得了吗?人家能跟咱平分吗?我所要说的是:人家今天就这么富了,现在的生产以科技为基础加速度进行,今天的人家就是 100 年后的我们,没什么问题啊。人家的生产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人均几万美元还不解决吗?我们再过 100 年、200 年也相当不错了。现在发生在北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干了还在干。都生产这么多的财富了,为什么还要大干?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讨论不了。我现在在大学里讲课主要就是讲这个问题。在西方为什么够了还要干呢?为了 4000 美元,为了时髦的生活,为了虚荣心,跟别人攀比。温饱早就解决

了,北部世界没有人解决不了温饱的。你说有乞丐,那乞丐是脑筋有问题,或是厌倦了常规的生活,那完全是另一个性质的事情。

终于有人——世纪之交的当代学者——响应凯恩斯的先知的声音。一个叫里夫金的学者 1995 年写了一本书《工作的终结》。我讲一讲他叙述的美国历史。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三,1860 年的时候降到了二分之一,1870 年时是三分之一,到了 1890 年的时候是五分之一。到了今天是多少?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再看工人,1870 年一个周期地看。1850 年的时候,美国有 200 万工人,1860 年的时候有 300 万工人,1870 年的时候有 450 万工人,1880 年的时候有 600 万工人,这是美国工人数字的高峰,占当时全部就业者的百分之三十五。再以后的历史,也就是 1890 年以后,美国工人的数字开始递减,而生产在不断地增长。到了今天,生产的规模和产值大概是 1870 年的两倍以上,可是工人的数字只有 1870 年的一半。1870 年的时候 100 万人从事服务业,1880 年的时候是 150 万。服务业使美国免遭大规模的失业。但是谁敢说明天的服务业不是昨天的农业和工业,不遭遇这种命运?

我们再看机械和自动化的作用。1846 年,美国发明了摘棉花的机器。大家知道美国南部很多黑人种棉花,当然种棉花的黑奴是更早的历史,南北战争之后有很多黑人不是奴隶了,但还在摘棉花。摘棉机的使用使美国 300 万黑人不再摘棉花了,有机器摘了,大农场不再需要黑人摘棉花了。300 万黑人向北方移民。学者说这是比解放黑人宣言更有效的手段,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快的移民。这样一个大的变迁全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机器的出笼。我们再说,过去卷烟是靠人操作,每人每天能卷 1000 支烟,而现在一台卷烟机每天能卷 100 万支烟,能顶上 100 个人。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发明,美国大批报社的排字工人将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是工会和老板一直在激烈地争夺,老板不得不向工人让步。1874 年,美国三家最大的报社将他们是否要使用新的印刷技术的选择权交给了工会。你们说要使用新的机器,咱们就用,你们说不使用,还是人干,咱们就用人。工会还是很厉害的,老板不敢霸道地说用机器,真的这么干的话,会有大批人失业回家。再说一项技术,也是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技术——自动接话机。电话自动接话机使全美 2000 个接话员失业。再说银行取款机,一个取款员每天可以处理 1000 件业务,一个取款机可以处理 10000 件,一个取款机一周工作 168 个小时,昼夜不吃不喝在那里干,它的成本只是 100 万美元,它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养老金。你说为什么老板还要用一个血肉之躯的营业员呢?所以老板当然是愿意用机器不愿意用人。黑人首先从农场下岗,而后从工厂下岗,唯一能增加黑人就业的岗位在哪里?在政府部门。此前的历史从农奴时代开始,一直是黑人被剥削,随着机器的自动化,黑人从被剥削到没用处,自动化最终毁掉了工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什么武器?罢工。自动化使工人再也拿不出这个有力的武器来对付老板。不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和《工作的终结》相对立的观点,说新科技除了能代替很多工人以外,新科技也造就了一些新的产业,增加了新的就业。比如说电话

的生产。不错,新的科技造就了一些新的产业,增加了一些人的就业,但是这远远赶不上它所造成的下岗。这样的例子我想大家动脑筋就会发现比比皆是。你想想,电脑汉字系统的文字处理,将减少多少排字工?

下面我们再看看全世界的失业情况。19世纪 50年代,全世界失业的人数是 1.5 亿, 20年代是 1.5 亿, 30年代是 2.5 亿, 40年代是 2.5 亿。1980年,全世界有 1.5 亿的人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现在全世界有 1.5 亿人失业或者半失业。这个数字是 198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工业文明增加了物质财富,信息革命造成了一种新的变化,增加了空闲时间,北部世界财富的增长已不在话下,更大的变化是增加了人们的空闲时间。

在这一部分,我要讲的最后一个观点是:认清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解决失业问题吗?能让更多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吗?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世界的大势所趋。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摸到时代的脉搏。但是很不幸,不仅在中国,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人在许诺,增加就业。这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绝对背道而驰。培训是增加不了就业的。为什么不能增加就业?培训只能使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比如说你下岗了,参加培训后技能提高了,你去竞争上岗,就把另外一个人挤下去了。假设你们从事的是传统产业,那么你们的技能提高了,一定要挤下去一部分人。这是零和博弈。有 1.5 亿个岗位,有 2.5 亿个待业人员,他们培训后,有 2.5 亿个人上岗,就有 1.5 亿个人下岗。假设你从事的是新兴产业,可能增加一些就业。传统产业就一点也增加不了。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简单培训一下能够加入新兴产业吗?不能。所以说培训会增加就业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层次较低的道理。但连这个道理也没有被社会上所有的人,乃至政治家全部消化。上面的道理就更不用提了。上面的道理,即闲暇的增长是历史趋势,实际上是在反驳主流的意识形态。主流的意识形态总是说消费带动生产,消费带动就业。实际上这是非常荒诞的,不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从两点上反驳:

第一,如果我们承认以后的生产力越来越依靠机器,越来越依靠自动化,那么消费凭什么能增加就业呢?消费增加了可以增加机器啊。这是第一点反驳。

第二点反驳:为什么要用消费来带动就业呢?昨天你的消费挺合适的,有人告诉你再多消费点,有些朋友和兄弟还没有就业呢,所以再多吃点,再多穿点。这不是有病吗?对你来说,消费够了就不要再消费了。够了为什么还要消费?就业也不是目的啊。一部分人通过更多的消费让另一部分人上岗,这不荒诞吗?一部分人吃饱了还要再多吃点,就是吃撑着,以便让另一部分人上岗。再说多吃点,多吃的从哪里来呀?多吃点不花自己的钱吗?你又不是腐败分子。多吃点要花自己的钱,意味着要多生产一点,能挣出更多的钱来。我多吃就要多挣,所以我还要额外地多工作,然后再把自己吃撑。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多数人的工作是为了挣钱,工作本身乐趣不大。我们要是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工作变成自愿,

那当然好。但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我很幸运,我能做到。我读书读得眼睛受不了,所以现在很苦恼,要不然我读书就是极大的乐趣。我工作没有什么钟点,因为这就是我的乐趣。如果工作的人都变成像我这样,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目前感到工作本身有极大乐趣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我们短时期内不可能使多数人对工作抱有很大的乐趣,那么让大家多消费就等于让大家多劳动。多数人劳动不太有乐趣。你多消费的话,就意味着让你多劳动,就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不幸,因为你也不怎么热爱劳动嘛。比如,满足自己恰当的消费干远小时就够了,但是为了多劳动多消费乃至帮助别人就业,干了愿小时,每天多了两个小时实际上是多了两个小时的不幸。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在温饱已经解决的前提下,在源年、猿年以后,我们的人均消费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增加每个人的自主时间,即减少工作时间。有相当多的人下岗,这是大势所趋。凯恩斯在猿年就说猿年之内每个人每周工作猿个小时就可以满足全部生活需求。猿个小时要是按照猿个工作日算的话,就是一天工作猿个小时,要按愿小时工作制算的话,就是两天都不到。今天世界很多地区就可以这样做,明天的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这样。这个变化太大了,要应对这个变化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减少工时,大幅度地减少工时,其实这个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父兄原来每周工作远天,后来变成猿天了。还会往前走,某一天就宣布变成源天了。其实在发达国家工人们愿意牺牲工资增加休闲,这多好啊!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没有选择的自由啊?老板不愿意增加一些工人,而让每个人减少一些工时。老板觉得这样不好管理。比如说,老板有猿个工人,每天工作愿小时,他不愿意有猿个工人每天工作远小时。这样人太多,管理费力。愿意人少一点,让他们多干一点,这样好管理。老板不愿意减少工时,老板不给这种自由。这是发达国家。但减少工时一定是未来选择的一个方式。减少工时意味着不要有太多的人失业,大家共同承担“失业”。原来工作愿个小时,现在苑个小时、远个小时、猿个小时,原来工作猿天,现在源天、猿天,轮着干。劳动是权利,分享劳动机会,自己可以不干,别人不能剥夺。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社会上相当多数的人不工作,发给生活费,发的生活费足够解决温饱,绝对高于低保,但是你不能比干活的人挣得多,人家毕竟在那干活。这个社会上以后就会有六分之一、五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有二分之一不干活。这样就划分出两类人,一类是干活的人,一类是不干活的人,不干活的人的数量相当大。

在这个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演讲有点超前,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哪里是超前,简直是荒诞。但我想说,我是在很认真、很理性地和你们探讨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年可活了,“你们有漫长的未来”——我一开始就作了铺垫,愿意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想像力。我在北大上的课是“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这课我上得非常高兴,上完这课以后充分理解了美国大牌教授的乐趣。他们坚持每年给本科生上课,绝对不是只给研究生

上课。那些小孩子们是天才少年,比他们的哥哥们厉害。人的岁数大了四五年就变得世故了,一世故以后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就被约束了。15岁的孩子的想像力不得了!讲完课有的同学不走,继续热烈地憧憬着未来。一个同学对我说:美国的一个学者说(不是愚人节)10年后会有超人出现,你信吗?我说:我觉得差不多,我真觉得10年会有大变化,因为基因工程和电脑的配合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物学将极大地改造这个世界,和物理学改造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生产力还算一回事?人类普遍的智商是100,这是基数,那时人类的智商都是100或100,生产力根本就不是一个事。轻而易举解决温饱问题在今后绝对不是难事。1957年凯恩斯就跟我们说这个话了,如果今天你还觉得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荒诞的故事,我只能说你不配作为一个100世纪的青年,你看不到趋势,你没有想像力。

我们一直以为失业是一种灾难。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失业不尽是一种灾难,不尽然。就举在大萧条时期失业最严重的美国为例。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进步。那时人们没钱,生活相对紧迫,有时间,有大块的时间没事干。于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兴旺了,人们没事干,就读书。大萧条造就了美国人的读书习惯。大萧条还造就了美国人热爱运动,还是因为没事干。当然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不是中国的困难时期,不是1957年,不是没吃上饭——要吃得特别好做不到,但吃饱了。大萧条给美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美国人民形成了新的习惯,热爱读书,热爱运动,热爱园艺,在家里弄点花草什么的,有的是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呀?当美国人民因为经济上不景气而有大量时间的时候,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开创了另一个美国,造就了另一种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是文明的、高尚的、优雅的,不是功利的,天天捞票子、数票子。实际上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演讲的第一部分说,女人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在一段时间内,在一段精力非常充沛的时候,不得已回家了——并不完全是一种灾难。你有勇气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你可能率先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率先在家里开始新的生存方式的选择。

我再举一个例子。德国人的物质消费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德国人享受的假期、享受的运动、享受的艺术生活,比美国人多一倍。你说谁活得好?我认为日本人活得更惨,日本的人均收入比美国高,但日本工人苦不堪言。日本的白领,包括白领都苦不堪言。日本人没算明白这个账,工作和生活的账。日本人在最深层、最大的一个问题上糊涂。要那么多财富干吗?要的是生活,是假期、运动、艺术。我的朋友在德国呆了多年,他很少见到像在我们这里一样开着崭新的“奔驰”的人,普通人通常是开着很普通、很破的汽车,人们不以这个为荣。人们以什么为荣?一到周末开个家庭音乐会,十几个人自娱,拉大提琴、小提琴,唱歌。德国有无数个俱乐部,干什么?打球。我这个朋友比我还大几岁呢,今年37岁了,加入了一个德国的乒乓球俱乐部,瓦尔德内尔等人是最高层次的,还有下面一层,他在第三层,已经相当棒了。他说在德国俱乐部每个周末打一场比赛,两个

俱乐部开着车就来了,就干。音乐会,打球,合唱团,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每个人需要的物质是有限的。我去年在上海开了一个中法学术讨论会,主办的另一方是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见多识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先是恭维他一下——说您是见多识广,除了法国以外,您觉得哪个国家最好?他想了一会,说出一个我们大家绝对想不到的国家——意大利,说完意大利以后他停顿一下,发出一声慨叹: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真高啊!意大利的财富在世界上算不了什么,因此他说的“生活质量”含有丰富的内涵,含有他对生活的理解,含有比较早地进入现代化门槛、人文积淀深厚且见多识广的民族里的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

四、重新理解教育

人类将面临北部世界已经面临,南部世界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温饱的解决、闲暇的增加。当温饱解决、闲暇增加以后,将要出现的新的问题是什么?是空虚和无聊。全人类第一次大面积地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此前有没有一部分人率先遇到这个问题?有。在全人类面临温饱解决、闲暇增加以前,每个民族中少数的贵族早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他们早就开始空虚和无聊了,因为他们的温饱解决了。

空虚和无聊可能有两个可能的出口,一个是升华,一个是堕落。我们先说堕落。每个人的物欲都是有限的,能吃多少是有限的,能占多少空间是有限的。当你面临空虚和无聊,你要排遣它们,企图诉诸更多的物欲的满足来排遣。吃饱饭了没事干,真无聊。怎么办?吃更多的饭,喝更多的酒。什么叫“荒淫无耻”?这个词在使用上很有道德色彩,我们不从道德上考虑,只作理性分析,很简单,“荒淫无耻”就是你的物质欲望就这么大,而你非要大大超过限度地去实现。荒淫无耻的典型就是酒池肉林。酒池肉林是怎么来的?就是古代的贵族们率先面临空虚和无聊的问题,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来应对。古代的人类很艰苦,有时吃不上饭,但一部分人先解决了温饱,解决后发现自己没着没落,便搞出了酒池肉林。这是荒诞,本末倒置。本来吃是为了活,他改变成活是为了吃。为什么不可以颠倒?为什么不可以活着就是为了吃?因为你吃的能力太小了。你别高看了自己,眼大肚子小。你觉得你胃口特别大,是因为你此前生活在一个短缺的社会里。当社会的供给充分时你就会发现:我的饭量怎么这么小啊?原来你吃不了多少。所以说,如果活着只为了吃,那你不好活啊!才吃了两口,今天的生活就结束了,对不对?下边的事不知道怎么好了,再多活一会撑得够呛。所以说不可以为了吃而活着,绝对不可以的。饮食男女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有极大的欲望,觉得自己是个猛男,其实没多大本领的,性欲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活着不能够只是为了物质欲望。一味地、过度地追求物质欲望,就是荒诞,就是荒淫无

耻,必然如此。舒婷有一首小诗,写得挺好,前面的两句是“世界可能很大很大,心却很小很小”。后边两句是“心可能很大很大,世界却很小很小”。你的心要比你的胃和生殖器大多了,你要在物欲上实现自己,那没什么好实现的,因为物欲的局限性太大了。

我们说,贵族率先面临温饱的解决、闲暇的增加有两个出口,一个是堕落,再一个是升华。升华怎么讲?升华就是开发你的精神,生活向艺术化挺进,向精神的深度去发掘,以此来疏导你的物欲,让你不堕落。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精神的开发,靠找到新的兴趣使你不堕落,使你不是吃饱了再吃更多的。为什么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呢?因为精神世界的开发、健康乐趣的开发是无限的,它没有局限,不会像你有形的胃一样。我们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游戏都有无穷的空间。孟子说“弈,小术也”,是说围棋是小东西。但对围棋来说,你能穷尽它的奥秘吗?差得远。我们围棋界最高的高手吴清源以及其后的一些日本高手,反省围棋时都说:“可能我们全体棋手只发掘了围棋奥妙的~~四~~圆~~一~~或者~~一~~猿~~一~~,不会再多了。”小提琴的四根琴弦可以耗尽你一生的精力,还有很多高手你赶不上,即使你是数得上的高手了,你敢说提琴的奥妙让你挖掘干净了?差得远。所以说精神世界的开发是无限的。

贵族率先遇到了空虚和无聊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贵族是怎样开发精神世界的?孔子是中国教育的鼻祖,孔子的教育以“六艺”为代表,六艺就是“诗、书、礼、乐、御、射”。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礼,代表一种尊敬,也代表一种社会秩序;乐,就是美育的开发。人们都开发精神世界,人们在美育上都得到发展,社会就会有秩序。孔子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诗经》中的话,意思是:玉埋藏在石头当中,要把它切开,把石头剥掉,这叫“切”;切完了以后要“磋”,把残留的石头磨掉,然后根据玉的形状来雕刻,叫作“琢”;“磨”就是打光、抛光。孔子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的是什么?不是指玉,而是比喻人,比喻君子。君子要这样对待自己,要珍爱自己的身心,要把自己的身心当作美玉来雕琢,来打磨,使自己完美。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做工具。什么是工具?一个大工程师,也可能是个工具。君子是不做工具的,君子自己是目的,获取财富不是目的,目的是使自己变得高尚完美。

我们再看西方的古典教育,公元前猿世纪古希腊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读,是写,是竖琴,是唱歌、跳舞和体育。当然了,那时候的教育统统是贵族的,统统是少数人的,可是它仍然给我们很多启示。当少数人吃饱了以后,他们是用这个来搞教育的。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哪里是光懂哲学啊?他是数学家,是天文学家,是运动天才,还是个雕塑家,是个杰出的战士。柏拉图的教育观也是由这样的内容组成的:音乐、游戏、仪表(仪表大家知道是非常要紧的)、马术、兵器。古罗马在历史上恰恰从两个方面透漏出我们刚才所说的趋势,一个方向是堕落,一个方向是升华。在升华方面,它秉承着古希腊的东西要造就一个完美的贵族,提高精神。在堕落这方面,因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人们

百无聊赖,怎么办呢?就是醇酒美人,看斗兽,看人跟兽斗,看人跟人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的贵族教育和古典教育一样,读写、拉丁文、修辞、艺术的技艺和骑士的风度、体育。

我们总结一下东方和西方的古典教育。古典教育是干什么的?古典教育缺失一样东西,就是不教人们生产。古典教育的重心在于教人们如何生活。当然,这样一种高雅的生活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汗之上的,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假设一个人的物质问题解决了,时间多了,不这样就必然堕落。今天世界上出现的局面不是一部分人依靠其他人的血汗来过一种物质富足的生活,而是全人类将解决温饱的问题,都能过一种富足的生活,都有充裕的时间。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反过来看我们祖先当中一小部分人率先面临的挑战,看他们的应对,看古典教育。

现代教育和古典教育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现代教育的重心是教你如何生产,不教你如何生活;古典教育的重心是教你如何生活,不教你如何生产。现代教育中,工作观占了绝对的支配地位,我们的教育也可能是低效的,无助于帮助就业,但它的目的都是为日后的工作做准备。有的同学可能反驳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音乐、绘画、体育。我的答复是,这些内容都是古典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残余,是点缀。这些残余、点缀搞得也很不好。我们有多少人现在还有运动的兴趣和技能?还在坚持某项运动?如果人数不多的话,说明我们中小学体育教育是失败的。我们有多少人具有艺术上的特长,而且终生爱好,作为一种业余生活的精神寄托?如果没有,就是教育的失败。古典教育是通才教育,现代教育是专才教育。为什么是这样呢?目的使然。古典教育是教人们生活的,现代教育是教人们工作的。现代社会里的工作是分工的,生活能分工吗?你专门吃,他专门穿?古典教育是教人生活的,生活是不分工的,生活是高度综合的,生活要有滋有味,生活要艺术化,那这个人肯定是个通才,这个人非常有味道、有趣味,这个人肯定是多才多艺——即使他有一个特长,这个特长也一定是跟他宽广的文化积累、文化素质相结合的。大家都知道《傅雷家书》,傅雷告诫傅聪,你要做一个钢琴家,首先要做一个文化人,之后做一个艺术家,再之后要做一个音乐家,最后才是做一个钢琴家。你不能直奔主题,直奔钢琴去了,那样的话钢琴是学不好的。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宽的基础。这其实还没有完全顺从孔子的教导,孔子讲“君子不器”。傅雷还是希望孩子成器,希望他成为现代分工里的一个专才。要成为一个大的专才,底面积不能太小,何况做一个君子?那是要博学广闻、多才多艺的。

我说古典教育是教人们怎么生活的,现代教育是教人们怎么工作的,当然不是要我们偏执起来,全盘复古。只教我们怎么生活,不教我们如何工作,那是荒诞的,是另一个极端。

只教我们如何工作,不教我们怎么生活,还有一个极大的代价。假设我们现

在学习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教育教我们怎么工作,一部分教育教我们怎么生活,你说哪个教育最后不会落空?教授你学一项生产技能,如果最后你没有找到对应的工作,这个教育就落空了。在高度变化和竞争的社会中,这是很可能发生的。而教你怎么生活注定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你一定要生活的,除非你自杀了。后者不会白学,前者才有白学的可能。所以我想,我们的生产以当代的科技为基础,呈加速度向前推进,在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社会将发生巨变,将发生此前从来没有过的巨变,整个的生命的世界上将出现一支动物,他们的温饱彻底解决了,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产生了一个空虚无聊的问题,他们产生了生活该怎么过的问题。以前这不是问题,生活怎么过?生活的主要精力就是要投入生存奋斗之中,要从事生产。不久的将来将出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当这个转向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和变迁的社会同步的话,只能说它麻木不仁,它感受不到、洞察不到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那样的教育将是对不起大家的。

(选自《博览群书》1999年第10期)

【编者旁白】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一位思想很活跃的中年学者。选择这篇演讲,并不是因为郑也夫教授的所有观点都需要认同,尤其女性读者,不少都会提出异议。我所感兴趣的是,郑教授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都很新颖,很有挑战性,和我们的教育现状也有密切联系。比较教人生产的教育和教人生活的教育的区别,离我们的校园生活很近。郑也夫教授谈到的凯恩斯关于今后几十年内人类就将放弃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大概每个人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可以满足生活需求了,闲暇时间将大为增加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不妨留给时间去检验。但是,在不疑之处有疑,并且尽量开阔我们的视野,用古今中外互比较的方法,对我们身在其中、习以为常的现实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却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值得培养的素质。

(丁东)

编后语暨稿约

222

大学人文「
第一源
辑」

2004年《大学人文读本》问世,2005年《大学人文教程》出版,2006年接踵创办《大学人文》,袭用套话,是要将“大学人文”进行到底,或者说,这是在新世纪启蒙路上不休止的精神接力。本书是追求高尚情怀与厚重历史内涵的精神读物,也应是一切关心、支持与亲证当代中国人文教育的志愿者的共同家园。此家园纯属虚拟,但若真用心办好了,办出思想与品位,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将本刊当作精神家园,“常回家看看”。

本书文字追求平实、简洁、生动,讲学理性,但不学究气,不故弄玄虚。编辑理念是认同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普世价值谱系,崇尚科学、自由、民主、宪政、公正、理性、宽容、和平与博爱,以净化大学的精神语境、鼓励大学生“精神成人”为旨归。

本书设有如下栏目,欢迎投稿:

(员) 独立评论:以海内外知识界关注的公共话题为对象,文贵创见,英锐而不失沉潜,论述、对话、演讲、独白均可。

(圆) 知识生活:关于各种精神现象(有涉社会、历史、教育、学术、艺术、宗教、时尚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随笔、书信、日记、综述等,讲究思想性、趣味性、信息量。

(猿) 沉钟:勘探或重估百年国史中那些恐被遗忘于流俗或被湮埋的重要事件、人物、场景和制度环节。

(源) 观察:重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日常情境及其真实进程作审视或体恤。

(缘) 新青年:让大学生(含在读硕士生、博士生)自述其“青春印象”或“成长的烦恼”,以及如何面对、克服乃至超越的心得,文体多样,不拘一格。

(远) 我的大学:以回忆性文字为主,由教授、学者、专家暨过来人,追述与感怀母校经历留给他(她)的沧桑记忆。

(苑) 读本新选:着眼于为大学生“精神成人”发掘愈益丰富的思想资源,不论是重读经典文献,还是力荐时贤新知,皆望选家自附简明“旁白”,并妥善解决著作权使用的授权问题。

本丛刊只接受电子文本投稿,来稿请寄:曾繁岳 袁进 魏爱华 曹文 魏爱华 袁进 魏爱华 曹文
投稿人须署真名(或广为读者所知的笔名),以示文责自负。

《大学人文》编辑部

2006年 5月